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2年第12期(总第222期)

---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毛昭晰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 编辑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mailto: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 2022-12-10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分期及其动因*		王瑛琦	5
图书馆的记忆机制研究*	郑秀花 王晓琳 王瑛琦		11
“以辨考正记忆”——中国传统书目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			
	曲莎薇 秦江莹 王瑛琦		19
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功能研究*	王丹 王瑛琦		24
数字记忆:图书馆社会记忆的新形态*	王晓琳 郑秀花 王瑛琦		30
图书馆特藏建设研究*			
——基于读者接受维度的理论探索	王瑛琦 赵赫璠		38
■ 学术论坛 -----			
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与区分保护研究		巫慧	44
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图书馆力量*			
——图书馆时代价值和未来走向的再认识		欧阳菲	51

---

## ■ 阅读文化 -----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张婷婷 56

基于PPP模式的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构建研究 奚建治 62

##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的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研究\* 何传超 68

基于Unity3D的自引查找工具设计与实现 顾笑迎 吴 璿 李 硕 74

公共图书馆“小微权力”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严剑平 何东凝 79

## ■ 文献学研究 -----

徐行可旧藏《四家宫词》版本价值及批校考述 柳 燕 王唐梦影 83

《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人物考辨 严 光 92

---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

#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 CONTENTS

No.12 2022 (Serial No.222) Monthly

- Historical Stages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and Their Motivations Wang Yingqi 5
- Research on the Memory Mechanism of Libraries Zheng Xiuhua Wang Xiaolin Wang Yingqi 11
- "To Identify and Correct the Memory ":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on Social Memory Qu Shawei Qin Jiangying Wang Yingqi 19
-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emory Fun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Wang Dan Wang Yingqi 24
- Digital Memory: A New Form of Library Social Memory Wang Xiaolin Zheng Xiuhua Wang Yingqi 30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Reader Acceptance Wang Yingqi Zhao Hefan 38
- Research on the Typology and Differentiation Protec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Wu Hui 44
- Library'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mportant Window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Library Times and Future Direction Ouyang Fei 51
-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and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Smart Library Integrating Situation Zhang Tingting 56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ading Space in Libraries Based on PPP Model Xi Jianzhi 62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A Study Based on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He Chuanchao 68
- A Self-Citation Tool Based on Unity3D Gu Xiaoying Wu Jin Li Shuo 74
-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mall and Micro Power in Public Libraries Yan Jianping He Dongning 79
- The Research of Value and Postil of *Si Jia Gong Ci (Four Palace Lyrics)* Collected by Xu Xingke Liu Yan Wang Tangmengying 83
- Textual Research on *Xu Banqiao Zaji and Xuehong Xiaoji* Yan Guang 92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分期及其动因\*

王瑛琦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人类的记忆机制经历了由“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的过渡。图书馆是人类记忆机制之一,在古代中国这一变革萌芽于西周,经春秋战国而最终完成。以最终完成为时间节点,可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分为两个时期:“仪式记忆时期”与“文献记忆时期”。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推动中国古代图书馆阶段性发展的根本动因是春秋战国前后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包括文化回忆模式与记忆机制两方面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古代图书馆;历史分期;文化记忆;仪式一致性;文本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 G250.1;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 Historical Stages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and Their Motivations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holds that the human memory mechanism has transited from "ritual consistency" to "text consistency". The library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human memory. This reform was initiat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finally comple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Taking this as the time node,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ritual memory period" and the "document memory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is was the change in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arou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cluding the shift in both cultural memory mode and memory mechanism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periodization; cultural memory; ritual consistency; text consistency

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的分期的问题,是指从先秦到清末约三千余年间的图书馆史如何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在历史学中,对“长时段”历史进行分期一般分为技术性分期与理论性分期两种方法。前者是直接基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阶段特征的划分,如依据年号分为康熙时期、雍正时期等,是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方法,是一种技术性分期;后者是随近代历史哲学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以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理解为基础的阶段划分,是一种理论性分期。就现有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各种分期方法来看,仍以技术性分期为主,如来新夏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

期<sup>[1]</sup>;谢灼华以书籍形态发展为依据,依次划分为春秋—两汉(简帛书时期)、三国两晋—隋唐(写本书时期)、宋元(印本书兴起时期)、明清(印本书发展时期)四个时期<sup>[2]</sup>,等等。然而,在历史学家看来,技术性分期由于是按照自然时序排比历史的内容,“并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sup>[3]</sup>,因而并非真正的历史分期。按照这一标准,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而是长期以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替代图书馆史分期。一方面,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图书馆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思维与历史意识的指导,来指明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中本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1)的成果之一。

质的东西。解决分期问题就是从复杂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实中寻觅到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把各方面的图书馆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串联起来,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作是认识中国古代图书馆本质的关键。本文试图从文化哲学视域,对图书馆功能的发展进行阶段性划分,从而为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分期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以期在对其文化记忆本质阐释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解释中国图书馆文化的独特性与内在连续性。

## 1 中国古代图书馆文化功能发展的两个阶段

正如中国的学术认知视野发生过巨大变化一样,中国对于“图书馆”及其性质、功能与时间范围的认识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而在对于“古代图书馆”概念的认知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学者们在认识中国古代藏书活动与现代图书馆活动关系时存在明显的断裂性,表现为古代中国图书馆人对文献及其整理活动的认知传统,与近现代图书馆人从西方学科层面所理解的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目的等问题之间存在一种断裂。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的研究深受这种断裂性的影响,它虽属于中国图书馆史中的一部分,却一直在西方图书馆学话语之下被区别对待,被认为是落后、保守,或仅作为自成体系的一段“过去”。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史总是中国图书馆史历史分期中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如俞爽迷先生将其定义为“保守时期”<sup>[4]</sup>;韩永进称之为古代藏书时期(先秦—清中期)<sup>[5]</sup>;黄太送则提出“保存自用期”的概念<sup>[6]</sup>,等等。保存、自用、收藏、保守与流通、开放、公共等概念相对,都是近现代图书馆学科话语的产物,强调中国图书馆史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断裂性。然而,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相一致,中国图书馆史也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如何从断裂的表象中发现连续的实质,是自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后最紧要的问题,更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研究面对的首要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其实质是指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换言之,中国文化有世界罕见的上下数千年不曾中断、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具有独特的世代相承、前后相因的历史轨迹,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与近代图书馆保持内在连续性之根源。因此,中国图

书馆史的分期问题,可以看作是回答在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之中,图书馆形态随文化发生了哪些革命性变革的问题,或言,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图书馆究竟是如何发挥其文化功能的。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在研究传统社会中各种文化传承现象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文化记忆”理论。所谓文化记忆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前者指文化的内容实质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共同记忆;后者是指文化产生、发展、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记忆过程,它的维系全赖于集体记忆的有效交流与传承。文化记忆的交流与传承方式就是文化的记忆机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所处文化形态变迁的影响与制约。因此,扬·阿斯曼认为人类从无文字的社会文化走向有文字的社会文化这一过程中,记忆机制经历了由“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的过渡。他认为古埃及与中国都存在过类似的时期,即在这一时期,维持知识大厦的并不是书籍,而是体现在仪式之中,仪式被认为事关重大,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的先人借助仪式理解并维护文化的一致性<sup>[7]</sup>。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分期思想对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分期具有重要的启示。从文化记忆机制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形态经历了从“仪式文化”向“文献文化”的过渡,古代图书馆作为两个阶段文化记忆机制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其文化功能由“与仪式相关的功能”向“与文献相关的功能”的变迁。据此,可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分为两个时期:“仪式记忆时期”与“文献记忆时期”。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仪式的需要,仪式是其文化记忆功能转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中国,“仪式记忆时期”大致始于夏商之际,其标志是“公众巫术”的出现。至迟在殷商时期,原本人人可以占卜的“个体巫术”成为一种只有统治阶层才可实行的“公共事务”。“公众巫术”包含夏商时期全部的集体仪式,尤其在殷商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巫术仪式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所包含的象征符号与整个操演的过程形成了早期中国独特的文化记忆。这一阶段的图书馆及其文献活动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仪式性”。首先,文献为原始巫术仪式而生,在宗教仪式中起到神鬼沟通、见证与验证神旨的作用,换言之,文献只是宗教仪式的载录(非思想的阐发)。其次,文献的生成、整理与保存是一套完整的仪式程序。只有仪式活动中的文献



才是有意义的,它的神圣权力与象征意蕴都需要通过仪式才能获得。由于文献的生成和保存是在同一套仪式系统中完成,因此,与现代图书馆不同,古代“图书馆”活动不是从甲骨文献的入库与保存开始的,而是在仪式准备阶段就已参与其中,如龟甲的接收、收藏、整治等一系列仪式文献的准备,到最终仪式文献的生成、保存与验证,都是“图书馆员”的工作内容。最后,古代“图书馆”最初的成因并非只是保存的需要,甲骨文献、铭文器物等仪式文献的存储,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神旨以保证仪式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是以集中收于宗庙的形式体现并守护仪式的神圣性。这也解释了为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仪式中的甲骨文献每隔一定周期,就会与破损的甲骨一起被处理和掩埋。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仪式记忆时期的图书馆,满足宗教仪式的操演需求是第一位的,满足文献的保存需求是第二位的;仪式属性是第一位的,文献属性是第二位的;文化记忆的建构功能是第一位的,文化记忆的保存功能是第二位的。

“图书馆”的文献属性超越仪式属性成为第一属性,是从以文献为代表的阐释文化取代宗教性的仪式文化开始的,时间范围约萌芽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完成转化。虽然西周时期一直是公认的宗教仪式发展鼎盛的时期,但是,在周朝“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宗教仪式活动更依赖于文本的形式固定其中的知识与技能,使其规范化、理性化,如成为政治教化文本的《周礼》《周易》等文献的生成。此时,文献虽仍产生于仪式,并依赖仪式获得权威,但是文献的大量产生也使得仪式的形式与精神内核产生分离。至春秋战国时期,仪式随周王朝的衰落而失去权威,文献逐渐开始脱离仪式承担独立的解释与建构文化的功能,这一过程为文献的“去仪式化”,图书馆也由此脱离仪式成为存储文献的专门机构。从文献系统的发展来看,文献记忆时期的图书馆首先表征为官府图书馆的去仪式化及私家图书馆的产生。其一,春秋时期的史官存在两套文献系统,一套是产生于仪式的“策”,一套是“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称之为“简”。宋人魏了翁曾言“小事在简,大事在策”。<sup>[8]</sup>过常宝教授认为:“简和策的区别在于,一是私下的,一是正式的;一是供人理解的,一是祭告神灵的。”<sup>[8]</sup>史官文献系统的变化可以推测出三个信息:(1)在春秋史官中已经出现了完全脱离仪式束缚的文献,所

谓“小事”其实是史官“传闻载录”的政治职能的延伸;(2)春秋史官政治职事与宗教职事的分离使得史官通过简牍文献获得更大的载录和表达空间,非仪式文献的出现也促进了官方多元化文献系统的形成;

(3)官方文献系统的多元化,必然促使官方文献整理与保存系统的多元化,藏书处所由宗庙延伸至宫廷及地方府衙即是其表现之一。明人丘濬在《访求遗书疏》中指出:“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院等处,宋有崇文院、秘书省等处。”<sup>[9]</sup>中国古代皇家图书馆不断壮大,藏书处所增多,就是文献与图书馆脱离仪式束缚的结果之一。其二,春秋时代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使得“士”成为社会上掌握和传播知识的主要群体。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以文字记述思想、阐释观点;另一方面广泛普及教育,诸如孔子、墨子、老庄等教育家开设私人讲习,打破了“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学在官府”的传统,其教育思想与言论被记录成册形成新的民间文献体系。诸子文化的发展使得官府之外的社会文献系统逐步发展,诸子藏书也成为私家藏书之滥觞。春秋晚期的孔子,以及战国时期的墨子、惠施、苏秦、王寿等人都是此时私家藏书的代表人物。至迟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图书馆的文献属性已替代仪式属性成为第一属性。

## 2 中国古代图书馆阶段性发展的动因

图书馆从“仪式记忆时期”进入“文献记忆时期”是为满足不同文化形态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设计。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而言,前一阶段的文化塑造是建立在集体实践之上,而后一阶段的文化塑造则是建立在集体阐释之上,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文化记忆机制的差异是促使图书馆形态及功能进行更新的根本推动力。

### 2.1 文化模式动因:“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区分

文化记忆理论的另一个创始人阿莱达·阿斯曼在研究文化记忆形式变迁过程时,提出“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两个概念<sup>[10]146-156</sup>。它们是文化存在的两种回忆模式,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发挥功能。所谓功能记忆,是指正在当

下发挥作用的记忆信息,此类记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了桥梁。所谓存储记忆,是指所有记忆的记忆,“是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的联系的过去”<sup>[10]147</sup>,它包含着逝去的所有曾经有价值的知识、有活力的经验。在一个仪式的记忆文化中,并不存在独立的存储记忆,或言,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之间尚不具有明显的区别。如在殷商时期,巫术仪式中的语言、器物、文身、舞蹈和音乐等身体和物质的支撑,构成了记忆演示的空间,殷商文化在仪式的过程和空间中得到形塑。甲骨文献是支撑仪式空间的符号之一,它从仪式的操演中获得意义、价值与神圣权力。此时,符号、铭文、甲骨文献虽然具有存储的潜力,但却并非为保存记忆而生,而是为了意义的“展示”“表达”“象征”而存在。这是因为在以仪式操演为存在基础的文化及其回忆模式中,记忆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是“有人栖息的记忆”,它与一个集体当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时刻保持紧密联系。因此,此时的图书馆是“无形的”,它由一整套的文献生成活动及其展示空间组成。

进入文献记忆时期,被文字加以记录和保存的记忆已经远远多于人能记忆的东西,围绕着“有人栖居的”功能记忆外,还有大量的无人栖居的,仿佛没有意义却具有潜在价值的“记忆材料”,统称为“存储记忆”。“存储记忆”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才会出现的回忆类型,阿斯曼认为“文字的潜力在于它们可以把离开了鲜活载体的信息编码存储起来,不受制于集体演绎中的更新。文字的问题在于它无限制地积累信息的倾向”<sup>[10]150</sup>。阿斯曼对“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区分,展现了“仪式”与“文献”两种记忆文化的本质区别:文化(意义)构建的区分,即“存储记忆”必须转化为“功能记忆”才能实现对文化记忆的建构。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夏商周时期,虽然文字系统已然成熟且在巫术仪式中产生大量文献,但它们都是仪式文献,是对现实文化构建直接发挥作用的“功能记忆”。直至西周末年,“礼崩乐坏”,旧有的文献无法再通过一致性的仪式实现文化的巩固与更新,文献的仪式属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文献的保存功能。尤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完成“去仪式化”的文献经历几次文献繁盛期,其结果是:一方面文献开始独立承担文化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更多文献及其包含的意义内容逐渐成为无秩序的、无人问津的“存储

记忆”,并且依赖图书馆完成成长时段的保存。此时,图书馆活动由无形的文献仪式活动,转变为在有形图书馆建筑之内的典藏活动。具体而言:其一,图书馆成为潜在的回忆空间,为“存储记忆”的存在提供可能;其二,图书馆成为隐性的中介空间,通过将“存储记忆”的秩序化,为“存储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提供保障;其三,图书馆成为现实的记忆空间,其文献秩序化的方式处于当下“功能记忆”的框架之下,或言图书馆的文献典藏活动必须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相适应。从阿斯曼的理论来看,我国古代图书馆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型,是为满足春秋时期文化记忆模式的需要,即在“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两种模式并存的条件下,“记忆的深层结构中更新的和没有更新的成分之间存在内部的交通……没有不定型的存量这个背景,意识会陷入僵化”,图书馆为存储记忆匡正、支撑和调整功能记忆提供可能,功能记忆又为图书馆以何种记忆结构存储记忆提供方向与动力。由此可知,以文献为存在基础的文化及其回忆模式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功能转型的根本推动力。

## 2.2 文化机制动因:仪式操演向文本阐释的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完成了由“仪式记忆时期”向“文献记忆时期”的过渡,表征之一是出现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并存的回忆模式,此为以文献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仪式记忆与文献记忆时期区别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化记忆机制的不同,即以何种方式形成一致性的文化记忆。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仪式记忆时期文化形成方式主要依赖集体性的仪式操演,文献记忆时期对记忆的“操演”方式则转化为对文献的阅读行为,或言,一致性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文本内容的阐释之上。对于这一转变,李泽厚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社会“由巫到礼”的过程,他认为:“所谓的‘巫术礼仪’和‘由巫到礼’,便是一个来源久远、非常漫长的歌舞—仪式—祭祀的历史演进过程。大概从鱼、龙时代的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周公制礼,才基本完成,经历至少数千年以上。”<sup>[11]</sup>具体而言,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活动,礼即是仪,仪即是礼。周公“制礼作乐”将虽历史久远却未有定型的原始巫术仪式活动,发展为“经礼三千,曲礼三千”的一套秩序井然的法规准则。巫礼的理性化、制度化与规范化,使得“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仪”,与



“礼”的精神内核——“礼义”发生分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sup>[12]</sup>于是乎，“仪”之意成为专指器物、祭品、陈列及行为规范等礼制的章节度数车旗仪典；礼则重在其“义”，是上下之纪、伦常之则，是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亲之道所构成的伦理关系原则。在礼的仪、义分离过程中，文字与文献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文献的保存功能使礼的精神内核（义）可以脱离其外在表现形式（仪）而存在，文献的表达与传统功能使“义”出现更大的延展空间，从而超越原有仪式的不予言说的内在状态。《礼记·郊特牲》：“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sup>[13]</sup>也就是说，天子必须掌握礼的“意义”，才能治理好天下，此时“仪”反而成为了依附“义”的存在。韦伯曾把专注于仪式礼仪的行为叫做“仪式伦理”，而把内在化的叫做“心志伦理”。陈来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西周春秋思想的发展，是从“仪式伦理”到“德行伦理”，“德行伦理”是从外在化到内在化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因此礼之“义”在于“德”。李泽厚则从孔子出发，认为儒家所阐释的礼之“义”在于“仁”。然而，无论礼“义”在于“德”还是“仁”，春秋以降，“以礼治国”的中国古代社会观念、秩序与传统等文化精神的建立，已不只是语言、姿态、仪容等外在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在对“义”的追寻与阐释过程中的建构。孔子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疾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追求的正是玉帛、钟鼓等礼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也是，仪式记忆时期与文献记忆时期在文化记忆（一致性思想）建构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即前者依赖仪式操演，后者依赖于文本的阐释。

文化记忆机制的变迁直接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图书馆文化功能的转化。其一，图书馆经历“祛魅”，成为真正的文献度藏机构。巫史文化中的知识与行为依靠仪式获得神圣功能，在由巫到礼的过程中，军事、星算、历法等知识及其媒介由非日常生活的“巫”成为社会生活的“礼”，“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礼记·仲尼燕居》），曾经仪式中的各类元素，逐步发展为“礼者履也”的社会实践。独立于仪式的文献与图书馆，不再作为神圣仪式的一部分，而是更注

重在社会实践中的实用功能。《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到达咸阳，萧何先入秦国藏书之处尽收秦国图书，由此，刘邦可“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段话也说明，至迟在秦朝时期文献已完成祛魅，成为成熟的知识记忆载体，而图书馆独立于仪式，成为保存文献的专门机构，发挥社会实践功能。其二，文献的生产与保存活动相分离，图书馆则专职于后者。在仪式记忆时期，甲骨的进贡与接收，甲骨文献的前期准备、制作到收藏是一整套的仪式流程，每一个行为都不是单独的，而是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到文献记忆时期，文献内容的撰写、文献物质载体的生产，以及文献最终的收藏与保存，都是相互独立的过程，而不再具有必然的连续性。于是，“图书馆员”的职责亦不再是贯穿于整个仪式活动空间，而是仅仅在馆阁之内完成的文献整理活动，这与现代图书馆图书整理职能已然十分接近。其三，“由仪到义”推动图书馆记忆机制的转型。在文献记忆时期，文化秩序的建构在于礼之“义”，图书馆等文化记忆机构的功能在于促进“义”的阐释。在仪式记忆时期，图书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行为实现礼的建构，如甲骨的整治、占卜过程中的文献生成，以及甲骨文献的入藏与验证等行为的规范化，都是为了保证仪式的神圣性、完整性和神旨的可验证性。然而，在追求“义”的文化框架下，图书馆文献活动服务于“义”的阐释，其方法是促进“社会阅读”。中国古代图书馆的文献活动通常被称作“治书之学”“校雠之学”。“校雠学者，治书之学也……其自广义而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sup>[14]</sup>为何要“治书”？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书不治，不可读”，治书就是为了阅读，而只有阅读才可实现“义”的交流与认同；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之所以要治书，是为了源源不断地传递文献所载的礼之“义”、文化之“义”，简单地讲就是“治书以达义”。

### 3 结语

王国维先生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他看来，政治上“一姓一家之兴亡”是其表，而其里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

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sup>[15]</sup>。西周时期文化及其制度的剧烈变革，首先肇始于“制礼作乐”的宗教改革，周礼制度的完善转变了夏商之际“巫文化”的蒙昧状态，使社会思想趋于理性化、制度化与专业化，从而奠定了西周之后中国文化“实践理性”的制度基础。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这一理性化的过程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由“仪式文化”形态进入“文献文化”形态，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完成二者之间的过渡。在同一时期，中国古代图书馆形态亦发生革命性转变，影响因素不胜枚举，如政治体制变更，书写技术发展，文化下移，教育社会化，等等，但究其根本仍是上述文化形态转化所引起的文化记忆需求的变迁。一是文化回忆模式的变迁，使得保存“存储记忆”成为主要的需求，以实现其与“功能记忆”之间的转化，从而匡正、支撑和调整功能记忆，由此，文献与图书馆由一种参与“功能记忆”建构的文化机构，转化为保存“存储记忆”

的中介性机构。此为春秋以降，中国古代图书馆文献功能超越仪式功能的根本动因。二是文化记忆机制的变迁，仪式的衰落使得以外在行为（仪）建构“功能记忆”的方式，在巫文化后期不再起主要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以内在精神（义）来支撑一致性文化记忆的形成。因此，文化记忆的交流与传承方式需通过“义”的阐释来实现，而文献即为承载“义”的载体总有被遗忘的风险，图书馆需通过“治书”以实现“存储记忆”（不发挥功能的文献）向“功能记忆”（发挥功能的文献）的转化。从文化变迁的视角看图书馆的发展，给古代图书馆研究以其实，即中国古代图书馆既是阶段性的发展，又是连续性的发展。其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并非一成不变的，严格来说西周、春秋战国是其过渡阶段，在其前后的图书馆形态随文化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二，中国古代图书馆文化是前后相因的发展，其思想、观念及行为均可追述至夏商及其之前漫长的巫文化时期，追本溯源方可理解中国图书馆学的独特之处。

#### 参考文献：

- [1] 来新夏.中国图书馆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 谢灼华.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3]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历史研究,1954(1):5-15.
- [4] 俞爽迷.图书馆学通论[M].南京:正中书局,1936:6-9.
- [5] 韩永进.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4-13.
- [6] 黄太送.中国图书馆史分期问题探讨[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1-10.
- [7]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5-86.
- [8]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6:115.
- [9] 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第一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8-243.
- [10] 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1] 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9-40.
-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0:1457.
- [13]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55.
- [14] 胡朴安,胡道静.校讎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3:1-2.
- [15] 王国维.观堂林集(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453.

**作者简介：**王瑛琦，硕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史等。

**收稿日期：**2022-07-11

**本文责编：**李芳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图书馆的记忆机制研究\*

郑秀花<sup>1</sup> 王晓琳<sup>1</sup> 王瑛琦<sup>2</sup>

(1.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2.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社会所以能够记忆,其根源在于社会与个体具有同构性,表现在两者都具有信息承载、复制与传递的结构性功能。图书馆是社会记忆需要的产物,亦以“文字→文献→图书馆”铸就的“存储性记忆”之链,确保了人类文化进化的内在机制。图书馆的记忆机制是在文献、图书馆和馆员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中构成的:文献是人类认识结晶的体外记忆载体,图书馆是社会记忆的媒介,馆员是图书馆记忆的专职传承者。图书馆的记忆机制在运行中需要把握伦理向度,其基本准则是保持记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关键词:** 图书馆; 社会记忆; 文化记忆; 社会机制; 记忆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Memory Mechanism of Libraries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society can remember lies in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al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carrying, copy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library is a result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chain of "stored memory", which is formed by " words → literature → library ", ensures the inner mechanism of human cultural evolution. The memory mechanism of the library is formed in the trinity interaction of literature, library (building) and librarians. Literature is the in vitro memory carrier of human cognitive crystallization, the library is the medium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librarian is the dedicated bearer of library memory. The library's memory mechanism needs to operate with an ethical orientation, the basic principle is to keep the memory accurate and complete.

**Key words** library; soci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social mechanism; memory ethics

### 1 社会与个体的同构性: 社会记忆的可能

记忆对于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如果失去记忆功能,他便无法正常生存和生活。洛克(John Locke)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

的对象。”<sup>[1]</sup>洛克在这里指出了记忆的两方面意义:第一,记忆是人的最重要官能之一,人的其他官能也需要记忆官能的协调才能正常发挥效用;第二,人的记忆官能是人能够获取和形成间接经验和知识的生理基础。毋庸置疑,人的思维机能建基于记忆机能基础上,没有记忆机能便没有正常的思维机能。洛克上述判断是针对个体记忆而言的,同理,“一个社会也要有自己的‘社会记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社会记忆’,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了”<sup>[2]80</sup>。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以往的学科分野中,记忆研究往往被限定于心理学范畴之中。然而,随着人们认识视野的扩展和认识手段的进步,记忆研究已不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研究,从而提出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多种记忆类型及其概念,记忆研究也从心理学扩展至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领域之中。

社会记忆,是以社会为主体的记忆,是超个体记忆范畴,它是以社会手段存储、加工、提取人的认知信息的记忆运作类型。与社会记忆概念紧密相关的记忆类型有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集体记忆包括民族记忆、种族记忆、群体记忆等类型。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从记忆主体角度划分的记忆类型概念,而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则是从记忆内容角度划分的记忆类型概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概念之间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向度的交叉联系,甚至有时还可以交替使用,如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之举,既可称为社会记忆之举,又可称为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之举;若从纪念形式而言,又可称为“仪式性记忆”之举;若从纪念内容而言,又可称为“战争记忆”之举;若从纪念活动令人忆起那段悲痛往事而言,又可称为“创伤记忆”之举;若从纪念馆建筑及其陈列实物而言,又可称为“实物记忆”之举,等等。

那么,社会乃非生命个体,何以具有记忆机制?社会之所以能够记忆,其根源在于社会与个体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社会与个体一样,也具有主体性,也具有意识即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诚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所说,“如果社会对个体而言是普遍的,那么无疑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主体(subject)”<sup>[3]</sup>。社会具有主体性和集体意识,这是社会成为记忆主体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个体生命信息的传递靠DNA基因遗传机制,同理,超个体的社会文明信息的传递也需要特定的“遗传”机制,这种“遗传”机制就是超个体、超生命、跨时空的“社会遗传”机制。这就是个体生命信息传递机制与社会文明信息传递机制之间的同构性表现。波普尔(Karl Popper)说过,“可以把神话、观念和理论都看成是人类活动的一些最典型产品。它们和工具一样,是在我们身外进化的‘器官’,它们

是人体外的人造物”<sup>[4]</sup>。波普尔这里所说的“人造物”就是指能够承载和传递社会文明信息的人工载体。这种人工载体与承载个体生命信息的DNA载体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都具有信息承载、复制与传递的结构性功能。这种人工载体其实就是广义上的文献——能够承载、复制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人工载体。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这种文献载体往往称为“文本”(text)。这种人工载体是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把自身的认识成果创造性地对象化到另一个对象世界中,这种对象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化自然”(亦即文化世界),此人化自然其实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世界和精神文明世界。这种对象化能力只有人类才具有,因而成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正因为人类创造出了人化自然,使得人类的文明成果信息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而跨代际、跨时空传播,这就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文明遗传”机制所在。“文明遗传”机制也就是“社会遗传”机制,因为“人类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即以社会文化的超个体的体外遗传来积累自己的社会进步”<sup>[5]</sup>。

社会遗传与个体生命信息的遗传之间具有同构性,即两者都具有信息的承载、复制与传递的结构性功能机制。但两者也有根本的区别,表现在:个体生命信息的遗传只能在种系范围内进行代际复制和进化,表现为重复性进化;而社会遗传则可以超种系、超个体地进行积累式、跨越式、跨时空式的纵横传递和进步。

从记忆的角度而言,社会文明信息的承载、复制和传递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记忆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遗传就是社会记忆。人类所独有的社会记忆机制,是人类社会能够在前人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非重复性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6]</sup>。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人类文明创造与文明继承之间的关系,即“创造”是“继承”基础上的创造,而这种继承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的过程。

## 2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关系

### 2.1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

前文已指出,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载体主要是广义上的文献。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不间断性,必然致使文献数量的剧增(大体表现为指数式增长,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证明了这一点)。文献数量的剧增,若不加以人为干预就必然导致整个文献系统的无序性,这种无序性又必然导致人们利用文献的不便性。由此必然产生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的专门设施的需要,图书馆就是这种集中收藏和序化文献以便利用的专门设施之一。

在一般意义上,个体记忆过程可分为存储、编码和提取三个环节<sup>[2183]</sup>。图书馆活动过程与个体记忆过程具有同构性,即图书馆活动大体上亦由文献的存储、文献的编码(分类、编目等整序过程)和文献的提取利用三个环节构成。所以,可将图书馆视为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体外记忆即社会记忆设施。由此而言,图书馆可以说是社会记忆需要的产物。杜定友说:“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情都要这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sup>[7]</sup>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 Butler)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sup>[8]</sup>德国学者卡尔斯泰特(Peter Karstedt)说:“图书是客观精神的容器,图书馆是把客观精神传递给个人的场所;图书馆就是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为可能的社会机关。”<sup>[9]</sup>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Hauk Shera)说:“图书馆正是社会的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了人类大脑记忆的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生了。”<sup>[10]</sup>此引诸说,其实都在说图书馆是社会记忆设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者中,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图书馆学原理者并不多,虽然杜定友先生首先提出有“图书馆记忆说”,但未能专门展开论述。不过宓浩、刘迅、黄纯元三位学者合著的《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之“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一节中,却把“社

会记忆”确认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之一,并对文献的“体外记录”功能和图书馆的“社会记忆”功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如下言:

从文字产生和记录于物质载体形成文献,是人类由自身体内贮存发展到知识的体外记录,从口耳相传进化到文献交流,是图书馆起源必要前提。由体外记录和文献交流发展的需要形成最初的文献收藏活动,是图书馆早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内容。

社会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继承是依靠社会创造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的保存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字记录的机构,它是社会记忆的体现者……这种社会记忆功能,能够长久保存和积累社会的知识,能够为再生和创造社会文明提供条件<sup>[11]</sup>。

### 2.2 图书馆与文化记忆

前文已指出,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互交叉,甚至有时相互重叠,所以有时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当然,社会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作为不同的记忆类型,相互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仅就其中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而言,社会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主体——社会,而文化记忆更多地强调记忆的内容——文化。这是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最显著区别之一。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属于人类的体外记忆形式,都要借助体外载体进行保存、加工和提取活动,这是两者之间最显著的共同之处。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研究人类的记忆可从三个维度进行: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sup>[12]</sup>。从神经维度考察的记忆即个体记忆,其载体为“个体大脑”,而从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考察的记忆即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其载体均为体外载体。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文化记忆,文献是其重要载体形式之一,而图书馆则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社会设施之一。本文前面从社会记忆角度论述了图书馆之功用,下面将从文化记忆角度论述图书馆之功用。

人类借助体外物质载体记录、存储、加工和传播文化信息的过程,若用记忆论的术语说就是“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过程。简单地说,文化记忆就是文化信息的“记”(存储)和“忆”(提取)的循环递进过程。文化记忆可视为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内在机制,即人类是借助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进化的。人类是



能够在生物进化基础上进行文化进化的动物。能够进行文化进化,是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进行文化进化,需要借助体外载体,为此人类发明了诸多记载文化信息的体外载体,如甲骨、金石、泥板、简帛、纸张以及现代的电子载体等,同时发明了与之有关的文字、笔墨、造纸术、印刷术等。能够借助体外载体进行文化进化,说明人类是“善假于物”的动物<sup>[13]</sup>。

德国的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是较早系统研究文化记忆的著名学者。他们对文化记忆的释义是:

社会交往出现了过度膨胀的局面,随之要求产生可以起中转作用的外部存储器。社会交往体系必须要产生出这样一个外部范畴: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次寻回)的一些形式。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性框架及专业人员,通常还要有记录体系,如用来记事的绳结、丘林加及用来计数和运算的石头,直至最后文字出现。在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和必要的中转存储器之间,记录系统发挥着作用,而文字就诞生于这样的记录系统之中<sup>[14]</sup>。

这段话中的所谓“过度膨胀的局面”即“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局面”,指的是知识和信息的剧增所造成的记忆困难之“可怕的情况”(zerdehnte Situation);所谓“外部存储器”或“外部范畴”,就是指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系统。这种体外记载系统实际上就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这段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阿斯曼夫妇非常看重文字在建立体外记载系统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被发明之后,社会交往的外部范畴才可能成为自主、成体系的存在”<sup>[14]</sup>,此话确然。文字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信息的体外记载需要的产物。

阿斯曼夫妇研究人类的记忆现象,首先区分了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种记忆类型。交流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又可译为交往记忆、交际记忆,指个体之间通过身体和口耳相传途径进行信息传递活动所形成的记忆方式。身体活动是交流记忆的载体,所以交流记忆需要借助个体的身体活动,而文化记忆则既可以借助身体活动而进行,亦可脱离身体活动而进行。可见,交流记忆属于“借助身体的记忆”(embodied memory),而文化记忆则更多地表现

为“借助物体的记忆”(embedded memory)。阿斯曼夫妇往往把“借助物体的记忆”称之为“借助象征性客体实现的记忆”,且将这种记忆类型称之为“存储性记忆”(Speicher Gedächtnis)<sup>[15]</sup>。关于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区别以及文化记忆得以实现的社会支撑条件,扬·阿斯曼认为:

我们个体的记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交流记忆一般持续三代,即八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范围,而借助象征性的客体实现的记忆则可以横跨上千年的时间范围,因为这种记忆的承载物是文字、符号、图画等。正因为这种记忆所经历的时间范围巨大,它才发展成为文化记忆……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需要两种记忆:一个是短时段之内的交流记忆,另一个则是长时段之内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离不开支撑它的环境、机构以及相关人士,诸如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剧院、音乐厅、乐团、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教师、图书管理员、牧师、犹太拉比、伊斯兰教长。没有上述机构、媒介和专业人士,我们就无从谈起文化记忆<sup>[16]</sup>。

从上引扬·阿斯曼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至少读出三方面的信息:①从记忆的时间长度而言,交流记忆为短时段记忆,文化记忆为长时段记忆;②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有文字、符号、图画等;③文化记忆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机构、媒介、人员等社会支撑条件。尤其在谈及文化记忆的社会支撑条件时,扬·阿斯曼点到了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这就明确了文化记忆与图书馆紧密相关。法国学者利科(P. Ricoeur)认为,人类建立有多种多样的“记忆场所”,包括“三色旗、国家档案馆、图书馆、词典、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或凯旋门、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sup>[17]</sup>。利科在这里也把图书馆视为“记忆场所”。

通过了解上述文化记忆理论,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人类自从发明文字以来,就已经开始了体外记载文化信息的历史;从实物遗存而言,文化记忆主要保存于历代流传下来的浩繁的文献之中;文献的集中存储,产生了图书馆,由此形成“存储性记忆”。这就是以“文字→文献→图书馆”之链铸就的人类文化源远流长的“存储性记忆”之链。也就是说,古代图书馆为中华文化发挥了“存储性记忆”的作用,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从根本上说,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设施,图书馆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对人类文化信息的体

外集中存储与传递功能,这一点通过文化记忆角度得到了解释和证明。而“敬惜字纸、珍藏文献”也成为古今图书馆人秉持和传承的职业价值观。

### 3 图书馆记忆的机制

通过对中西方早期文明中对文献的收集、阅读和图书馆活动的历史记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历代皇家图书馆的建设及管理,还是西方早期图书馆的建立,最终都指向了共同的方向:(1)东西方文明均重视文献的积累、制作和收集,广收天下书籍来充实馆藏;(2)均重视藏书目录体系的编制,这不仅体现为图书馆管理水平的进步,而且形成了相较于其他社会机构而独有的记忆机制,构成了图书馆的凝聚型社会结构;(3)均重视对文献的制作以及对经典文献的注疏,引导社会形成对经典的崇拜氛围;(4)中西方古代图书馆均不仅是文献保障机构,同时又是社会教育机构。

那么,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存储和传播机构,是如何参与社会记忆的,即图书馆历史记忆的机制问题。笔者认为,考量图书馆的历史记忆机制问题,主要可从文献、图书馆与馆员三个要素入手。毫无疑问,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图书馆,主要指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即古代所谓的馆阁等贮存图书、传抄文献之所。图书馆集知识精英与文献于一体,是文化记忆得以有序保存和传播的记忆之场。馆员是文献整理活动的主体,在文化记忆传播过程中,职业的分工被视为文明进步的体现,在图书馆活动中,专职图书馆员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制走向成熟。蒋永福先生提出,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空间,应该是图书馆的研究对象。他指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的逻辑起点,人是客观知识的动物,而图书馆是管理客观知识的社会机构,是人类追求知识生活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sup>[18]</sup>,此论在考察图书馆的记忆机制中已然适用。蒋教授所指的“人”不仅包括图书馆员,还包括读者。关注图书馆的历史记忆机制,当然不能绕过对图书馆读者的研究,本文不对其考察不是说读者在这一研究范畴内不重要,恰恰相反,读者的因素对图书馆记忆的建构作用非常大,但是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将

图书馆记忆机制界定为以图书馆为中心的主动记忆要素,因此将“人”的因素限定为图书馆员。

#### 3.1 文献:人类认识结晶的体外记忆载体

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知识或信息是人们对事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实践而得到的认识结晶。这种认识结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类正是凭借这种认识结晶才能走出蒙昧野蛮状态,进而成为文明人。而如何将知识或信息藏起来,使其代代相传而免于“重蹈覆辙”之苦(重新认识之苦)也成为了困扰。这一困扰的实质是如何将信息或知识藏之于人体之外,使其不与个体人的生命“同生共死”,从而使后人或他人能够“坐享其成”。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如何解决信息或知识的“体外传播”问题。能否解决这一困扰,成了人类能否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关键问题。

知识或信息作为人的认识的产物,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起初,人只能依靠自身的记忆机能将其存储于大脑之中,这一点其他动物也如此。大脑作为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死亡,其中所存的认识结晶亦随之消失。这就表明,体内所藏的认识结晶无法解决其跨时空传播的问题。这就迫使人类转而思考信息或知识的体外存储的可能性。

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人类利用能够制造工具的能力逐渐寻找或制造出了能够藏道于其上的各种物质载体,如从起初的甲骨、木方、石碑、青铜、泥版、羊皮到简帛、纸张,再到现代的各种胶质、电子介质等。期间还包括文字、记录工具、印刷术、装帧技术的发明与完善。这些藏道于其上的各类物质载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献。而文献的生成是图书馆这一社会机制产生的基础,没有文献就不会有文献整理、保存和利用的需要。

对文献的体外藏道功能,中国人有一句经典概括——文以载道。文以载道中的“文”,就是文字及其记录之产物,即我们今人所称的“文献”。体外藏道是为了实现体外传道;这种体外藏道和传道机制相当于体外记忆机制。我们知道,记忆由“记”和“忆”两个环节构成,记就是存储,忆(回忆)就是提取。体外藏道和传道也同样具有“记”和“忆”的机制:“记”就是藏道,具体表现为用记录工具(如文字和笔)把道记录于体外载体上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文献的过程;

“忆”就是传道，具体表现为阅读文献的过程，即提取文献中的道（知识或信息）的过程，亦即读取意义的过程（读取即提取），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道的过程。如果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是跨时空进行的过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异时异地交流，那么这种读取意义的过程是一种跨时空传道的过程。体外藏道和传道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创造出了唯人类所独有的体外跨时空传道的机制。

### 3.2 图书馆：社会记忆的媒介

社会记忆，是针对生物记忆（生物遗传意义上的本能性记忆机能）和个体记忆而言的。社会记忆与生物记忆、个体记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记忆主体为社会，而非个体；二是记忆载体既有体内载体，也有体外载体，但其长期留存和传播主要靠体外载体；三是记忆主体的属性表现为群体性，而非个体性，因此社会记忆是一种共同记忆。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民族记忆、文化记忆等。而文献作为体外记忆的载体，大量聚集后便形成了图书馆这一文化记忆机构。这里所说的图书馆，主要指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即古代所谓的馆阁等贮存图书、传抄文献之所，这里集知识精英与文献于一体，是文化记忆得以有序保存和传播的记忆之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中心是随着具有影响力的图书馆的建设和存续而转移的，文化记忆的传播始终围绕图书馆的活动展开。建于公元前290年左右的亚历山大博学园与图书馆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甚至亚历山大图书馆早期文献的积累也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私人藏书倾囊捐赠<sup>[9]</sup>。托勒密时代的历代国王都努力为图书馆收集图书。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官府、社会组织还是民众，其对聚书的热情更加高涨。这从古代中国皇家图书馆、寺院图书馆、书院图书馆、私家藏书楼四位一体的图书馆体系的建设和管理进程中即可见一斑。以古代中国历代的皇家图书馆为例，其藏书主要通过自产、征集、抄写等途径形成，仅仅是自产的文献数量就非常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嘉定以前所修的当代史料书籍总数就达到了10576卷；而清代更甚，总数达到了209部22833卷。在接收文献方面，隋朝开国之初便接和平收了来自前朝的一万五千元卷藏书。历代征集文献的数量更多，清朝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其底本图书除了从《永乐大典》辑出一些外，其余大多数来自民间的征集，共

采得书13781种。在抄写方面，历代朝廷均组织人手抄写书籍以补充馆藏，抄写也是印刷术普遍用于书籍出版之前文献复制的主要方法。从抄工的数量可以侧面考量抄书的规模，如明代修《永乐大典》动用抄工人数多达26669人，清代修《四库全书》，共抄写正副本八份（每部近十亿字），动用缮写、装订人员3800人<sup>[20]58-64</sup>。

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的神奇魔力在于“文献之聚”。图书馆对于文献的独特社会记忆表现为人类对聚书的痴迷。人类始终将聚书视为积极、正向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一种“敬惜纸字”的社会价值观，进而推崇到整个社会，如社会对儒商的敬仰与肯定，而散书则被认为是家道中落的标志，是一种“败家”行为。

### 3.3 馆员：图书馆记忆的专职传承者

在文化记忆传播过程中，读者的因素对图书馆记忆的建构作用也非常大，但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将图书馆记忆机制界定为以图书馆为中心的主动记忆要素，因此将“人”的因素限定为图书馆员。

为了履行“记忆—责任”，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图书馆的专职馆员，便掌握着关于文化记忆的关键。在无文字的社会中，对记忆承载者的最高要求便是对记忆内容进行一字不差传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记忆完全被当做“数据存储器”，是文字性的先行形式。是否具有专职的记忆承载者是文化记忆区别于交往记忆根本性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

随着传承下来的文献被奉为经典，专门负责对其进行解释的机构和知识精英应运而生。政治机构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性和定型性，传统当中并不存在与之对抗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即出现了独立于政治、管理、经济、法律甚至宗教权威的人群。因为文字是固定的，不能有丝毫的变更，而人的世界不停地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文本与不断变更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这种差距只能靠解释来加以弥补。如此一来，解释变成了保持文化一致性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原则。只有对那些支撑身份认同的文献不断地进行解释，相关的人群才有可能获得他们所蕴含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效力。他们分享并代表这些经典所具有的权威性和这些经典所展示的真理。在之前的书写文化



里,承载和维系“传统之流”的人群同时也是管理人才、医生、解梦人和占卜者,无论如何,他们是从属于政治机构的受命令者。毋庸置疑,这些相对独立的人群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字真真切切”。保证“文字真真切切”有可能是进行解释或者保护原有的意义。

无论是西方早期还是中国古代,图书馆除了是文献的聚集之地,也是校书和著述之所,由专职的图书馆员履行文化记忆的承载者职能。古希腊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诞生了诸多博学而著名的馆长和馆员。中国古代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由史官充任,这是因为古代皇家图书馆不仅是藏书之所,同时还是校书之所和著述之所,而校书和著述工作需要由文化人群体——史官——来担任。以史官充任皇家图书馆馆职,是由皇家图书馆的“处贤才”职能和藏书、校书、著述职能共同决定的。不过,史官在朝廷中的职务以记事记言和参议政事的谏官为正职,馆职则是兼职。东汉之前,皇家图书馆的馆职并不占独立职官编制,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设置秘书监后,皇家图书馆人员配置才被纳入独立职官编制系列,这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员”被列入独立编制的肇始<sup>[20]</sup>。

#### 4 图书馆记忆的伦理向度

对图书馆记忆机制的研究,伦理问题是无法绕开的话题。社会记忆的伦理,即传承共享记忆的社会制度(如图书馆、档案馆、纪念碑等)如何正确对待记忆的问题。研究社会记忆的伦理问题,对政治权力的考察是无法绕开的议题。王海洲指出:“政治记忆的合法化不仅从政治权力的妥协和认同感培养中得到,也会通过压制等强力手段得到。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能够通过对异己政治记忆的摧毁和替代,巩固其政治记忆的合法性,并经由政治制度和法律确立为公共社会的主要记忆框架。”<sup>[21]</sup>对于个体而言,个人记忆与伦理或道德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如果记忆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我们不能因为记住某件事情而受到道德或伦理上的赞美,也不能因为未记住某件事情而受到谴责。然而在共享记忆范畴内,这一原则却不能成立。因而,玛格利特指出:“即使我们承认人们无力控制他们的记忆和遗忘的主张成立,因而可免除负有记忆或遗忘的道德责任,却不能适用于共享的记忆。”

记忆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负有竭力分享和保存记忆的义务<sup>[22]</sup>。与个体的记忆不同,集体记忆有专门的代理人和代理机构受托保存和传播记忆。图书馆等社会记忆的代理人对记忆和遗忘具有控制和选择权,因而其记忆必须接受伦理考验。玛格利特认为,“善”是社会记忆伦理的基础。笔者认为,对图书馆而言,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保持社会记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 图书馆对禁毁文献的立场。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与文献相关的创伤总是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无论是统治集团为实现思想治理而进行的禁书、焚书活动,还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焚书活动,亦或者西方教会对图书馆书目的控制和审查行为,都构成了人类文化记忆的创伤。图书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代表了人类集体的集体选择。例如,面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书厄”,私家图书馆为禁毁文献的保存贡献了积极的智慧;面对德国纳粹的焚书罪行,人们在德国和美国分别设立了两座反纳粹图书馆,专门收藏被禁毁的图书<sup>[23]</sup>。

(2) 图书馆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权力的作用(如西方教会)在控制人们对图书馆的使用(对文献的阅读)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长期的,然而抑制手段并不会削弱人们的阅读兴趣,人们为争取阅读权利的斗争从未停止,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语民众突破了教会权力的层层审查,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伟大的图书馆,由一座市中心很小的市政图书馆,逐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州立图书馆再到魁北克国家图书馆和“大图书馆”,这一过程重塑了魁北克作为加拿大的“少数派”法语聚集区的社会和文化认同<sup>[24]</sup>。

(3) 图书馆对信息伦理的关注。人类不遗余力地对抗遗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如信息不对称,信息鸿沟,网络时代的被遗忘权等。图书馆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对信息弱势群体的持续关注与发声,为其提供信息素养教育。同时图书馆仍关注信息安全问题,对信息贫困人员提供援助,抵制网络暴力等。甚至面对网络记忆不易清除的特点,图书馆界开始呼吁对公民“被遗忘权”的关注,等等。毫无疑问,图书馆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所秉持的“正义”和“善”的态度,表现出了其作为人类记忆机制所秉持的应然道德准则。

参考文献:

- [1]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9.
- [2] 李伯聪.选择与建构:大脑和认知之谜的哲学反思[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3] 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1.
- [4]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97.
- [5] 夏甄陶.认识发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9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603.
- [7] 杜定友.研究图书馆学之心得[J].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1):1-6.
- [8] 王瑛琦,郑秀花.论巴特勒的图书馆记忆思想[J].图书馆,2021(10):75-82.
- [9] 李广建.卡尔斯泰特和他的图书馆学思想[J].湖北高校图书馆,1987(1):66-69.
- [10] 谢拉.图书馆学引论[M].张沙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
- [11] 宓浩,刘迅,黄纯元.图书馆学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45,64-65.
- [12] 阿斯曼.记忆的三个维度:神经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M]//冯亚琳,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3-44.
- [13] 荀子.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3.
- [14]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5] 阿斯曼 A,阿斯曼 Y.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M]//冯亚琳,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张玲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
- [16] 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M]//陈新,彭刚.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3-14.
- [17] 利科.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47.
- [18] 蒋永福.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5):10-14.
- [19] 阿巴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5.
- [20]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1]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4.
- [22] 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1-52.
- [23] MERVELDT N V. Books Cannot Be Killed by Fire: The German Freedom Library and the American Library of Nazi-Banned Boo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Memory[J]. Library Trends,2007,55(3):523-535.
- [24] MACLENNAN B. The Library and Its Place in Cultural Memory: The Grande Bibliothèque du Québe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7,42(4):349-386.

**作者简介:** 郑秀花, 硕士,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王晓琳, 硕士,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社会记忆、图书馆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研究; 王瑛琦, 硕士,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收稿日期:** 2022-05-23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以辨考正记忆”——中国传统书目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

曲莎薇<sup>1</sup> 秦江莹<sup>2</sup> 王瑛琦<sup>1</sup>

(1.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2.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摘要:** 目录学之“本”在于“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即揭示学术源流。然而, 书目“辨考”功夫所揭示的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学术源流, 而是书目主体所建构的正统学术秩序。书目主体在建构这种正统学术秩序的过程中, 以“正源(‘道’)”为尺度来审视和筛选天下文献, 并将符合“正源”的文献按其“正源”的离合亲疏关系进行梳理和排序, 从而形成有序的序化体系。而书目在对文献进行筛选和序化的同时, 也实现了对社会记忆内容的筛选和序化。也就是说, 书目在以“正道”为价值取向匡正文献秩序的同时, 也匡正了社会记忆。

**关键词:** 社会记忆; 图书馆; 目录学; 学术源流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 "To Identify and Correct the Memory":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on Social Memory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a bibliography is to reveal the academic origin. However, what the bibliography reveals is not the academic origin in the practical sense, but the orthodox academic order constructed by the bibliographic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is orthodox academic order, the bibliographic subject examines and screens the literature with the “orthodox source (‘Dao’)” as the yardstick, and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that conforms to the “orthodox source” according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thodox source”, thus forming an organic ordering system. And while the bibliography sifts and sequences documents, it also achieves the sifting and sequencing of social memory content. That is to say, the bibliography corrects the literature order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orthodox wa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rrects the social memory.

**Key words** social memory; library; bibliography; academic origin

#### 1 引言

社会记忆, 是以社会为主体的记忆, 它是以社会手段存储、加工、提取人的认知信息的记忆运作类型, 也是实现超个体的社会文明信息跨时空传递的特定“遗传”机制。社会之所以能够记忆, 其根源在于社

会与个体具有同构性<sup>[1]</sup>。正如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 便无法认识和思维一样; 一个社会, 如果丧失了“记忆”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可以说, 正是由于社会记忆的存在, 人类社会自身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才得以积累和进化<sup>[2]</sup>。

社会记忆的保存和传递需要借由某种载体来实现, 这些载体包括文献、遗址、文物、文化传统等。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8CTQ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而,这些载体并不能将所有在过去发生的事情毫无差别地保存、传递下来,而是有选择性地“强调一部分,并隐瞒、忽略另一部分”<sup>[3]</sup>。以社会记忆最主要的承载形式——文献为例。首先,就文献个体而言,每一本文献本身并不必然真实地记载和反映历史的真相<sup>[4]</sup>。这是因为:一方面,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太多,没有任何人能够将它们全部记录下来,因此,文献主体需要对记录的内容进行有意识的判断和筛选,以求保留最有意义和最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记录某一历史事件时,文献主体即便极力追求“客观而准确”的表述,也无法对自身的“视域(前见)”和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保持完全的觉知,因而也就无可避免地会对所要记录的内容进行无意识的判断和筛选。也就是说,就文献单元而言,记录必然伴随着遗漏,记忆同时意味着失忆。社会记忆在有选择性的文献生产过程中被建构了。其次,就文献整体而言,并不是所有文献都被认为是等价的。总体上说,文献价值的有无及其大小是经由文献价值整序过程而得到认定的。在文献价值整序过程中,有些文献因被赋予较高价值而得以传承,而另一些文献则因不被重视或遭到排斥而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由此可见,社会记忆在有选择性的文献价值整序中再一次被建构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目(即群书目录)承担着从价值论角度建构文献秩序的使命,换言之,书目即是选择性文献价值整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书目在建构文献价值秩序的同时,必然也同时完成了对社会记忆的建构。探讨书目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正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 2 书目之“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2.1 何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根据章学诚的论述为目录学下过一个相当周密的定义:“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sup>[5]</sup>其中,“将群书部次甲乙”是指按照某种分类法,将文献登记在册,这是编目的基础工作;“条别异同”是指考订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属于狭义校讎学的工作。虽然这两者均是书目工作的重要环节,但

古代学者认为“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sup>[6]367</sup>,“以审订文字为校讎,而校讎在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sup>[7]</sup>,因此“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sup>[6]96</sup>,而是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也就是说,“审订文字、辨别版本、部次甲乙”尽管必要,但只是目录学之“末”,而目录学之“本”在于“辨考”。

那么,何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傅荣贤先生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思是“辨别学术(及其源流),使学术(及其源流)彰显、透彻;考订(学术)源流,使(学术)源流镜现、明晰”<sup>[8]</sup>。可见,“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二者互文见义,所“辨”者乃学术之“源流”(而非学术的其他方面);所“考”者乃“学术”之源流(而非学术之外的其他源流)。而学术是否得到“辨章”又端赖其“源流”是否得以稽考<sup>[9]</sup>,因此,二者虽相得益彰,但其核心在于后者。也就是说,“辨考”的旨趣在于为学术“渊源流别”。

既然“辨考”是为揭示学术之源流,那么,何谓“源”?何谓“流”?提出“辨考”命题的章学诚解答了这一问题:(1)《章氏遗书·校讎通义》曰:“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之为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sup>[6]95</sup>(2)《章氏遗书外编·和州志》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sup>[6]556</sup>

从章学诚上述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三代盛时,学术、文献均被王官贵族所垄断,即“天下之学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王官贵族设不同官司分守学术,官守之六艺,乃后世学术之源头;正是因为“官守学业,皆出于一”,天下学术皆出于同一源头,所以才形成“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然而,这种以国家为核心、未分化的理想状态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至春秋乱世,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列国兼并,世守专职的周王室文化官员纷纷向下层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的下移,“官守学业”的模式被打破,原本被官方独享的学术从政府中游离出来,散及四方,“学在官府”遂变成“学在四夷”<sup>[10]</sup>,学术之“源”“流”亦自此分化。

由此可知,章学诚是以“三代”为节点来划分“源”“流”的。也就是说,在“辨考”的话语中,“源”是有具体内容指涉的:“源”是指三代盛时“官守其书”的六艺,它因承载“道之精华”而被认为是“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sup>[11]</sup>,是具有纲领性的、地位不可撼动的“原始经典”;“流”是指三代以降“官失其学”之后“出于百司掌故之外”的学术分化结果。

## 2.2 书目“辨考”功夫的核心使命

由上文可知,以“三代”为转折点,学术和文献经历了由“一”到“多”、由“同”到“异”、由“治”到“乱”的演变:在三代盛时,学术、文献及其格局呈现三位一体的状态,因为学术、文献皆统于官学,学术及相关文献的初始格局(“群书之部次”)与官守的分职基本一致,所以“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三代之后,“官失其学、私学兴起”,学术打破了“天下方术皆原于一”的格局,学术源流开始分化,诸多学派由此产生。在这些学派中,有些是从“源”中衍生而出的“支流”,是“源”之延续,对“源”采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有些虽出于“源”,却并非信守《诗》《书》《礼》《易》《春秋》的故道陈迹,而是“另辟蹊径”、有所创获<sup>[12]</sup>。也就是说,私学兴起、私人著述产生后,大量文献和学问因逸出“百司掌故”而良莠不齐,因而出现文献、学术“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的乱象。天下学术虽“殊途”,但未必“同归”。面对这种学术界淆乱越轨者众多之现实,庄子在《天下篇》中指出了“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的后果:“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

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sup>[13]</sup>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梳理文献秩序便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著录部次之法(书目)”应运而生。

可见,书目自产生之初就承担着“使三代以降不受官学统驭的学术和文献重新受到规范和匡正、为因无所统宗而呈现乱象的学术和文献重新赋予秩序”的任务,换言之,编制书目的使命就在于通过重整文献秩序来“匡正学术秩序”。

欲“匡正学术之秩序”,必先明确“正”之标准。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目主体在编制过程时,以何为正呢?答曰:以“源”为“正”。“源”是学术和文献“正统性”“合法性”的来源。章学诚曰:“《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说明不由“官师”保存,也就是不出于“源”(六艺)的学问是不合法的。即使是孔子,在学习周礼时,也要到周王室的相关官员那里去询问<sup>[14]</sup>。因此,三代后世的学术和文献(“流”)必须“溯源于六艺”才能被认为是“正流”。正如章学诚在《汉志诸子》中所曰:“官司失其典守,则私门之书,推原古人宪典以定其离合;师儒失其传授,则游谈之书,推原前圣经传以折中其是非。”<sup>[15]</sup>官失其学之后,以古人宪典、前圣经传为代表的“原”(即“源”)是判断学术和文献是否属于正统的终极性依据。只有那些能够反推至正源的学术和文献,才具备“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无法与正源建立关联的学术和文献,则被认为是僭伪之流。书目对学术源流的梳理、对文献秩序的重整是围绕着“源”来进行的,即是说“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sup>[16]</sup><sup>556</sup>。只有以“源”为标准,识别后世之流,才能将“正流”梳理出来。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书目在著录时,重点突出的是“正源”以及“出于正源的正流”,而对于“官无典守而师无传习”的“不根之妄言”,则“屏而绝之”,不予著录。即便是“幸而获传者”,也必须在著录时“明著其违悖焉”。

可见,书目并不是对既有学术和文献生成、发展等实况完全客观的被动反映,而是以特定的标准(“正”)能动地建构了学术和文献的源流体系。书目“辨考”功夫所揭示的也不是现实既有的学术和文献的源流,而是经由书目主体建构的学术和文献的源流,即“正源”以及“出于正源的正流”。

综上所述,以“匡正学术秩序”为使命的书目,并



不是就天下学术和文献的实际结构来对学术和文献进行归纳与整理,而是以“正源”为尺度,审视天下学术和文献,并将符合“正源”的学术和文献按其与“正源”的离合亲疏关系进行梳理和排序,从而形成有序的序化体系。通过编制书目,源流之正统性得以建构,学术与文献获得匡正和规范,天下学术亦“有所统宗”。简而言之,编制书目就是“以源定流,使流归正”的过程。书目所反映和确认的正是正统的学术秩序。

### 2.3 书目“辨考”功夫的深层目的

由上文论述可知,编制书目的使命是通过“辨考”功夫整理文献秩序,“正天下学术之不正”。而“正天下学术”之标准是三代盛时的学术之“源”。也就是说,匡正学术和文献乱象,就是以“溯源”的方式使学术和文献能够重新上达至“三代盛时”的理想状态。可见,“匡正”本身就内含“返本”和“恢原”之意,使之“正”就是使之返回至“三代之法度”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认为书目应“推见古人大体”<sup>[6]367</sup>、“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sup>[6]95</sup>。

作为“坟籍之初”的“源”之所以成为后世学者崇尚和遵循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其承载着“道之精华”。因而从本质意义上讲,“源”即为“道”,“以源为正”就是“以道为正”,“溯源”就是“返道”。因此,《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曰:“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诡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于大道。”<sup>[6]556</sup>可以说,在编制书目体系的语境下,“溯源”“返道”“匡正”三者具有同等意义。“匡正”即是“溯源”,亦是“返道”。因此,以“正天下学术”为使命的书目工作,其实质就是通过“辨考”功夫来建构一个“以道为统宗”的学术源流体系。而建构这一体系的同时,书目也实现了“彰明正道”的深层目的。

可以说,编制书目不仅是重建学术秩序的主要方式,更是使“道”获得垂世传递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章学诚指出:“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sup>[6]95</sup>、“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sup>[6]96</sup>、“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sup>[6]68</sup>。

需要说明的是,“彰明正道”的书目建构宗旨,对书目主体也提出了要求:首先,“著录先明大道”(章

学诚语),书目主体必须是“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sup>[6]95</sup>的学者;其次,书目主体在编制书目前,必事先依据正统源流之判分标准,从宏观上预设书目的框架体系。也就是说,书目主体在“进入藏书室,接触那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有了一张古今学术的蓝图。对于他来说,编制目录与其说是对既有文献进行一番归纳与综合,不如说是拿一个早就预设好了的学术框架来套这些文献,使原本如一盘散沙的文献,按照某种特定的学术理想,被编制成一个整齐的、各类别有机关联的体系”<sup>[16]</sup>。这再次证明,书目“辨考”功夫所揭示的源流,并非是客观意义上的学术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性演化的过程,而是以“正道”为圭臬而建构的正统学术秩序。

### 3 书目“辨考”功夫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书目通过“辨考”功夫而实现的学术秩序的梳理,实为以建构学术源流(以道为源、以源定流)的方式来统宗学术,目的是使学术及文献经由“以道为统宗”的审视和规范得以归正。因此,以“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为目标的书目所揭示和记录的只是书目主体认可为“正”的文献源流。也就是说,书目在形成过程中始终受到书目主体主观意识的支配。首先,从著录内容的角度而言,书目并不是“全书目录”。即便是以“全书”命名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并非“无所不包”“巨细靡遗”,而是对所收录的内容有所择取。只有那些经过书目主体的审视而被认为是正流的文献才能被当作有价值的内容被纳入书目体系。而那些未通过筛选的,即被定位为“僭逆之流”的文献,则被贴上“不重要”或“有害”的价值标签或被置于边缘,或不予收录。其次,从文献的序化角度而言,书目是依据文献与“正源(正道)”之间的亲疏关系来对文献进行定位的,即书目“以道定文献尊卑次序”。无论是在横向的类目次第排列中,还是在纵向的类系次序排列中,书目主体基本都遵循着“前尊后卑”的原则来建构文献价值秩序。能够充分体现“道之精华”的文献被前置以突出其重要性,而与“道”关系较远的则被排在后方以示其次要地位。由此可知,书目对文献秩序的建构充满了主观选择性和价值判断性。刘国钧在《四库分类法之研究》中揭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制原理:“四库次第之根本

观念既在于尊道,故一方面,以得道之偏全,定部类之先后。一方面便不能不摒斥非圣无法之著作,且不能不于类目之中,寓褒贬之意。所以经部乐类只存律吕之书,史部之中有正史别史载记之别,乃至传记之内有别录,以位置‘叛逆’诸人,而子部列释道于末,集部出词曲于别集之外,亦皆此意。”这恰恰以实例说明了书目对文献秩序的选择性建构<sup>[17]</sup>。

至此可知,书目是以特定的价值标准筛选和序化文献的机制,书目结构体系正是筛选和序化文献后的结果。这种结果自生成后,便成为人们理解和接受文献的基本模型。人们不可能在书目体系之外审视文献,书目是人们认识和接受文献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书目在塑造人们认知和理解文献内容方面具有权威性。人们在面对文献时必然会受到书目体系的影响和引导。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而言,文献是社会记忆最主要的承载媒介,而书目是筛选和序化文献的机制,这就是说:书目在对文献进行筛选和序化的同时,其实也实现了对社会记忆内容的筛选和序化;书目在建构人们赖以理解和接受文献的基本模型的同时,其实也塑造了社会对记忆内容及其价值的认知和理解。书目从价值角度为“社会应该记住什么以及怎样记忆”提供了参照体系。书目对收录内容的选择,规定了哪些内容是有记忆价值的。那些被认为是有记忆价值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再现和传承。而那些被书目所特有的选择机制“淘汰”或“忽略”的内容,则极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代际的更迭而被忽略和遗忘。同理,书目对收录内容的价值定位和排序,亦规定了社会记忆的秩序——相对于具有一般记忆价值的内容而言,那些被认为具有更高记忆价值的内容,更容易被社会重点记忆和传承。由此可知,书目具有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它为社会记忆提供了基本的纲要框架。社会记忆是

在书目的干预和规约下生成的,书目决定了社会如何记忆。所以,书目以“正道”为价值取向匡正了文献秩序的同时,也匡正了社会记忆。书目为社会记忆提供了引导,以确保社会记忆始终在“正道”的轨道上延续。因此可以说,以“正道”为圭臬而建构的书目,具有“正社会记忆”之功能。

#### 4 结语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有些被有意识地保存并传承下来,有些则任其自生自灭,而在决定文献去留的过程中发挥着评价、筛选与建构作用的,正是以“辨考”为使命的书目。由于文献是社会记忆最主要的承载媒介,所以书目在匡正文献秩序的同时,也发挥着匡正社会记忆的功能。书目是由书目主体编制和创作的产物,而书目主体常常是在统治权力的笼罩下刻意设计书目的。因此,书目对社会记忆的匡正,必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这种“意图”就是规训社会成员,统一天下秩序,进而保障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之所以要通过发挥书目匡正社会记忆的功能来实现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目标,是因为:在任何社会秩序中,参与者都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这个共同的记忆会使现存的秩序合法化<sup>[18]</sup>。如果参与者无法分享共同的记忆,社会将无法整合,政治秩序的稳定也将无法保证。可以说,统一的社会记忆,正是政治秩序获得稳定的必要手段。由此可知,书目对社会记忆的匡正——以“正道”为旨归来统一社会记忆——正是使政治秩序得以统一的必要手段。而这正是书目之所以成为“为治之具”、获得统治阶级重视的真正原因。

#### 参考文献:

- [1]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23-424.
- [2] 李伯聪.选择与建构:大脑和认知之谜的哲学反思[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80.
- [3]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0.
- [4]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79.
- [5]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
- [6]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下转第29页)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功能研究\*

王丹<sup>1</sup> 王瑛琦<sup>2</sup>

(1.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2.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历史记忆是立足于当代视角,以其独特的选择机制对过往之历史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后建构起来的记忆,因此历史记忆并不完全是历史史实。历史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中国古代书院是集讲学、聚书、祭贤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也是承载历史记忆之场所。其不仅是保存实物的物理场所,也是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的场所。中国古代书院通过聚书活动保存历史记忆,通过讲学活动强化历史记忆,通过祭贤活动建构历史记忆,对中国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古代书院;历史记忆;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emory Fun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Abstract** Historical memory is constructed after a conscious selection of history based on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with its unique selec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historical memory is not entirely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memory is featured by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wer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integrate lecturing, book gathering and sage worship. They were also carriers of historical memories. They were a place that exist in themselves and conserve material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lso functional and symbolic palaces. They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by gathering books. They intensify historical memory by giving lectures. They construct historical memory by feting sages.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ancient academy;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inheritance

### 1 历史记忆与古代书院

记忆研究本属于心理学研究范围,自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出现,便开始了社会学领域的记忆理论研究。此后记忆理论研究逐步发展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王明珂在《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一文中认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记忆”至少应分为三种范畴:“社会记忆”“集体记

忆”“历史记忆”,且这三个研究范畴是逐步缩小的<sup>[1]</sup>。赵世瑜在《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一文中提出,历史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第三,历史记忆具有自己独特的选择机制<sup>[2]</sup>。历史记忆包括“历史”与“记忆”两个方面,“历史”偏向于对过往史实的真实记录,“记忆”则是需要进行选择性的保留,同时伴随着有目的地对部分事实的摒弃与遗忘。在这种有意识、有目的性的干预下,历史记忆并不完全是历史史实,而是一种被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1)的成果之一。

构起来的记忆。历史记忆是立足于当代视角,对过往之历史进行筛选修正,形成能够有益于当前社会发展以及能够被社会所认同的共同记忆,在不断补充、修复、矫正、保存的过程中接续传承。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集讲学、聚书、祭贤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一种辅助教育、传播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场所<sup>[3]176</sup>。中国古代书院有官办和私办之分,而“半官半私”也不在少数。汉代的“精舍”“经庐”是书院出现的萌芽,是聚徒讲学之地,主要是经师口头讲经,这也正是书院讲学活动的前身。在唐代,书院之名正式出现,在官府和民间均有其源。官方书院源于有“藏秘书,处贤才”职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民间书院源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两者都是以藏书为基础。官方书院更重视“养贤”“举贤”职能。民间书院则面向社会开放,儒道释各类人群都可出入其间,体现了书院传承文化、传道授业的职能。宋代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的数量充沛,当世大儒的讲学活动促进了文化传承,这也使书院得到了极大发展。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出现了教会学院。到清末之时,清廷下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至此中国书院也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是客观的记录,记忆需要经过主观选择才能保存,而这一选择过程受到了其所处时代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江杰英在《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指出:在族群社会中,掌握权力或知识的族群领导、精英分子会主导和提供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会通过图文或仪式相关的方式流传。承载历史记忆的载体多元化,包括族谱、传说、手札、档案史载、祠堂、碑刻、古墓、纪念性建筑、宗教仪式、宗族礼仪等。传播的媒介包括纸媒、口传、观摩、庆典展演、教育宣讲、电媒、网媒等。这样保留下的历史记忆沟通、凝结着族群的认同感<sup>[4]</sup>。书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其出现至消失都深受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保存着历史发展变化的印记。中国古代处于精英层的读书人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所处时代的掌权者的文治思想引导了书院的发展方向。通过梳理书院各项活动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书院的讲学、聚书、祭贤活动起到了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强化、建构作用,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 2 书院的历史记忆保存功能:聚书机制

### 2.1 藏书:历史记忆之“记”

文字记录是保存历史的主要方式之一。书籍记录文字,便是在记录历史。书院之名因书而成,可见书籍是书院所有活动的基础。书院的藏书之源主要包括朝廷颁赐、官民捐赠、自行购置、自行刻印四途。无论来自何种途径,书院藏书都需按照一定的原则被选择保存,进而实现对其承载的历史记忆的保存。

#### 2.1.1 朝廷颁赐与官民捐赠

自宋代始,历朝历代皇帝大多喜欢给书院颁赐书籍,其或为皇帝主动,或为受请将皇家所藏或所修书籍颁赐给书院。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儒家九经赐予白鹿洞书院师生学习。嵩阳书院在至道三年(977年)、祥符二年(1009年)获得赐印本九经。岳麓书院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在咸平四年(1001年)和祥符八年(1015年),获赐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后将藏书楼改名为“御书阁”,以表其崇。一直到清代,朝廷向书院赐书的政策仍然存在,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发《御纂日讲解义》经史诸书于白鹿、岳麓二书院”。乾隆在巡视江南时,给“江南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三史》一部”<sup>[3]179-180</sup>。朝廷颁赐书籍虽只占书院书籍很小的一部分,但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颁赐书籍体现了朝廷对书院事业的重视,所颁赐之书也符合当朝所实行的文治政策,这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对世人进行教化。

地方官吏与民众中对书院发展关心者众多。地方官吏会通过建立书院和捐赠图书的方式支持书院事业。冯梦周在元朝官至礼部尚书,捐资创建颖昌书院,将自己多年所积之书全部捐于书院<sup>[3]181</sup>。清朝湖南巡抚李尧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发公帑五百缗”,为岳麓书院购置了375部近10 000卷新书,占当时《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的387部10 054卷的98.4%<sup>[5]</sup>。民众之中亦有不少捐赠书籍者。如叶适《水心文集》卷九《石洞书院记》载,“东阳郭君饮止,作书院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据《光绪

江西通志》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邑人钟峨建向上犹县永清书院捐田六百石,书籍数千卷<sup>[3]181</sup>。

### 2.1.2 自行购置与刻印

书院通过学田的收入及官民的捐资购置书籍。书院购置的书籍是为讲学及学术研究服务,一般根据自身的需要及经济条件选择性购买。清蒋益澧重建话经精舍时,就出重金购置四部书1300册,供诸生习读<sup>[5]</sup>。书院通过一次性集中购书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书籍短缺问题。为了不断补充书院藏书,还需要进行经常性购书。多数书院在制度的制定之中也会涉及书院购书的相关规定。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梁书院派人赴天津等地书局购买图书,为此专门订立了《购书略例》,对购书的质量提出了要求,“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sup>[3]187-188</sup>。

南宋中期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出版业兴盛,书院刻书活动也因此变得活跃起来。此后历代书院延续了刊刻工作,并以此方式丰富自身藏书。书院刻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书院刊刻古代文献典籍。其刊刻内容以儒家经典书籍为主,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学院讲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书院刊刻的文献典籍在满足学院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会惠及当地士子百姓。据文献记载,朱熹刻过《周易》《尚书》《诗经》等。据明嘉靖甲寅(1554年)所刊郑廷鹄《白鹿洞志》后附《镂版书目》载,院中所存《易经》板59片,《书经》板53片,《春秋》板68片,《礼记》板297片<sup>[6]</sup>。其二,刊刻名师大儒的著作,师生教学、研究的成果,以及书院自行纂修的书院志。宋建安书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龙溪书院刻有陈淳的《陈北溪集》等<sup>[7]</sup>。话经精舍刊《话经精舍文集》中的两千多篇文章都是学生的研究成果<sup>[8]</sup>。清初嵩阳书院刊印《嵩阳书院志》、豫南书院刊印《豫南书院图》、紫云书院刊印了李灼然的《敕赐紫云书院志》<sup>[9]</sup>。其三,书院编撰、刊刻地方文献。一是当地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如清初在百泉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就编纂了《中州人物考》《新安县志》,康熙年间在大梁书院讲学的名儒张沐编纂了《上蔡县志》《开封府志》《河南通志》等<sup>[9]</sup>。二是文人学者有关当地的诗文著述。如山西阳曲县晋阳书院曾刻《国初山右四家文钞》,陕西朝邑西河书院于道光年间刻《西河古文录》;嘉庆九年(1804年)昆明五华书院刊印《滇明诗略》《滇国朝诗略》《续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四

部书,皆历代文人有关云南的诗文之作<sup>[9]</sup>。

书院藏书往往更注重实用性,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藏书的内容会不断调整。在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书院藏书中除了传统经典书籍之外,也出现了西学类书籍。如河南开封大梁书院的藏书中出现了数学、地理、外国军政铁路、工程、化学、物理、煤矿、天文、外语等书籍<sup>[9]</sup>。社会环境的转变对藏书内容有所影响,但是从历史“长时段”角度看,书院藏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藏书的选择标准及原则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以及学术思想的影响。朝廷颁赐之书是政治之选择,这些书中的思想有利于教化民众,影响思想意识,进而稳定政权;官民捐赠之书是社会之选择,能被捐赠之书籍可见其中之内容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符合当世之文化;自行购置、刻印之书是文化教育之选择,书院作为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其所选择的书籍必然与其讲学研究内容相符合。书院在藏书的选择过程之中所遵循的原则,与其对典籍文献的优与劣、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标准相符合。通过对选择典籍文献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其中所承载的历史记忆的控制。书籍作为客观实体,被选择保存的书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对历史记忆进行“记”的过程。

### 2.2 用书:历史记忆之“忆”

书院聚书于藏书楼,整序之后进行流通,用于讲学与学术研究。书院一般安排有专门人员对书籍进行管理,其主要内容与现代图书馆的工作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书籍的购买、分类、编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sup>[10]</sup>。管理人员一般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这也推动了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书院也会制定制度以保证相应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大梁书院的《编次目录略例》是关于编目的规则,《大梁书院藏书总目》所附《藏书阅书规则》对借阅手续进行了规定。丰湖书院《书藏四约》之中的《藏书约》就图书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其《借书约》就借书的要求作出了规定。

书院藏书注重利用,通过借阅提高藏书的流通率和利用率。书籍是承载历史记忆的载体,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其所承载的记忆就会被唤醒。用书的过程就是主观上对历史记忆进行“忆”的过程。如果说书院藏书实现了对历史记忆内容或载体的保存,那么书院



用书实现了对历史记忆内容或载体的编码与解码。对藏书进行编目、分类、校讎等整序活动,便是对其所承载历史记忆的编码。这一过程渗透着相关人员的历史观、政治意识和价值选择,以其主观能动的行为参与历史记忆的过程。书院藏书通过借阅和利用完成了文献记忆内容在不同时空的再现,使得历史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进而使得历史记忆的追溯和传承得以实现。不同个体的差异对同样的书籍可能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或因人们不断选择进而被强化,或因人们放弃而被遗忘,最终留下的便成为了一个民族或社会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 3 书院的历史记忆强化功能: 讲学机制

讲学一词出自于《论语·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11]</sup>自孔子讲学,儒学的传授就与“修德、讲学、徙善、改过”并行,此外诸子百家也都会进行讲学活动。在书院出现前,处于萌芽时期的汉代“精舍”“讲庐”就是聚徒讲学之地。随着书院的正式出现,讲学活动也成为书院的基本职能之一。书院的讲学活动因当世大儒的参与,对学子的教育及学术思想的传承影响深远。其中以南宋时期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影响最大。

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至十一月,朱熹偕门人范念德、林择之专程来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张栻,二人在此期间一同在当地岳麓书院讲学论经,就许多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听学。二人交流涉及居敬、求仁、《孟子》、《中庸》、二程《文集》等多方面的讨论,主要属于儒家纲常伦理的内容。因后来二人都成为理学大师,这次在岳麓讲学的经历,极大地推动了岳麓书院的发展。所谓“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到八月初,朱熹出任潭州、荆湖路安抚使,在这三个月期间整顿岳麓书院,并再次进行讲学活动。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出任南康军。朱熹到任后修复了早已倾废的白鹿洞书院。朱熹为修复的书院添置书籍,向江西、江东两路诸使遍求藏书,同时也获得地方贤达的赠书。在书院落成后,每到休沐之时便至书院讲学,为学子答疑解惑。朱熹还曾礼请与自己学术见解不同的陆九渊登台讲说,“开

创了书院邀请不同学派讲学之举”。在此期间,朱熹在总结前人教化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将明白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书院教化的根本宗旨,促进了书院的规划发展<sup>[12]</sup>。

元末动乱之际,很多书院在战火中毁坏严重。而明初近百年的时间内,朝廷兴官学废书院,书院基本处于沉寂而无闻的状态。明代书院在成化、弘治年间摆脱困境,开始恢复。到明中叶湛若水、王阳明重振理学,大兴书院,书院讲学活动也再度发展起来<sup>[13]</sup>。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贬谪至贵州,“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诞生。他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创立了龙冈书院,倡导书院讲学之风。他在此亲自订制《教条示龙场诸生》,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学规。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巡抚至赣,修复濂溪祠堂,后又经扩建完善,使其具有书院的功能,故又被称为濂溪书院,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此讲学,广传心学之思。在经历了平定宸濠叛乱及张忠、许泰构谤事件后,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并与其弟子在白鹿洞书院进行相关讲学活动<sup>[14]</sup>。王阳明在晚年之时致力于讲学活动,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地域也大量出现讲会。在王阳明去世之后,其弟子通过讲学和建造书院的方式,继续发扬其学术思想,并在嘉靖末年达到巅峰。但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后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sup>[11]</sup>。

书院的讲学活动是一个口传记忆的过程。讲学活动是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学术思想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讲学活动也是对学子的教育活动,从更深层上看是一种对民众的教化活动。历史记忆会通过讲学这种教育宣讲的方式不断被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学术思想在通过书院讲学广泛传播而未受限制的时候,意味着其学术思想是为当世掌权者、政治环境、社会大众所能接受。一旦书院讲学活动与其不符,便会受到禁毁的厄运。如明后期,当时政治观念流行“讲学即是结党”,以官僚身份的讲学者们在讲学中强化这一政治观念,导致政治与讲学冲突发生,最终也使得首善书院遭到禁毁。权力的介入会对历史记忆产生影响,但想通过权力介入强制人



们遗忘,改变历史记忆,有时会适得其反。如王阳明弟子进行的百年讲学活动在后期遭到朝廷的压制,但其学术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在后世再次生机勃勃发展起来。

#### 4 书院的历史记忆建构功能:祭贤机制

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树立典型模范,对生徒进行教育,以达劝诫规励、见贤思齐之目的,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sup>[15]</sup><sup>585</sup>。《礼记·文王世子》有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书院祭贤活动的合理性由此可见。书院祭贤始于北宋的岳麓书院,借用庙学之制,南宋时走向成熟。书院的祭贤对象往往根据自身的特色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有一定的同质性,主要包括儒家的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乡贤先祖以及与本书院相关的人物等<sup>[16]</sup>。

作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其历史沿革之中一直保持祭贤活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岳麓书院的祭祀活动进行了梳理<sup>[15]</sup><sup>585-594</sup>。岳麓书院在创办之初便祭祀孔子,整个北宋时期也保持着祭祀孔子及其贤弟子的活动。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载: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重建书院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张舜民在《郴行录》中记载了供祀之地为“孔子堂”。之后岳麓书院也祭祀学术大师和对书院有功之人。明代弘治年间,陈钢修“崇道祠”(又名朱张祠),特祀朱熹、张栻二人。嘉靖五年(1526年),学道许宗鲁、知府杨表改旧院讲堂为祠宇,供奉宋潭州知州朱洞、知州李允则、安抚刘珙、山长周式、明通判陈纲、同知杨茂元六人,名曰“六君子堂”。除此之外,很多书院还会祭祀当地的乡土先贤。如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sup>[17]</sup>。又如张之洞建两湖书院特别立“楚学祠”以祭祀楚地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sup>[16]</sup>。

祭祀仪式可以看做是形式化的语言,书院的祭贤活动就是在通过这种形式化的语言在承载着历

史记忆。书院祭贤的根本目的在于“法其人”“求其学”“思其道”“惟其道德言论是式是循”<sup>[18]</sup>。由此可见书院的祭贤活动在历史记忆建构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是在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导向作用。书院祭贤所选择的对象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他们能够代表其所倡导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书院的祭贤对象的选择和相关活动具有明显的象征性。二是对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认同作用。对于在书院求学问道的学子来说,祭贤活动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一部分,长期的环境熏陶就自然会产生认同感,进而建构起被民族所认同的历史记忆。三是在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教化作用。书院的祠宇具有开放性与公共性,其祭贤活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会向其周边辐射。书院之外的人员参与到书院祭祀活动之后,其影响也会随着这些人渗透到社会之中,起到社会教化作用。

#### 5 结语

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中,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曾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中国古代书院是承载历史记忆之场所,这既是实在存在的场所,也是具有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场所。书院的聚书、讲学、祭贤的三个主要职能恰恰体现了其作为历史记忆之场的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在这一历史记忆场之中,并不是在简单地保存过去的历史,而是在基于当时之现实,对保存之历史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与其相关的各个方面都会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最终基于共同的选择而形成历史认同。历史记忆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记忆当代性的一种体现。

中国古代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组织之一,对古代人才培养、思想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古代书院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凝结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情感联系,并被全民族所分享和共有。从微观角度来看,书院活动表现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保存、整序和传承作用;从宏观角度来看,书院活动表现出了对历史记忆的控制、强化和建构作用。立足于当下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功能进行探究,就是在面向未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接续传承和发展。

####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2]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3(2):175-188,208.
- [3]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4] 江杰英.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26-30.
- [5] 张国朝.古代书院藏书楼述略[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2):104-107.
- [6] 陆汉荣,曹晓帆.古代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书院刻书[J].图书馆建设,1995(1):69-70.
- [7] 张麦青.略论我国书院藏书与刻书[J].鄂州大学学报,2004(2):90-92.
- [8] 曹之谈.谈书院刻书[J].高校图书馆工作,1985(3):15,31-35.
- [9] 肖永明,于祥成.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26-33.
- [10] 肖东发,钟洪,王波.中国古代书院藏书概论[J].图书馆,2001(1):70-75.
- [11]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6—1626[D].上海:复旦大学,2004.
- [12] 熊瑜.朱熹伦理教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3.
- [13] 邓洪波.明代书院讲会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
- [14] 侯丹,温骞骞.王阳明的书院讲学活动及影响[J].宜春学院学报,2020,42(11):72-77.
- [15]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6] 于祥成.清代书院的儒学传播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 [17] 董志霞.书院的祭祀及其教育功能初探[J].大学教育科学,2006(4):86-88.
- [18] 肖永明,唐亚阳.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0-14.

**作者简介:** 王丹,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王瑛琦,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等。

**收稿日期:** 2022-05-09

**本文责编:** 王晓琳

(上接第23页)

- [7] 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9.
- [8] 傅荣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53-56.
- [9] 傅荣贤.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的本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111-117.
- [10] 汪文学.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113.
- [1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874.
- [12]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31.
- [13] 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375.
- [14]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M].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52.
- [15] 章学诚.校讎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0.
- [16] 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2012:7-8.
- [17] 刘国钧.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24.
- [18]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作者简介:** 曲莎薇,硕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秦江莹,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王瑛琦,硕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史等。

**收稿日期:** 2022-05-10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数字记忆：图书馆社会记忆的新形态\*

王晓琳<sup>1</sup> 郑秀花<sup>1</sup> 王瑛琦<sup>2</sup>

(1.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2.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数字技术和社会记忆的火花碰撞，促使记忆实践呈现出朝“数字记忆”发展的趋向，也催生了由图书馆为主体进行社会记忆输出的格局。学界基于数字记忆展开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整体呈现出实践先行、实践驱动理论的特质。在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互动中，数字记忆的特点也逐渐清晰：记忆与遗忘的失衡博弈；持续性与现实性的互动交融；开放性与约束性的制约共存。此外，数字记忆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记忆伦理问题，需要肩负着调节大数据时代数字记忆伦理责任的图书馆来进行伦理指导、重建记忆秩序。

**关键词：**社会记忆；数字记忆；图书馆；遗忘；记忆伦理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 Digital Memory: A New Form of Library Social Memory

**Abstract** The colli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mory has led to a trend toward "digital memory" in memory practice, and has given rise to a pattern of social memory output, mainly by librari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digital memory, demonstrating practice-oriente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memory are taking shape: the unbalanced game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inuity and reality; openness and restrictive constraints coexist.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mory has inevitably given rise to some ethical issues of memory, which require ethical guid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memory order by libraries that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gulating the ethics of digital memor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Key words** social memory; digital memory; library; forgetting; ethic of memory

### 1 引言

记忆是一个多学科领域，“接近记忆问题的渠道的多样性也表明，记忆是一个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占的现象”<sup>[1]</sup>。记忆研究涉及的学科从最初的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拓展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

领域，不同学科从各自的学术视野来探讨关于记忆的基本问题，为记忆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学理性基础。而随着数字技术嵌入到社会记忆研究，信息技术、数字艺术、地理信息系统、传播学等学科领域也与记忆结下了不解之缘，催生了有关数字记忆的方法论、工具层等方面的拓宽与外延，实现了记忆方式的“创新性破坏和建设”。图书馆作为文献保障机构，以及社会教育机构，具有相较于其他社会机构而独有的记忆机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1）的成果之一。

制,在这场记忆变迁中“被迫”向以互联网为基础、以“视觉文化”为特征的数字记忆进行妥协。

梳理图书馆的社会记忆实践,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各类社会记忆资源被灵活转化为数字内容被采集、存储、展示、传播和管理,成为可永久保存、实时共享、全新解读的数字记忆形态<sup>[2]</sup>,从而使记忆实践由“传统技术”向“数字化技术”转型,人们对社会记忆的认识逐渐往信息化和数据化方向发展。这也是数字媒体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双重背景下深化社会记忆研究的必然结果。不同于以往以文献资料为主体记忆整合与构建,数字记忆以数字资源为依托,更加重视口述史料的收藏和制作,使图书馆的记忆模式开始转向,即由文化记忆收藏拓展到交往记忆的收藏。数字技术手段的发展解决了记忆保存对纸质载体的依赖,弥补了人类长期以来无法保存交往记忆的遗憾,也催生了由图书馆为主体进行社会记忆输出的格局,这是这个时代图书馆不亚于造纸术的伟大发明。

## 2 图书馆数字记忆的研究追溯与实践探索

### 2.1 研究追溯

早在1997年,冯惠玲在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指出,电子文件利用可能涉及保障社会记忆完整的关系问题。随后,档案界对电子文件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确保“数字记忆”真实可靠、长期可读。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发展,档案学领域开始重点思考如何保管和保护数字记忆,以及在数字化环境下如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参与社会记忆传承和建构等时代性问题。同为“社会记忆装置”的图书馆,对数字记忆的研究虽相对滞后,但得益于持续跟踪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方兴未艾的实践探索,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宽。

目前,图书馆领域对数字记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记忆的学理研究。冯惠玲<sup>[3]</sup>在爬梳数字记忆由来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记忆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价值,归纳出多资源互补、多媒体连通、迭代式生长、开放式构建等特点,从目标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编排展示、技术支撑五个方面

提出构建数字记忆项目的架构和要领。加小双等人<sup>[4]</sup>将数字记忆定义为:采用不断发展进步的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呈现、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手段,将特定记忆资源转换成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共享的数字记忆形态,实现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新的主体加以参与、新的专题加以组织、新的方式加以呈现和新的需求进行利用。冯惠玲<sup>[5]</sup>从数字人文的视角来看待数字记忆,试图厘清二者关系,发现其重合的基本面主要表现在领域对象的人文属性、数字资源的多样性、数字方法近似性以及成果形式的复合性等方面,不重合主要表现在数字方法使用规范性、拓展性、工具化程度以及数字资源呈现理念与方式上的差异。

二是信息资源管理视角下的数字记忆资源研究。图书馆在数字记忆资源采集与获取、保存与开发、传播与利用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有力推动着数字记忆的实践与发展。黄晨和虎姣玫认为图书馆发挥社会记忆功能的方法应为内容策划、资源搜集、建库保存和发布传播<sup>[6]</sup>。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建设“中国记忆”项目的过程中,总结了系列经验,对“中国记忆”项目的口述资源建设<sup>[7]</sup>、资源组织形式<sup>[8]</sup>以及文献资源推广<sup>[9]</sup>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张诗阳<sup>[10]</sup>将数字人文与口述历史引入公共图书馆工作实践,设计了整合既有的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创新资源收集渠道与方法、加强整理开发与推广应用等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记忆传播与保存工作的路径。谢笑等人<sup>[11]</sup>探索了大数据环境下实现个人全面数字记忆收集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基于个体信息管理的全面数字记忆数据库的建设对策,认为可穿戴技术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三是图书馆与数字记忆的构建。周耀林等人<sup>[12]</sup>认为,数字记忆是刻写记忆新的进化形态,由人类数字化生存之“数据化”印痕构成,与数字身体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密切相关;数字记忆的建构需要遵循面向数字遗产、面向数字知识、面向数字人文的建构理论;在方法维度上,依据主体逻辑、数据逻辑、技术逻辑三个维度实现数字记忆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利用。周文泓等人<sup>[13]</sup>立足于国外图书馆主导的数字记忆社会建构实践,识别出图书馆在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实践中的功能定位,提出依托数字记忆理论与方法确立建构体系、基于数字特质建设全景式记忆资源、引领社会力量建立分众参与机制、集成双重举措强化建



构保障的建构策略。

## 2.2 实践探索

记忆实践的兴起与发展有其社会必然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数字技术为社会记忆的形成、保存与呈现提供了新的形式,而数字技术和社会记忆的火花碰撞,促使记忆实践呈现出朝“数字记忆”发展的趋向。各类数字资源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社会记忆的建构和演变之中,催生了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学科、深融合的数字记忆项目的探索性成果<sup>[12]</sup>。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MOW),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手稿、各种介质的珍贵文件及口述史等),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sup>[14]</sup>。《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主要名录。随着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时代的到来,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保存数字遗产宪章》(Charter on the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Heritage),正式将数字遗产纳入保护范围,明确了其构成范围包括原生数字形态或数字化转化而成的两种遗产形态,此后又以各种各样的文件、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对数字时代文化遗产和世

界记忆的保护<sup>[15]</sup>,推动了记忆实践的数字化转型。

受世界记忆工程和《世界记忆名录》的影响,近30年来,国内外多个国家开始组织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征集、保护和传播项目,建设主体和主题类型丰富多样,逐渐形成繁茂之势。从项目建设的主体来看,作为记忆资源保存机构的图书馆,致力于成为项目的主导者和创造者;从项目建设的客体来看,主要包括国家、城市/地区、个人等不同层面的数字记忆类型。国家记忆层面的代表性记忆项目有中国记忆项目(China Memory Project)、美国记忆工程(American Memory Project)、荷兰记忆(Memory of the Netherlands)、新加坡记忆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城市/地区层面的代表性记忆项目有北京记忆、上海年华、佛罗里达记忆(Florida Memory)、纽约市皇后区记忆(Queens Memory),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从图书馆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数字记忆的实践起步较早,成果丰富,明显超前于理论研究,且其实践成效是推动并检验社会记忆理论研究、明确图书馆在数字记忆构筑中定位的重要基准。而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大多聚焦于基于实践的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在自上而下的体系化建设和指导实践层面还有所缺失,更欠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

表1 代表性数字记忆项目汇总

项目层面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者	启动时间	项目简介
国家级	中国记忆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2年	通过整理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形成了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并面向公众提供资源服务
	美国记忆工程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94年	旨在将图书馆中最重要的历史珍品和其他主要研究档案数字化,并通过同名多媒体网站发布,使学者、教育家、学生、普通大众等都能免费获取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资源
	荷兰记忆	荷兰皇家图书馆	2000年	鼓励和支持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将其藏品数字化,并通过网站发布数字图像,使公众可以免费访问该网站
	新加坡记忆工程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2011年	旨在捕捉、记录和保存有关新加坡文化与记忆的资源,搭建新加坡国民记忆平台,同时支持与深入记忆挖掘有关的科学研究
城市/地区	北京记忆	首都图书馆	2003年	以百年馆藏为基础、以北京历史发展脉络为轨迹、以北京文化底蕴和风俗传统为依托,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地方文献和多媒体资源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转变为数字化资源,建立集储存和咨询于一体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源性网站
	上海年华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006年	以时为经,以人、事和物为纬,汇聚多种子资源库,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上海的时代风貌和地域特征
	佛罗里达记忆	美国佛罗里达州图书馆和档案馆	1994年	对挑选出来的能够反映佛罗里达州历史重要事件和人物且有助于佛罗里达州州民和世界各地数百万人了解佛罗里达历史文化的馆藏材料进行数字化,并在线免费提供访问利用
	纽约市皇后区记忆	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档案室,皇后学院图书馆特藏档案馆	2010年	将历史上和当代的摄影、地图、新闻剪报等文件与当前居民的口述历史访谈结合起来,通过收集皇后区居民生活的经历、观点和其他证据,记录皇后区的历史

下的双向循环过程。因此,进一步厘清数字记忆的内涵,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中勾勒出数字记忆的特点,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结合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文认为对数字记忆可基本达成以下共识:其一,记忆资源从资源采集到组织分析都需要大量的数字技术和方法,即数字技术在数字记忆生成、保存、传播的全生命周期中得到充分运用;其二,来源广泛、媒介多样的资源是数字记忆的基础素材和支撑,包含图书、照片、地图、音频、视频、口述史料等多种数字记忆资源;其三,数字记忆是记忆资源存储和提取的循环递进过程,即数字记忆不仅强调数字资源的存储,包括合作性参与、规范性编码、多媒介评述和安全性保存等,还强调数字资源的提取,包括多形态浏览、体验式互动和演绎性利用等;其四,数字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面向记忆的构建与文化的传承。

### 3 数字记忆的特点

#### 3.1 记忆与遗忘的失衡博弈

社会记忆与社会遗忘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有记忆,必然就有遗忘,这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活动既不是记忆的机械式累加膨胀,也不是遗忘的附着般如影随形,而总是平衡在记忆和遗忘的连续互动之中<sup>[16]</sup>。对于人类而言,遗忘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记忆是人类为了对抗时间和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努力。遗忘与记忆的斗争遵循着以个体自觉活动为基础但又不以任何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在能动性、受动性、选择性与制约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等方面富有张力的协调统一特性<sup>[16]</sup>,导致“一个社会对于记忆的需要和其对于遗忘的需要趋于平衡”<sup>[17]</sup>。然而,随着大数据、云存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今世界正在从网络时代向数字时代迈进。数字时代的“数字空间”以更加广泛的数字技术为根基,从根本上改变了能够被记住的信息的内容,改变了记住信息的方式,导致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甚至说发生了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sup>[18]</sup>

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字技术与社会记忆激烈碰撞

的“数字记忆”时代。数字技术庞大的存储容量和智慧联想功能推动了新的记忆革命,促使记忆的触角由物质实体向数字形态延伸,由官方机构向普通大众蔓延,由整体向细节拓展,催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数字资源内容,赋予了记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被转换为数字形态的记忆资源打破了其他物质记忆媒介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的局限,实现了资源的跨时空、跨介质传播,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全面的、立体的记忆资源体系。纵观国内外各数字记忆项目,其普遍具有多种类型、多种形态、多种内容的数字记忆资源。如“美国记忆”的数字化对象就涉及手稿、印刷品、照片、海报、地图、录音、电影、书籍、小册子和乐谱;“荷兰记忆”的数字化对象包括档案、收藏品、艺术品、照片、电影、报纸、杂志和书籍等;“佛罗里达记忆”网站上设置了包括摄影汇集、视频汇集、音频汇集、馆藏、展品、在线课堂在内的六大板块;“纽约市皇后区记忆”将历史上和当代的摄影、地图、新闻剪报等文件与当前居民的口述历史访谈结合起来,聚集了不同来源的访谈和档案文件;“中国记忆”项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北京记忆”通过文献、金石拓片、历史地图、报纸、访谈等,展现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风貌和人文风情。

越来越多的记忆资源被纳入到记忆项目的记忆资源体系之中,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其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第一,结构的多样性,从国家记忆、城市记忆到个人记忆、事件性记忆,从官方记忆到民间记忆,从古代记忆、近代记忆到现代记忆;第二,媒介的多样性,既包括对书籍、期刊、报纸、档案等纸质媒介的数字化,也“编织”了大量如电影、音乐、绘画、建筑、戏剧等非纸质、非文本的媒介;第三,领域的多样性,从单一领域延伸到全面反映具有社会记忆和传承价值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导致以往对某一客体的记忆资源的片面和平面印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转向以多媒介形态、特定记忆专题立体式呈现,致力于还原记忆的本来面目。同时,数字记忆资源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记忆的表现力,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介形态将蕴含在其中的社会记忆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传播给读者,并且更多地表现为交互式的对话模式,使得社会记忆相比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形式单一的文字符号都具有更加直观的

表现力。基于多媒介形态, 阅读者可以享受多种感官体验——图片和文本冲击的是视觉, 音频冲击的是听觉, 视频实现的是视觉、听觉的双重冲击, 特别是VR/AR技术的运用, 极大地提高了沉浸式阅读的程度。在这种情境下, 记忆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了。正如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在其著作《文化记忆: 早起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提到的, 记忆的形成依赖于个人感官对具体事物形象的感知和认同。这又验证了我们此前的结论——记忆成了常态, 而遗忘变成了例外。

### 3.2 持续性与现实性的互动交融

记忆的“断裂”与“连续”一直是集体记忆关注讨论的重点。1925年,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 并指出: “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 这种社会建构, 如果不是全部, 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这是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现在中心观”(Presentist)。他认为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 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哈布瓦赫的“现在中心观”强调“现在”对“过去”的决定作用, 而可能导致研究者忽视记忆所具有的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保罗·康纳顿则从文化连续性和延续性的角度考虑, 一方面承认现在对塑造过去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强调过去对现在的“阴影”。巴里·施瓦茨综合了两种视角, 在《亚伯拉罕·林肯的重构》一文中指出, 集体记忆建构具有双重性质, 即“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 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sup>[19]</sup>。他以富有启发性的细节描写分析了不同时期林肯形象的变化过程, 说明对林肯的集体记忆发生了剧烈变化, 但是也还在维持着。我国学者卢元伟在《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一文中, 也对社会建构的有限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如果过分强调历史记忆的建构性, 就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了“元历史”中某些恒定的、不可颠覆的内容。他通过对林则徐英雄形象建构的经验分析, 指出林则徐的历史形象是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这些变化依然受到某种制约。由此, 关于记忆“断裂”与“连续”的争论本质上是对社会记忆特征的争论, 而记忆本身具有的建构性与延续性特征是并存的, 两者存在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

记忆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过程, 它总是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往返, 从而在时间向度上呈现出人的生活、人的世界的不断积聚、丰富的无限过程。

“过去”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蕴藏在史籍文献、遗址、文物、文化传统、艺术宗教等种种实物的和形式的形式之中, 当过去以不同的形式被记载、记录在种种对象化产品中, 有关过去的社会记忆就产生了。这种社会记忆是“文本”性的存在, 是人类社会印迹的固化形式和结晶状态, 也是从过去向现实延伸、接续的纽带, 同时也作为人类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体会历史的对象而传承下去。而对于处在现实的当下的时空中的人类而言, 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过去积淀下来的社会记忆, 同时, 他们也会站在“今天”的视野范围之内, 依据记忆的现实情境和需求不同, 对过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修改、转换或补充, 即社会记忆建构。由此, 有些记忆被抹去, 有些记忆被重组, 有些记忆被不断重复, 过去的社会记忆被转换成了现实的社会记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社会记忆传承与社会记忆构建相辅相成。传承影响建构, 建构源自传承, 传承也是建构的再现。正是在这种传承与建构的交互演变中, 社会记忆的持续性与现实性、“根基性历史”和“表述性历史”得到有机的融汇, 形成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sup>[20]</sup>。

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工具、技术和媒介的出现深刻影响了记忆的塑造进程, 拓展了我们对社会记忆传承和社会记忆建构的理解。由数字技术支持的数字记忆具备了使记忆脱域的可能条件, 记忆的时间得到了无限延伸与自由转换: 数字技术帮助我们记录思想并捕捉某些时刻, 使我们与数字世界的每一次互动都留下了数据痕迹和元数据痕迹, 并且这种痕迹是很难遗失的, 使得更广泛的“过去”得以持久延续和保存; 数字时代的技术矩阵既赋予了社会记忆更多样的内容和维度, 也为记忆探索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且数字技术的迭代性、开放性特征使得数据收集、内容生成、文档记录等方面都会有迭代更新, 从而构建了关于“过去”的不同“现实”图景。在这场“过去”与“现在”的覆盖与反覆盖的记忆争夺战中, “获取真相”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数字媒介通过将当下的影像、符号和地景与过去相联结, 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数字记忆连续叙事得以整合。



从行为逻辑来看,目前数字记忆项目的记忆构建大致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迁移,即把现实世界的各种记忆直接转化为数字信息进行固化。如将建筑、街区、文物等空间资源通过三维建模、地理信息可视化、VR全景、球幕光源采集系统等技术手段予以呈现<sup>[12]</sup>。另一种是再造,即用数字方式生产和创建新记录、新记忆。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就是口述史项目,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开展的“东北抗日联军专题”“中国远征军”等项目;湖南图书馆“湖南红色记忆”口述项目,以湖南地区的“红色历史”和“杰出人物”为核心,以自行拍摄与外部购买的方式,综合图、文、音频和视频资料,通过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形式记录和保存完成对口述史料的采集。

“迁移”作为当下的人类呈现过去与召唤记忆的一种方式,力求实现对“过去”的真实模拟与完美复刻,“再造”强调当下的人类对过去的演绎,会被当前我们是谁所深深地影响。这意味着,数字记忆既追求以精准的现场还原度来呈现真实的“过去”,又通过记忆要素的“主题式生产”和“数字化加工”来印证与重构历史,从而实现了记忆的积淀、存储和破译、再生的上升性双向运动。

### 3.3 开放性与约束性的制约共存

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者完全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虽然社会记忆的生产受到国家、种族、组织、社团、家庭等公共性集体因素,以及宗教、政治、风俗、仪式、文化等普遍性社会因素的影响,“可能使之变得不可靠”,但这种真实性信任缺失并没有阻碍人们对社会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追求。社会记忆的形态由实物、体化记忆向文字、图片记忆,再向影视、电子化、多媒体记忆发展,正是人类力求记住过去而付诸努力的体现<sup>[21]</sup>。现如今,数字媒介将记忆行为带入了一个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这个空间的中心是“真实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和经历,是所谓不可撼动、确实实存的历史;虽然受不同记忆主体、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影响,最终呈现的记忆与“真实的过去”可能存在距离,但这些都是“真实的过去”的痕迹和道路,是对彼此的反思和证明。

开放性使得数字记忆能够充当最接近历史真实本貌的“见证者”,实现多元化的、有生命的、有立场的记忆书写,冲破同质化的记忆乌托邦的迷雾。开放

性建构是数字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数字记忆的开放性是由互联网的开放性所决定的。互联网的技术决定了信息呈开放式传播,一切信息可以尽可能地扩散到网络可以达到的地方,模糊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现实和未来、真实和想象、本真和仿象、实在和虚构、静态和动态、平面和立体、城市与乡村、国家与国际等之间的界限和边界,创造了一个任何形式的信息自由翱翔的无限领域,即所谓“赛博空间”(Cyberspace)<sup>[22]</sup>。在这个空间里,个体不再是单纯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可以随时转变成主动的贡献者,通过对特定事件的在线互动、记忆“场域”的再造,实现个体的记忆书写权力。此时的用户不仅在构建社会记忆,而且也以网络空间的开放式文本参与到社会记忆符号再造、影响开放的受众群体的话语实践中<sup>[22]</sup>,将个体的生活方式与在世状态以“微观记忆”的方式呈现;记忆书写话语也由宏大叙事转为生活叙事、个体叙事,使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都能在叙事情境中达成群体认同。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正在使“群众的书写实践”变得更加清晰。虽然因个体的主体差异性,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人生经历、经济水平等直接影响到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和解读,从而塑造了不同的个体记忆。但数字记忆的开放性使得大众可以实现对记忆文本的协作式书写,通过记忆的不断覆写与再生产,提供更加丰富、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记忆资源,这些记忆资源相互联结、相互印证,或者相互解构、相互排斥,形成了富有活力、富有张力的记忆空间,从而使得社会记忆可以以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其构建性在充当真实性代偿的基础上力求向真实性靠近。新加坡记忆是数字记忆开放性方面的典型代表,全民参与是新加坡记忆区别于其他记忆项目的重要特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是项目的牵头方,与该项目保持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有218个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遗产机构、公共机构、私人实体和社会公益组织等。他们还组织成立了181个志愿者记忆团队,帮助有困难的人去记录属于他们的记忆,同时每个新加坡人均可拥有一个账户来安放他们的记忆故事<sup>[23]</sup>。

数字记忆的开放性保障了用户的深度参与以及资源的深度挖掘,但是数字记忆的这种开放性并不是无所约束的,而是需要在一定的规范框架下实现,



“赋予储存的文化知识和符号以一定的结构”<sup>[24]</sup>。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曾说：“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分散的系统，总有一些框架在个体、代际、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将记忆和某些特别的时间视界与身份视界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联系不存在，那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记忆还不如说是知识。记忆是一种有着身份指向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其自身的知识。”<sup>[25]</sup>显而易见，有“一些框架”令记忆无法越轨。比如说作为记忆主体之物质基础的身体。记忆的主体本质性地体现为有意识、有情感的身体，那么从人类生理机制的层面来看，年龄结构、身体受损、心理创伤等都会导致记忆主体的记忆机制不健全。比如说记忆主体的“身份”。这里的“身份”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多地指向伦理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包含个体、代际、政治、文化、礼仪等诸多内容。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身体依托技术重获“身体在场”，以“数字身体”存在于记忆空间，个人数字痕迹的集合可以看作主体在虚拟空间的另一个身体，依据“图像化身”如头像、视频、表情符号等传递身份和信息<sup>[12]</sup>。那么，数字记忆记忆什么，谁来记忆，记忆的内容、态度，以怎样的方式记忆，选择怎样的途径表达记忆，都与“数字身体”所传递的“数字身份”息息相关。此时的“数字身体”背后除了隐藏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无可规避的记忆的倾向性，即政治层面和伦理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数据规约。

目前的数字记忆项目涉及到的技术包括数字化转换技术、数据库建设技术、存储技术、文本挖掘与分析技术、图像分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站设计技术、平台搭建技术、平台运维技术等。通过最有效率和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技术的运用，可以实现非数字资源的数字化、非结构数据的结构化、零散资源的规整化、无序资源的有序化，达到社会记忆目标的永续性、可扩充性与务实性<sup>[15]</sup>。记忆工程对记忆建构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和标准都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规范，从而在数据与技术的动态互动中实现对资源的有序整理与开发。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找到“收集、保存、提供利用美国记忆的最佳实践”，在元数据协议、数字内容保存、数字转换、文本标记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制定或遵循《文化遗产材料的基本类型术语》《国会图书馆的文本和图形材

料数字转换技术标准》《文化遗产材料数字化技术标准》《美国国会图书馆TIFF图像标签》《合同扫描服务的转换规范》《插图研究：打印插图的数字转换要求》等标准规范<sup>[26]</sup>。佛罗里达州图书馆和档案馆对摄影图像、录音、移动图像材料的数字化制定了规范与标准，也对存在于数字磁带、记忆卡、光盘格式等物理载体上，硬盘驱动器上或通过在线文件传输接收的原生数字视听材料制定了最低规范；在数字内容保存方面，佛罗里达记忆的硬件、软件和数据迁移都遵循《佛罗里达行政代码》中有关电子文件存储和迁移的规定。中国记忆项目依托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采用数字化编目、元数据著录标引、建立关联关系等数据采集加工方法，制定了《中国记忆项目资源建设技术标准》《中国记忆项目资源建设著作权、隐私权及法律问题说明》等；并且因其以口述历史工作为基础框架，还专门制定了《中国记忆项目口述史访问伦理规范》（访问者版和受访者版）等。

#### 4 数字记忆的反思

社会记忆是指涉伦理的事业<sup>[27]</sup><sup>18</sup>，其更多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当信息技术介入到记忆的生产、建构时，对记忆伦理的探究就必然涉及到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当下，信息技术与社会记忆的激烈碰撞促使社会记忆朝着“数字记忆”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记忆伦理问题，如数字记忆的开放性、共享性引发的隐私权问题，数据的真实性与记忆的真实性之间的争议问题，数据采集、存储、管理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取舍、伦理判断等问题，数据正义、数据歧视问题，以及已经被认识到且得到呼吁的被遗忘权问题。

记忆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负有竭力分享和保存记忆的义务<sup>[27]</sup><sup>152</sup>。记住的义务被视为记忆的核心问题，但现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能够被记住的信息的内容，改变了记住信息的方式<sup>[18]</sup><sup>171</sup>，从而促进了遗忘的终止。随着从遗忘到记住的转向，遗忘存在的合理性逐渐成为了记忆伦理中的核心问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遗忘问题：如何去遗忘，如何被遗忘；谁有权遗忘，是拥有生理身体的“我”还是依托技术实现了“身体在场”的“我”；遗忘与记忆在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遗

忘与记忆,社会如何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从而减少社会撕裂。作为社会记忆代理人的图书馆,肩负着调节大数据时代数字记忆伦理的社会责任,就需要从伦理规约、制度建设、文化培育等多角度入

手,对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传播等全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指导,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等多重博弈中实现调和,进而重建数字时代的记忆秩序、维护人类的尊严。

#### 参考文献:

- [1] 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 [2] 王晓琳,郑秀花.公共图书馆社会记忆项目的中国实践[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6):30-38.
- [3] 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3):4-16.
- [4] 加小双,徐拥军.国内外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J].2019(1):60-66.
- [5] 冯惠玲.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兼议数字记忆的方法特点[J].数字人文研究,2021(1):87-95.
- [6] 黄晨,虎娇玫.图书馆发挥社会记忆功能的思考[J].图书馆建设,2013(8):8-10.
- [7] 全根先.口述史、影像史与中国记忆资源建设[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5,24(1):10-16.
- [8] 廖永霞,韩尉.中国记忆项目资源组织初探[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5,24(1):17-27.
- [9] 韩尉.中国记忆项目文献资源推广的探索与实践[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5,24(1):28-31.
- [10] 张诗阳.赓续文化记忆:公共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和口述历史的实践与启发[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2):92-96.
- [11] 谢笑,王文韬,谢阳群.基于个人信息管理的全面数字记忆探析[J].图书馆,2017(1):17-23.
- [12] 周耀林,刘晗.数字记忆构建:缘起、理论与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20(8):50-59.
- [13] 周文泓,代林序,黄思诗等.国外图书馆主导的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进展:定位、路径与策略[J].图书馆情报知识,2022,39(2):20-29.
- [14] 申晓娟,石鑫,王秀香.国内外文化记忆项目的实践与启示[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2):14-21.
- [15] 杨文.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社会记忆构建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5):38-45.
- [16]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46.
- [17] FOOTE K E.To Remember and Forget: Archives, Memory and Culture[J]. American Archivist,1990,53(3):378-392.
- [18] 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19]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3.
- [20] 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6.
- [21] 丁华东.档案记忆研究的思想资源发掘[J].档案学研究,2013(5):4-8.
- [22] 黄卫星,张玉能.互联网的开放性与红色经典文化记忆[J].长江文艺评论,2018(6):78-82.
- [23] 陈静.全民参与式的新加坡记忆工程实施现状及启示[J].北京档案,2016(3):34-37.
- [24] 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彬,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
- [25] ASSMANN A, CONRAD S.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23.
- [26] 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79.
- [27] 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王晓琳, 硕士,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社会记忆、图书馆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研究; 郑秀花, 硕士,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王瑛琦, 硕士,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史等。

**收稿日期:** 2022-05-1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专题 图书馆记忆功能史论 ·

## 图书馆特藏建设研究\*

——基于读者接受维度的理论探索

王瑛琦 赵赫璠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 特藏的内涵正随着特色资源概念的扩展而泛化,厘清其概念是特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读者接受维度出发,特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审美活动,馆员是特藏资源的再创作主体,读者以阅读和审美的方式参与特藏建设,是复活特藏资源和实现特藏价值的建构主体。接受理论对图书馆人理解特藏的内涵、特藏建设方法及读者的教育都有重要启示和价值。

**关键词:** 特藏; 图书馆; 读者主体; 读者接受

**中图分类号:** G255.1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Reader Acceptance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is being generalized with the concept extension of special resources. Clarifying its concept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special collection activity is a kind of cre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nd aesthetic activity. Librarians are regarded as the subject of recreation of special resources. Reader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by reading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construction of reviving special resources and realizing the value of special col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 reception. Reception Theory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and is of great value for librarians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special collections, methods of special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of readers.

**Key word** special collection; library; reader subject; reader acceptance

### 1 引言

馆藏资源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资源建设的内容反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在资源的全面性上保障了图书馆整体的社会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一味强调

馆藏建设的统一性也带来了资源严重同质化的问题,尤其面临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图书馆越来越需要通过特色化与个性化的资源与服务彰显自身价值,此时,如何解决图书馆共性有余而特色不足的问题,成为图书馆事业转型中的重要任务。

特藏建设是新形势下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亦成为各类型图书馆改变传统服务模式、焕发

\*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课题“高校特藏的校园文化建构机制”(项目编号:2021-038-A);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记忆功能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TQ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活力与生机的重要方式<sup>[1]</sup>。当前,支撑特藏建设实践的应用性理论正在试图解决特藏业务的专业性问题,包括特藏建设的原则和方法<sup>[2]</sup>、特藏资源体系的选题与设计<sup>[3]</sup>、特色数据库的版权问题<sup>[4]</sup>等具体操作。间接支持特藏实践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却暂付阙如。基础理论是研究特藏的本体,解决特藏服务“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做”一类问题,指导图书馆人自觉开展特藏服务。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抓住特藏建设的本质问题,从建设目标与价值定位中提升特藏建设的内在品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借鉴接受学的相关理论,从读者维度探讨图书馆特藏建设的内涵及建设主体,以期丰富特藏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特藏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 2 特藏概念及其资源内涵的转向

特色收藏(specialist collection)简称特藏,在图书馆领域也称特色馆藏,或专业藏书<sup>[5]</sup>。随着特藏建设成为一股潮流,特藏的概念与边界愈发模糊不清<sup>[6]</sup>。特藏、专藏、特色资源、特色馆藏等称谓交替使用,包含的内容也不尽一致,有的图书馆专注于古籍和历史文献的建设,有的则扩展为各类专题专栏资源,或包括档案文书、高校文库、学位论文等类型,载体形态既包括传统文献,也包含缩微胶片、视频资源、数据库等。某种程度来说,特藏概念的不清晰反映的是对特藏认识的不充足,以及建设理念的不完备,因此,明晰概念理应是认识特藏建设本质的第一要务,更是准确定位建设目标与功能的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

从本体论来说,特藏建设的客体就是特色资源,对特色资源内容的定位直接反映特藏建设的思路与理念。仅从时间上来说,特色资源的定位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在传统语境中,古籍“善本”曾被认为是各国图书馆特藏中最核心、最具有代表性的资源,被誉为“镇馆之宝”。然而,随着图书馆特藏建设的开展,特色资源的内容也由古籍逐步扩展为具有历史价值和珍藏价值的资源。如早在15世纪的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就已成立特色收藏部门负责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书籍、手稿、照片和大学档案的保存<sup>[7]</sup>。与此同时,“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成为国外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重点内容,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曾明确表示,收藏第一手资料对教学和研究至关重

要<sup>[8]</sup>。时代的进步迫切需要图书馆以别具特色的资源彰显价值,因此,专题性与专业性特色资源应运而生,包括某一专题领域、某一特殊时期、某一地域、有关某一个人,甚至有关某一所院校的特色资源等。例如耶鲁大学2008年开始,将来自前艺术、建筑和戏剧图书馆的资源组合在一起,在艺术图书馆中创建一个专门以艺术为主题的特藏,内容包括艺术研究材料和实例,并命名为罗伯特·B·哈斯家庭艺术特藏<sup>[9]</sup>。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馆的特藏建设与发展愈来愈受到重视,对特藏资源定位的演变与国外图书馆相类似,即由强调资源的时间、版本的历史特色逐渐转变为强调资源的主题专栏特色。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徽学”特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徽州文书”等。

综上所述,特色资源的内涵正在逐渐泛化,正如耶鲁大学在对特藏下定义时所言:特藏“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定义”,尤其是在特藏的材料类型上,它可能包括“手稿、档案、稀有书籍、视听资料、文物和艺术品、电子文件”在内的任何类型的材料<sup>[10]</sup>。特藏内涵由“载体”向“内容”的演化是其概念泛化的关键,即对资源“特色”与否的评价由资源本身的特色转向了资源的“主题”特色。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主题的资源都可称之为特色资源呢?显然并非如此,特色资源必须有其概念的边界才能保证“特色”之意。

首先,特藏资源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对此耶鲁大学概括为:稀有性(因不可替代而需要安全的保存环境)、载体形态(因材料需要特殊的处理和存储环境)、全面性(不是个别独特或有价值的,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特定主题的重要信息体)。耶鲁大学的总结表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特藏定义虽然泛化,但特藏资源是具有共性的;二是资源的共性既表现为珍贵性(载体特色),即因个别资源载体本身的不可复制而需要特殊的保存方式,又表现为全面性(主题特色),即因整体资源内容的专业和全面而形成的资源共同体。

其次,特藏主题特色的发展产生专藏(专业收藏、专门收藏)的泛化。广义来说,特藏包括专藏,但二者亦又有程度上的区别。任何主题资源的集中处理都可以称为专门藏书,但其珍贵性与专业性(全面性)决定了进入特藏范畴的程度。举例而言,许多高校图书馆将本硕博毕业论文归入特藏范畴是值得商榷

的。但当某些毕业论文因特殊原因而成为研究一所高校、一届毕业生的特殊材料时,亦有成为特藏的可能。因此,专藏可逐步发展为特藏,但狭义的特藏必须与专藏相区别。

最后,特藏建设的目的最终指向读者。一方面,专业性(全面性)总是相对而言的,表明特色资源的判定标准正在转向资源利用维度,即作为某一主题的研究材料来说,相对是专业与全面的。另一方面,珍贵资源的集中保存亦是为了资源的利用,如耶鲁大学图书馆在共性描述中具体解释为强调资源和存储环境安全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读者对资源的长期利用。

总之,特色资源内涵的演化进程展现出特藏建设正在由强调个别资源特色转向强调资源的整体特色;由重视资源载体价值到重视资源内容的整体价值;由资源保存的特殊性转向其资源表达带来的特殊价值。而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读者已从传统特藏建设的隐形主体逐渐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显性主体。

### 3 读者接受:特藏建设主客体关系的理论阐释

特藏资源的内涵由强调资源的载体特色转向强调资源的主题特色,特藏建设随之由以资源为着力点的建设转向以服务为着力点的建设。图书馆特藏服务不同于普通馆藏服务,不只具有一般服务的知识服务性质,更重要的是从人文的维度来打造图书馆文化,服务于读者关于真、善、美的理解与品味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可以说,特藏服务是图书馆美学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美学角度阐释特藏建设是当前特藏内涵转向的内在要求。

“接受美学”的概念由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文艺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经姚斯和伊塞尔(Wolfgang Iser)的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的美学流派。接受美学的核心是把文学研究从作品、作者中心观转向读者中心观,认为读者不是文学作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创造者,是文学作品价值的最终的仲裁人<sup>[10]</sup>。从接受美学观来看,特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审美活动,馆员是特藏资源的再创作主体,读者以阅读和审美的方式参与特藏建设,是复活特藏资源的重要建设主体之一。

#### 3.1 实践属性:从特藏资源到特藏“作品”

“藏”与“用”是图书馆功能研究的核心,特藏

建设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提高图书的利用率,更好发挥图书馆资源的社会功能是特藏建设兴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如何实现特藏资源的活化利用亦是特藏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从美学的理论来看,“藏”与“用”首先表明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藏资源观,接受美学更易于阐释后者。

其一,一般的特藏观所理解的特藏资源是特藏文献本身,两者是完全切合一致的。因此,特藏建设围绕的中心是特殊文献资源的保存、修复、数字化,以及内容的挖掘、研究与展示,特藏的“美”亦在于文献本身。然而,在接受美学中,特藏建设的着力点并非文献本身,而是读者对特藏文献的接受,即对文献所表征的信息的接受过程。因此,特藏资源并非独立的文献文本内容,而是具有整体性、一致性的特色主题的承载、表达与接受的过程,本质上类似于一种“文学作品”,其审美活动是一种实践过程。

其二,特藏文献与特藏作品是两个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文献是独立的、单一的、静止的;作品则是整体的、相对的与运动的。具体而言,特藏建设是一种生产与创作的过程,特藏活动被描述为“揭示某一主题内容和资源的相互关系,构建一个具有知识内容性、层次关联性的知识(与文化)体系”<sup>[11]</sup>的建设过程。单纯特藏文献资源收藏与研究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它仅仅抓住了特藏建设总体活动中的一个维度,将特藏活动这一动态连续过程(文献—作品—读者)分割成静态封闭、互不相连的领域,忽视了特藏资源与读者鲜活的交流,以及其所表征和传达的信息的社会接受效果问题。

其三,特藏资源的利用问题就是特藏作品的读者及社会接受问题。接受理论认为,作品具有“未定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启示性结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其意义与功能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特藏作品的概念包括这样两方面,一是未定性的表意作品,一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这两方面合璧才是完整的特藏作品。这也就是说,没有读者的阅读,没有读者将之具体化,特藏只能是未完成的作品。

由接受美学出发,特藏建设可以解释为一种动态的由特藏资源到特藏作品的活动过程,即物质资源由馆员的能动性开发与组织成为一个未定性的“文学作品”,再经由读者的阅读实现社会价值与功能,这一

过程是历史的、变动的。

### 3.2 馆员接受：特藏建设的第一次接受活动

特藏资源作为“作品”超越文献本身的载体属性，不只体现在特藏建设的“藏用观”上，也表现在特藏建设的活动过程之中。特藏建设与一般的馆藏建设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先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预先设定好的分类标准（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而是通过对图书馆自身特色的开发与重组，形成的个性化的资源体系，即非“因类选书”，而是“因书设类”。可以说，没有一个图书馆的特藏分类标准是相一致的。因此，特藏建设的总体活动中，馆员作为“第一读者”，在资源类别设置、选取、分类与展示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能动作用。

在特藏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馆员是特藏建设的第一接受主体。特藏主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精神创作过程，并非一个直线的馆藏资源建设过程（见图1）。与因类选书不同，“文本”是特藏建设的出发点，即特藏是文献符号所携带的意义的组织。馆员进行特藏资源建设，实质是完成将符号意义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馆员将完成两次接受活动，第一是馆员与特藏资源文本的信息交流活动，会直接影响特藏主题及其“作品”的生产；第二，馆员还必须预测读者对特藏资源的接受和参与，从而影响最终的作品生成（见图2）。



图1 一般（资源型）馆藏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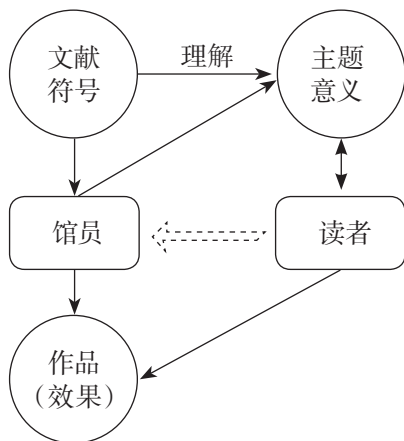


图2 特藏（主题型）馆藏建设

馆员对特藏体系建构的过程，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包含交流、理解与接受在内的积极的建构行为，是一种二度创作的过程。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认为，作品的意义应该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读者所赋予的，后者起决定作用<sup>[12]345</sup>。由此可以说，特藏的意义是资源本身的意义、馆员理解的意义与读者接受的意义之和，而读者接受是前两者实现的基础。那么，读者是如何影响馆员的建构过程的？伊瑟尔提出“观念的读者”，指抽象出来的读者概念，或可理解为“隐在的读者”“想象的读者”。一方面，馆员在创作时观念里会存在预设的读者，馆员在创作过程中难免无意识地考虑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读者有自身的“期待视野”（或译为“期待水准”），即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现在结构<sup>[13]16</sup>。姚斯认为“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积淀的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sup>[12]340-341</sup>。换言之，馆员所创作的特藏作为“新作品”，成功与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密切相关的，读者接受深刻地影响馆员的创作思想。

### 3.3 读者接受：特藏建设的第二次接受活动

读者中心论强调，图书馆所谓的特藏，在未经阅读之前，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是与其他馆藏资源一样，处于一般资源的位置。类似于加达默尔所说的“为观者为存在”的观点，“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阅读根本是从属于文学的艺术作品”<sup>[14]</sup>。这就是说，图书馆特藏建设试图阐释与传达的独特意义，必须建立在读者接受的基础之上。

首先，读者参与是特藏建设的永恒目标。当前特藏建设与研究总是无意识地割裂特藏资源与读者的联系，将读者参与误解为与建设本身无关的环节。事实上，特藏是在不断与读者对话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比图书馆中的任何文献都更渴求读者的阅读。换言之，读者参与建构是特藏区别于传统馆藏服务的本质要求，作为“作品”，“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sup>[13]26</sup>。从接受美学来看，读者的作用犹如演奏音乐的人，是文献活化利用的关键，文献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并非“特色”，读者对有序组织的独特意义与价值的接受与创造性



参与,是定义特藏之“特”的标准。

其次,读者接受是特藏建设的“中心”。特藏之“特”在于读者并非以一般文献的标准衡量它的价值。特藏不是由文献本身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馆员(第一读者)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因此,读者并非特藏建设中被动的接受主体,而是主动的建构者。一方面,特藏作品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在考虑读者的参与问题,无论是特藏主题的选择与建构,还是以活动、展览与专题研究等方式的表征,读者的“期待视野”无时不隐性地参与创作;另一方面,读者亦是特藏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姚斯说“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的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姚斯对读者创造力量的肯定有二重含义,一是读者阅读实现了特藏的价值,所谓特藏的“活化利用”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二是读者阅读复活了特藏的生命,只有被读者接受的特藏才能真正进入了历史的进程,反之则仍是处于“遗忘之阁”的一般馆藏的位置。

再次,读者接受是历史的动态过程。接受理论认为,读者的阅读行为是一种解释活动。从这一点来说,特藏作品的接受具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形式。所谓垂直接受,即从历史沿革角度考察作品的接受、评价和影响的情况,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因各自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对同一主题、同一作品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解释和评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人的历史局限性以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原因,即“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sup>[12][34]</sup>。所谓水平接受,即指同时代人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状况。姚斯认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包蕴了接受的全部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读者接受过程就是特藏生命的历程,如艾柯“开放的作品”传递的信息,每个读者都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作品的意义,这些独特的理解不断注入到经典的诠释之中,一代一代传承更迭<sup>[15]</sup>,站在特藏建设的角度,即读者参与是延续特藏生命的关键。

总之,图书馆特藏建设之“特”的典型特征就是“为读者而存在”,正如耶鲁大学特藏描述中所传达

的,珍贵文献的保存与特殊主题资源的组织都是为了增强读者的利用。用接受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图书馆的特藏建设史实质上是读者的接受史,读者既是特藏建设的接受者,亦是“仲裁者”,并以其交流互动发挥建构者的功能。

#### 4 结论与启示

文献资源的保存与利用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在信息稀缺的时代,是文献存储基础之上的利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则是利用基础之上的保存。之所以这样说,在于信息过载加速了遗忘,利用才能使信息资源“复活”,活在人类记忆中的信息才称得上得到保存。图书馆特藏建设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读者接受(利用)应然是其建设的着力点。接受美学不是美学中的美感研究,也不是文艺理论中的欣赏和批评研究,而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接受理论,它对特藏的理解、特藏建设乃至读者的审美教育都有很大的启示性意义和借鉴价值。(1)对特藏内涵的启示。从接受理论出发,特藏建设是指文献资源的独特价值被读者所接受,并在与读者交流互动过程中得到建构与丰富,从而复活和延长文献资源生命力的过程。因此,特藏建设研究的对象非资源本身,而是特色资源的独特性;研究的重点内容是馆员与读者对资源独特性的接受、交流与建构的理论与实践。(2)对特藏建设的启示。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视野融合”,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特藏的符号表征相融合,才谈得上接受和理解。因此,馆员在组织资源时,应当考虑当下读者的期待视野及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也就是说,读者成为没参与创作的作者。这里所谓的期待视野,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接受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读者期待视野的动态性,即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特藏在表征信息时要适当加大内容的“未定性”和空白度,以激发人们的理解和想象,给人们的想象和理解留下广阔的天地。(3)对特藏欣赏和效果的启示。接受美学是读者学,是研究读者积极能动作用的科学。传统视阈中,读者的阅读是由资源特色所决定的,是消极的、被动的,所以读者中心只是资

源建设理论的附属部分。在接受美学中,馆员表现什么并非重心,关键是读者发现了什么。这样资源与馆员都丧失最高裁判权,而读者却如姚斯所说成为“仲裁人”。因此,持续关注读者的反馈是必要且必须的,读者的阅读与欣赏甚至超越了资源本身。(4)对读者教育的启示。读者与特藏资源的交流与互动就是对特藏作品的创造,读者就是作者。这就要求读者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而这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教育才能达

到。接受美学提示图书馆,要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知解力和想象力的教育,提高读者期待视野,才能促使更好的特藏作品生产。

接受理论是真正的“读者中心”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特藏资源本身、脱离图书馆员实践的读者中心。它只是强调读者维度对特藏建设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并时刻提醒馆员,特藏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接受过程,读者不只是被动的参与主体,而是建设主体,应充分发挥读者的能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王纯.特色文献资源与特色服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0(3):20-21.
- [2] 金以明.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26(6):93-97.
- [3] 杨宁莉,刘家新,于晓燕.高校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建设选题方案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54-56.
- [4] 贺延辉.高校图书馆网络数据库资源的建设与利用:兼论其中的版权问题[J].图书馆建设,2003(1):43-45.
- [5] 王知津.英汉信息管理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728.
- [6] 王雨卉.图书馆特藏概念廓清[J].图书馆论坛,2012,32(5):105-108,46.
- [7]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EB/OL].[2022-06-09]. <https://www.st-andrews.ac.uk/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
- [8] 兰小媛.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特藏发展与实践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6(10):30-35.
- [9] Arts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EB/OL].[2022-06-09].<https://guides.library.yale.edu/alsc?hs=a>.
- [10] 周末祥,戴孝军.走向读者——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独特贡献[J].贵州社会科学,2011(8):4-16.
- [11] 王喜和,傅林红,李玖蔚,等特色之困:国内大学特色数据库建设现状与反思[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4):47-58.
- [12]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13]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14]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31.
- [15] 张晶,刘璇.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J].学习与探索,2019(2):182-188.

**作者简介:** 王瑛琦, 硕士,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史等; 赵赫璠, 硕士,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特色资源建设。

**收稿日期:** 2022-05-11

**本文责编:** 李芳

## 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与区分保护研究

巫 慧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日趋完善。读者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下虽得以保障,但仍存盲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虽将读者信息分为个人信息、借阅信息、其他可能涉及隐私的信息三类,然而并未对其内涵作出具体阐释。通过对读者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区分,明晰不同类型读者个人信息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读者身份信息、借阅信息、隐私信息的法律属性,进而实现法律保护上的区别对待,对健全并完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读者个人信息; 隐私权; 权益; 区分保护; 行为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Typology and Differentiation Protec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erfect. Although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protected under the legal framework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ere are still blind spot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ublic Libraries* classifies patrons' information into three categories: personal information, lending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at may involve privacy, but it does not explain its connotation specifically. By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clearly defining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readers' identity information, lending information,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on this basis, and then realizing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in legal protection,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protection of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read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of privacy; equity; differentiation protection; behavior regulation

实施于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其中第43条将读者信息分为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但该法并未就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隐私信息之内涵或外延作出列举式或原则性的阐释。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对个人信息的定义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

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2020年5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34条对个人信息的内涵作了扩展,从《网络安全法》中的“识别自然人身份的各种信息”扩展至“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而于2021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相较《民法典》中个人信息的界定,其内容涵盖又更为宽泛。其第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



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即除了“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外，还将“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信息”纳入到个人信息保护的范畴。在《个保法》这一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法正式施行的背景下，厘清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别，廓清各类信息涵盖的范围是读者个人信息得以有效保护之前提。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规定，适用《民法典》保护个人信息，首先要明辨行为人为侵犯的是个人信息权益还是隐私权这一法定人格权。因此，在类型化读者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有必要清晰界定不同类别读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方能进一步针对不同属性的读者个人信息构建相应的保护模式，完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 1 基于《公共图书馆法》的读者个人信息分类

根据《公共图书馆法》关于读者个人信息的分类，参照《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个保法》中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依体系解释可以推知，《公共图书馆法》第43条中与“借阅信息”“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并列的“个人信息”，并非《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个保法》中所称的广义的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而应是狭义的读者身份信息。据此，可将读者的个人信息分为三类：读者的身份信息、借阅信息、隐私信息。

### 1.1 读者的身份信息

读者的身份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读者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读者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如住址、电话、邮箱等静态维度的信息。读者的身份信息以“身份识别性”为突出特征，即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确定信息主体“是谁”，具体包括可直接识别特定读者以及可间接识别特定读者身份的信息。前者指身份识别性中的“已识别”情形，其无需借助其他信息即可识别特定读者，如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后者指身份识别性中的“可识别”情形，即存在识别可能性，需与其他信息结合方能识别特定读者，如年龄、职业、联系方式等<sup>[1]</sup>。

明晰读者身份信息外延的关键，在于确定“识别”和“可识别”之内涵。对于“识别”，可采取“区分”或“联络”之标准，能够将特定读者个人从其所

处的群体中区分出来，或者能够通过该信息联络到特定读者个人的，就构成“识别”<sup>[2]</sup>。对于“可识别”这一间接识别情形，《民法典》第1034条虽有规定，但“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之标准过于抽象，需加以厘清以避免身份信息界定宽泛导致个人信息泛化的问题。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序言第26条提到：“为判断自然人身份是否可被识别，需要考虑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如“对身份进行确认需要花费的金钱和时间、现有处理技术以及科技发展”。欧盟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29WP）进一步指出，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识别身份之目的、数据处理的结构、负责实体所期望的好处、数据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组织措施失效的风险和技术故障。同时，还应考虑处理数据时的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处理数据期间可能出现的技术发展情况”<sup>[3]</sup>。基于此，可间接识别读者的身份信息须为识别成本低于个人信息可识别标准所欲保护法益的信息。在“余某诉查博士”<sup>[4]</sup>一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即提出，间接识别需要综合考虑行为成本，如技术门槛、第三方数据来源、经济成本、还原时间等。

### 1.2 读者的借阅信息

读者的借阅信息是与读者利用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读者在图书馆进行文献检索、文献咨询、文献阅览、文献外借过程中所记录的读者个人信息以及借阅行为、借阅倾向等信息”<sup>[5]</sup>。读者的借阅信息以“阅读相关性”为突出特征，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确定信息主体“读过什么样的书”或者推测出信息主体在阅读面向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读者的借阅信息作为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之一，当然具有“识别性”这一本质要素，但是借阅信息识别的重点并非读者的“身份”，而是读者的“阅读特征”。借阅信息包括静态维度的历史借阅记录，以及动态维度的电子文献浏览、资源搜索查找等行为轨迹信息，后者是在读者借阅活动中产生的与读者个人阅读活动相关的痕迹信息。通过借阅信息可以勾勒出读者在阅读偏好、阅读习惯、文化修养、研究方向等方面的个人人格形象，从而达致识别读者阅读特征之效果。

欧盟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将个人信息的“相关性”解释为内容相关、目的或结果相关，规定满足其中任一相关性的即为个人信息<sup>[3]</sup>。参考这一相关性

解释,可以将读者的借阅信息分为与阅读内容相关的借阅信息及与评价读者相关的借阅信息。从读者的文献阅览、借阅记录等信息中可以知晓读者的阅读内容,这些直接反映读者历史阅读情况的信息即为与阅读内容相关的借阅信息。读者的文献检索、文献咨询、到馆情况等信息虽然不能直接反映读者的具体阅读情况,但其可被用于评价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活动,继而对特定读者个人产生影响,属于与评价读者相关的借阅信息。需要强调的是,有些借阅信息本身虽不能描绘出读者的阅读特征,但是当这些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时可能就刻画了读者某一方面的人格形象,即借阅信息在量上的叠加可能带来质上的突破。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潜力无限,技术的进步可能使当下不能用以评价读者的借阅信息在将来实现评价读者的效用,即与评价读者相关的借阅信息之边界会随技术发展而动态扩张。基于此,对于与评价读者相关的借阅信息应宽泛定义,只要存在用以分析读者阅读特征之可能性,就应划归为读者的借阅信息。

### 1.3 读者的隐私信息

读者的隐私信息是读者在利用公共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私密信息,如“读者参加阅读活动的隐私信息、图书馆监控设备记录的读者隐私信息、图书馆移动定位和跟踪信息等”<sup>[5]</sup>。读者的隐私信息以“私密性”为突出特征,具体可分为两类: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隐私信息,以及如被不当利用将侵扰读者生活安宁的隐私信息。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隐私信息本身能够识别出特定读者并具有私密性内容,一经披露即会对读者隐私造成侵害,此类隐私信息强调的是“隐私”中“隐”的面向。这一类隐私信息的“识别”功能远超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所要求的“识别特定自然人”,其内在逻辑是将“识别”视为已经知晓特定自然人的私密信息<sup>[6]</sup>。如被不当利用将侵扰读者生活安宁的隐私信息则可借助辅助信息间接识别到读者,其如被不当利用会对读者的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此类隐私信息的核心在于“隐私”中“私”的面向。不同于一般的私密信息,此类隐私信息具有场景依赖性,对其是否为隐私信息的判断是结果导向的,即以读者的生活私域是否被实际侵扰为判断标准。

在判断读者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隐私信息时,不仅须考察主观要件即读者个人存有

的主观隐私期待,而且要考察客观要件即读者的主观隐私期待应符合社会的一般合理认知。按照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微信读书侵权案”<sup>[7]</sup>中的裁判,读者的如下阅读信息若符合社会一般合理认知下“不愿为他人知晓”之标准,则属读者隐私信息:一是某些特定阅读信息落入了共识的私密信息范畴,二是虽然各阅读信息分别不属于共识的私密信息,但积累到一定数量并结合主体身份,该信息组合可达到对信息主体人格刻画的程度,则一经泄露可能造成其人格利益损害。此外,鉴于隐私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交叉重合关系,对于隐私信息的认定还可参照《个保法》第28条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之判定标准。即如果读者对“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存有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主观意愿,那么该类信息亦属于读者的隐私信息。

对于如被不当利用将侵扰读者生活安宁的隐私信息,则应考虑外部场景进行个案判断。此类信息在普通场景中或许不会侵犯读者隐私,但是在典型场景中如发生了受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时,倘若公共图书馆公开与事件相关的读者借阅记录、馆内监控视频等,使得公众能够借助这些信息进行“人肉搜索”,识别到特定读者个人,导致读者遭受社会的歧视性待遇,私人生活安宁受到侵扰,那么此种情况下被公共图书馆公开的读者信息就属于读者隐私信息的范畴。

## 2 不同类型读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在明晰读者个人信息分类的基础上,有必要厘清读者身份信息、借阅信息、隐私信息的法律属性,这是构建读者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的逻辑起点。

### 2.1 作为权益保护的读者身份信息与借阅信息

《民法典》以法律形式正式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规定,在第四编人格权编第1032条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之后,第1034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其后通过的《个保法》第1条对个人信息的定性为“个人信息权益”。由现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体例编排和条文措辞可知:其一,现行民法仅承认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尚未承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其二,不同于已被法律明确作为“权利”所保护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是尚未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一种

“权益”。读者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信息的下位概念，其法律属性当然也同样是未被权利化的人格权益。

法律之所以将读者的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作为权益保护而未纳入权利体系，根本原因在于“权利只能设定于特定的客体之上”<sup>[8]</sup>。而如前所述，可间接识别的读者身份信息的判定标准较为抽象，读者借阅信息的外延则会随技术进步逐渐拓展，这意味着读者的个人信息不具有权利客体所要求的具体特定且边界清晰之品质。而一旦权利的客体无法清晰界定，绝对权的设置毋宁是对他人自由的侵害<sup>[9]</sup>。也就是说，读者个人信息客体的不确定决定了其法律上的权益而非权利之属性。不同于对权利的全面且充分保护，法律对于权益的保护是适度 and 必要的。法律对读者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的保护，并非意在赋权读者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绝对支配，而是重在保障读者信息在被利用时其背后的精神性人格利益和财产性人格利益不被侵害。其中，精神性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财产性人格利益则包括个人信息被用于市场，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以及被非法利用而使信息主体遭受的财产损失<sup>[10]</sup>。

读者对其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虽然没有完满的绝对排他权，但仍享有积极控制的权能。《个保法》在第44条、第45条、第46条、第47条中规定了个人对其信息享有决定、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能，表达了法律对个人自主控制其信息的尊重与保障。申言之，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属于读者的积极性信息权益，读者“有权决定其个人信息能否被他人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有权要求信息处理者修改不正确、不完整的个人信息以保证信息质量，有权针对商业目的的个人利用获取报酬等”<sup>[11]</sup>，以避免他人处理读者信息的行为侵害读者利益。需要强调的是，读者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的人格权益属性并未否定读者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在大数据时代，通过读者的借阅信息能够识别特定读者“读过什么样的书”，而一旦知晓读者“读过什么样的书”在很大概率上就能够准确预测该读者“将会读什么样的书”。借助智能算法对读者已实施的阅读行为进行分析，能够得知其阅读倾向和喜好，进而推测出其将来可能的阅读活动，实现公共图书馆或第三方与读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从读者的借阅信息中可分析得出准确的预测信息，正是读者个人信息蕴含财产性利益的源泉所在。此一财产性利益可依

据《民法典》第993条之规定通过许可他人使用的方式得以实现。

## 2.2 纳入权利保护的读者隐私信息

如前文所述，读者隐私信息包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隐私信息和如被不当利用将侵扰读者生活安宁的隐私信息。前者是信息社会时代下的产物，后者是传统意义上隐私权的内容，二者分别对应《民法典》第1032条中自然人隐私权的两项内容：“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隐私权的设计以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保护为重心，相较于促进信息的自由流转，其更侧重对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的限制。《民法典》第1033条即规定，未经法律授权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隐私。法律之所以对隐私信息适配权利化这一更高层次的保护，根本原因在于隐私信息与自然人人格尊严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隐私权作为典型的精神性人格权，保护的是自然人的消极性权利<sup>[12]</sup>。正是基于隐私权的消极特性及其承载的人格尊严价值，《民法典》第993条在规定民事主体可将其姓名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客体即姓名、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时，明确通过但书规定将隐私排除在商业化利用之外。同样，对于被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读者隐私信息，读者享有的是消极性信息权利，是读者防范他人滥用其隐私信息的权利。读者的隐私信息不具有绝对权的支配性，仅具有消极的被动防御性。这意味着，一方面，对权利主体即读者而言，其“不能积极主动地行使隐私权，而只能在其遭受侵害时请求他人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sup>[13]</sup>；另一方面，对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而言，不同于读者的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对于读者的隐私信息，并无合理使用之情形，《民法典》第999条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规定不能适用于读者的隐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个人在一些合法及有益社会之情境下与他人分享信息的需要，隐私的标准不应是绝对的，而应是相对的<sup>[14]</sup>。虽然隐私权是一种被动的消极权利，但是自然人对其隐私仍享有宽泛的自主决定权。具体而言，读者有权选择在何种情境下、对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分享个人的隐私信息。读者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主体披露的隐私信息不会因这一披露而丧失其私密性，其仍应作为隐私信息受到保护。申言之，对隐私信息与其原生空间的匹配关系须给予



连贯的维护,将自然人在特定空间下分享的隐私信息传播到另外的空间,即突破隐私信息与其原生空间的匹配,可能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sup>[15]</sup>。如果公共图书馆未经读者明确同意将读者在参加阅读活动中分享的隐私信息公之于众,即当属侵犯读者隐私权的行为。

### 3 不同类型读者个人信息的区分保护

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及其法律属性的界定实为前置性的分析,对读者个人信息进行区分保护才是最终的落脚点。鉴于民法对权益和权利的保护方式不同、救济方法有别,有必要对读者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采取不同的法律保护模式。具体而言,对于尚未上升至权利属于法定权益范畴的读者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应以行为规制的模式提供法律保护;而对于法律明确规定为权利属于隐私权范畴的读者隐私信息,则应以权利赋予的模式提供法律保护。

#### 3.1 读者身份信息与借阅信息的行为规制保护模式

对于读者身份信息和借阅信息的保护虽然既正当且必要,但因其客体的动态性,对其予以赋权保护并不可行。此时,通过行为规制这一事前保护模式,对收集、利用读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以规范,可以明确信息处理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边界,达到保障读者相关权益免受侵害之目的。行为规制模式是通过对他特定行为的控制来构建利益享有者的利益空间,其对利益享有者保护的范围和力度相较权利模式均要弱一些<sup>[16]</sup>。行为规制模式的基本逻辑为:通过规定信息处理者可行为或不可行为的范围来反推信息主体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之权益范围。不同于赋权模式对权利保护的侧重,这一模式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同时,还注重维持信息私益保护和信息公共利用之间的平衡,即在保障个人信息享有者法定利益空间的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大程度的行为自由。在此意义上,对读者个人信息采取行为规制的法律保护模式正与我国《个保法》的制定目的完全契合,即“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信息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sup>[17]</sup>。

《个保法》与《民法典》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并存的基本法,两者的立法与适用是平等协调、互为补充的<sup>[18]</sup>。《民法典》第111条以行为规制模式确立了行

为人的信息安全保障之作为义务与禁止非法处理、买卖信息等不作为义务。而《个保法》本质上就是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法,其旨在防范个人信息不当处理或滥用的行为<sup>[19]</sup>。它通过调整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来保障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积极权能。在行为规制模式下,我国《个保法》采用了抽象的规范技术,其第5条至第9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五项基本原则: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目的原则,公开透明原则,质量原则,以及责任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信息处理的各个环节应根据其具体行为各有侧重地遵循这五项基本原则的合规指引,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开展信息处理活动。

在这五项基本原则中,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具有统领作用,相较其他基本原则蕴含更高位阶的制度价值<sup>[20]</sup>。同时,这一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联系紧密,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其他基本原则的内容。首先,合法原则评价的是信息处理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基于此原则,个人信息处理须符合告知同意这一程序性规则。按照《个保法》第14条、第17条的规定,信息处理者负有告知义务,应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读者告知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处理信息的种类,保存期限等事项;读者应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同意的表示。《个保法》第15条还规定了撤回同意机制,即读者有权撤回其信息处理同意,对此信息处理者需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此外,如果信息处理者将读者信息授权给第三方使用,按照“新浪微博诉脉脉案”<sup>[21]</sup>中确立的三重授权原则,第三方还应获取读者的二次同意方可使用读者信息。未经过知情同意之程序即收集、利用读者信息,是信息处理者侵害读者个人信息的主要行为样态。

其次,正当、必要原则评价的是信息处理行为的实质合法性。正当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应有特定、明确、合理的目的,目的表述不能宽泛、抽象,需尽可能地包含足够的细节,且目的要符合公共利益和合法的私人利益<sup>[22]</sup>。必要原则则为信息处理者设置了消极面向的禁止过度损害义务和积极面向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具言之,根据《个保法》第51条、第55条的规定,处理读者信息时应根据信息处理目的、信息处理方式、信息种类以及对读者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对读者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并在法定

情形下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这即为禁止过度损害的具体要求。在信息安全保障方面,《个保法》第47条、第57条规定,信息处理者在法定情形下应主动删除个人信息,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等。最后,诚信原则为信息处理者提供了价值上的导向,要求在信息处理的整个周期中对读者要保有基本的善意,尊重读者的合理信赖<sup>[23]</sup>。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及其细化条款通过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设定义务的方式,明确了信息处理者须承担民事责任的侵害个人信息之违法行为,保护了信息主体的权益。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依据这一原则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制度价值,可进一步制定具体规则以促进个人信息处理规范的完善。

此外,在归责原则上,《个保法》第69条规定了适用于信息处理者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据此,读者的身份信息、借阅信息被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而给读者造成财产损失的,即可要求侵害方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侵害方不能证明其无过错的,即应承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赔偿数额按照读者所受损失或侵害方所获利益确定,难以确定的,则由法院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此条规定可与《民法典》第1182条的规定对接,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具体侵权行为和方式、造成的后果和影响等确定”<sup>[24]</sup>。

### 3.2 读者隐私信息的权利赋予保护模式

读者隐私信息是群己权界的终极防线,是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为其提供了更高强度和维度的权利化保护。作为消极防御权利,法律无需列明隐私权的权项,而是通过侵权机制对其进行保护,致力于个案损害填平等特点<sup>[25]</sup>。虽然《个保法》和《民法典》都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但是相较之下,《个保法》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而《民法典》更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事实上,《个保法》规制的对象限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而非隐私权的义务主体不特定的任何人,且《个保法》全文均未出现“隐私”或“私密”之措辞。申言之,读者的隐私信息主要是通过《民法典》来保护的。在赋权模式之下,《民法典》为隐私信息提供了具有积极预防功能的事前救济和具有填补损害功能的事后救济两种保护路径。

当侵害读者隐私信息的行为虽未对读者造成损害但却存在妨碍或侵害的危险时,读者可行使《民法典》第1167条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实现事前救济,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基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固有权利属性,读者行使的人格权请求权不存在构成要件或适用归责原则的问题,只要具备行使要件即“侵权行为危及读者人身、财产安全”时就可行使<sup>[26]</sup>。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途径包括传统的诉讼程序以及非讼程序,后者规定在《民法典》第997条的人格权禁令中。根据此条规定,要适用人格权禁令,读者须证明如果不及时制止行为正在或即将实施的侵害其隐私信息的行为,将使读者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鉴于隐私信息一旦被非法披露或私人生活安宁一旦被非法侵扰,对于读者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因此“只要具有造成精神损害的可能,就可以认定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sup>[27]</sup>。

当读者的隐私信息已经遭受侵害并给读者造成损害时,读者则可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来实现事后救济。按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规定,侵害读者隐私信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意味着判定行为侵犯读者隐私信息须符合四个构成要件:有侵害隐私信息的行为、对读者造成了损害后果、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存有过错。具体而言,侵害读者隐私信息的基本行为样态有两种:其一是非法披露读者隐私信息,其二是在特定场景下非法利用读者信息致使其生活私域遭受侵扰。损害后果则主要表现为精神损害,即导致读者精神痛苦,包括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羞愧等<sup>[28]</sup>。只要隐私被侵害的事实存在,即具备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要件,就构成侵权责任<sup>[29]</sup>。申言之,不同于侵害物质性人格权,侵害作为精神性人格权的隐私权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侵权要件,对于非法披露读者隐私信息的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由法律允许或经过读者明确同意的披露其隐私信息的行为,就须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特定场景下非法利用读者信息的行为,只要造成对读者私人生活安宁的侵害,“无论是否获得他人的私生活秘密,即使并未公开所获信息,也构成对隐私的侵害”<sup>[30]</sup>。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可采用条件说<sup>[31]</sup>,即只要非法披露和非法利用行为会给社会一般人造成精神痛苦,则因果关

系成立。对于行为人存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一方面,应针对不同的侵权主体能动地分配举证责任,如当侵权主体是信息处理者时,当然须依照《个保法》第69条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由侵权方证明其行为无过错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侵权主体为非信息处理者的一般民事主体,鉴于隐私信息侵权中读者举证难度大,“法官可运用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如侵权人提出抗辩则举证责任转移,如其不能反证,则认定其侵害隐私权”<sup>[32]</sup>。另一方面,对于属于读者隐私信息的敏感个人信息部分,其保护级别应更高,在过错认定上宜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 4 结语

##### 参考文献:

- [1] 谢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边界的界定[J].学术研究,2019(3):69-75.
- [2]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定义的再审视[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6(10):70-80.
- [3]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Opinion 4/2007 on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data.01248/07/EN WP 136[EB/OL].[2021-12-02].<https://ec.europa.eu/>.
- [4] 余某诉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0192民初928号民事判决书[EB/OL].[2021-12-02].<https://www.pkulaw.co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解读》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170.
- [6] 赵精武.个人信息“可识别”标准的适用困局与理论矫正:以二手车车况信息为例[J].社会科学,2021(12):126-135.
- [7] 黄某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6142号民事判决书[EB/OL].[2021-12-02].<https://www.pkulaw.com/>.
- [8] 李永军.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544.
- [9] 金耀.个人信息私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转进[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5):75-89.
- [10] 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J].法学论坛,2018(1):34-45.
- [11]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94.
- [12] 冉克平.论《民法典》视野下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与利用[J].社会科学辑刊,2021(5):2,103-111.
- [13] 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现代法学,2013(4):62-72.
- [14] SANDEEN S K.Relative Privacy:What Privacy Advocates Can Learn from Trade Secret Law[J].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2006(3):667-708.
- [15] 黄章令.重塑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权法理:以隐私权概念为主要内容[J].月旦民商法杂志,2018(12):131-162.
- [16] 叶金强.《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J].中外法学,2017(3):645-655.
- [1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说明》[EB/OL].[2021-12-26].<https://www.pkulaw.com/>.
- [18] 龙卫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法定位与保护功能:基于新法体系形成及其展开的分析[J].现代法学,2021(5):84-104.
- [19] 高富平.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个人权益保护:“个保法”立法定位[J].学术月刊,2021(2):107-124.

(下转第61页)



· 学术论坛 ·

## 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图书馆力量\*

——图书馆时代价值和未来走向的再认识

欧阳菲

(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24)

**摘要:** 新的一百年,面对浙江建设“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定位,图书馆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要贡献图书馆力量。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图书馆的时代价值,即图书馆是人类文化的窗口、教育的窗口、信息的窗口及保存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窗口,在建设“重要窗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找准定位,坚持走向法治化、走向协作化、走向数字化、走向国际化,高水平建设图书馆事业,使图书馆成为浙江省文化重要窗口的展示者。

**关键词:** 重要窗口;图书馆;时代价值;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G259.2755 **文献标识码:** A

### Library'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mportant Window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Library Times and Future Direction

**Abstract** In our efforts to reach the second goal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libraries,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ortant window" and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in Zhejiang.

We should be deeply aware of the value of libraries in our times, that is, libraries are the windows of human culture,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We must find the right position i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onstruction of "important window",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collabor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uild the library business at a high level, and make the library become the showcase of the important window of Zhejiang culture.

**Key words** important window; library; value of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Zhejiang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使命,为新时代浙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中共中央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支持浙江建立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标石”,也是“重要窗口”“文化共同富裕”建设中不可或缺

的领域,对弘扬先进文化、展示优越性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目标定位,图书馆人要迅速行动起来,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勇立潮头,在浙江大地铺就现代化的图书馆新篇章,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图书馆力量。

#### 1 深刻认识图书馆的时代价值

\* 本文系浙江音乐学院院级课题“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图书馆力量”(项目编号:2021KL020);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文化和旅游调研课题的研究成果。

图书馆工作是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的老同志们回信时强调：“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习总书记的回信明确指出了图书馆事业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也更加明确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和重大使命。这一关于图书馆职能的崭新定位，把图书馆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sup>[1]</sup>。

### 1.1 文化窗口作用

图书馆是文化的窗口，是提高人们基础文化水平的场所，有保存和传递人类社会记忆、知识、文化的作用，是人们共享人类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的保障，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纽带，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图书馆，老子曾担任最早的图书馆馆长“守藏室之史”。西汉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首次在政策上明确了政府征集图书的规定，并建立了颇具规模的馆舍收藏图书。图书馆发展至今，实现了纸质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的协同发展，以更便利、更快捷的网络资源拓展信息的交流和利用，真正达到文化资源共享，为人类创造出更深远、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提供条件。

### 1.2 教育窗口作用

图书馆是教育的窗口。蔡元培先生曾指出“教育不专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sup>[2]</sup>。从幼儿时期的儿童图书馆、学生时代的学校图书馆到毕业之后所使用的公共图书馆及专业图书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可以覆盖到人们生活的每个阶段。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也认为，图书馆是学校之外最好的教育场所，是向社会开放的“民众大学”<sup>[3]</sup>。197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第一次确定图书馆为公益的文化教育机构，并认定社会教育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四大职能之一。图书馆应当发挥馆藏资源优势，探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教育活动，深化图书馆在终身教育中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 1.3 信息窗口作用

信息社会的核心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使用，最

重要的是将众多无序的信息加以有序的整合，转换为高质量的信息输出，使人们能从杂乱无章的信息流中找到自己所需要和适合的信息。图书馆既是信息的存储中心、咨询服务中心，也是信息的分析、研究和交流中心。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图书馆是帮助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选取、推荐有用资料的地方。对于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图书馆也是参谋助手，在建设“重要窗口”期间，各级各类图书馆应该积极为立法机关、决策机关、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等提供信息服务，为建设“重要窗口”保驾护航。

### 1.4 保存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窗口作用

图书馆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保存地，以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为使命。自从有了图书馆，人类社会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文化、知识才得以系统地保存并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197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ions, IFLA）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作为图书馆的首要职能。

新的一百年，浙江进入了崭新发展的时代，建设“重要窗口”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期间形成的大量的纸质、数字成果都需要图书馆加以妥善保存，并进行充分的展示。各级图书馆可以通过举办展览、读书会、信息推送等形式，将丰富的馆藏资料有效利用起来，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同时，图书馆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利用馆藏资料来讲好浙江故事、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明，以丰硕的实践成果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更好地激励全省人民扛起“三个地”的使命担当，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新境界。

## 2 “重要窗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2.1 经济发展高质高量

“十三五”以来，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64 613亿元，比上年增长3.6%，稳居全国第四。同时，政府对文化、教育、科技等的投入不断增长，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持续有力的经费支持。到2019年底，全省已建成公共图书馆101家、文化馆101家、文化站1 364家、农村文化礼堂14 341家、乡

镇图书馆分馆1 381个、文化馆乡镇分馆762个、城市书房456个、农家书屋20 371个,并且全部实现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018年,浙江全省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额达13.89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58倍;人均购书经费3.517元,比1995年增加了26倍。据《2019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均文献购置费约515.6万元,比2006年增长了32.8%,其中,浙江大学图书馆排名全国第4。

图书馆行业自身也面临着高效率 and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目前,图书馆加强基础建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拓展服务的外延和方式。接下来,图书馆需要更多关注用户使用需求的变化,以提供精准匹配的图书馆服务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效能。

## 2.2 数字经济逆势生长

当前,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正扑面而来,全球正大步迈向大数字新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具有计算、通信、处理、分析等性能的新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全球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据国际数据公司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统计和预测,2013年全球数据产生量仅为4.3ZB,2020年预计达到47ZB,到2035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2 142ZB<sup>[4]</sup>,是2013年的498倍。而随着中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持续推进,到2025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将达19 508亿元的高点,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超过美国<sup>[5]</sup>。

《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7 020亿元,比上年增长13.0%。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8%、15.6%、9.7%、10.2%和16.6%;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增加值增长21.0%<sup>[6]</sup>,数字经济呈逆势增长趋势。

技术革新和信息暴增给图书馆带来了更多可获取利用的资源,为图书馆创新服务、深化参考决策咨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基础和技术支持,但繁杂的信息冗余和技术断层对图书馆的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使用要求,也对图书馆完善自身的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2020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使用大数据技术

实现了图书馆服务大提升,在全省范围内实现100%通借通还,开展线上“全民阅读月”活动,举办活动2 500余场,1 000万读者参与。

大数据时代,公众阅览、阅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电子阅读、即时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迅猛发展,抖音、哔哩哔哩等音视频资源逐渐受到公众的青睐,喜马拉雅、樊登读书等听书类APP得到了更广泛年龄段的读者的喜爱。用户逐渐习惯于使用更为多元的渠道来获取信息,而不再将图书馆作为第一选择或者最优选择,即是说,用户更倾向于使用“不劳而获”、直接推送的信息,而不是需要自己付出主动劳动才能使用的信息。因此,图书馆需要从被动的、等待的服务中跳出来,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用户的需求中,为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 2.3 文旅融合发展可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2018年4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走到了一起,从此开启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之路。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结合指导意见》《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等文化旅游的相关政策,在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也兴起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发布,2020年全省文化制造业增加值771亿元,较上年增长7.9%。同时,在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全省旅游经济呈现“V”型回升,全省全年共接待游客5.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 275.1亿元,分别达到上年同期的78.5%和75.8%<sup>[7]</sup>。在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浙江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05个,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覆盖率达100%,公共图书馆虚拟网络基本全覆盖<sup>[6]</sup>。各级公共图书馆以“图书馆+”的模式,跨界打造了200余家具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图书馆和城市书房。截至2020年底,全省各类主题图书馆和城市书房的总量达900多家<sup>[7]</sup>。在文旅融合深入推进的利好政策引导下,通过旅游市场需求驱动和优质文化资源赋能,将图书馆和



旅游资源整合升级,协同创新,是图书馆新的机遇。

## 2.4 文化浙江全面起航

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八八战略”并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古以来就以文化之地著称。文化的力量深深镌刻在浙江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影响着浙江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浙江省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通过实施文化浙江十大工程、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实现了由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再到文化浙江的层层递进。2021年8月31日,浙江省委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着力打造文化的“五大高地”。同时,2020年浙江省人均消费支出31 295元,居全国第三,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为2 889元<sup>[8]</sup>,占有消费支出的9.2%。文化类的消费在总体消费水平中的占比明显提高,并且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公共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而言,打造文化高地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意味着图书馆事业可以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另外,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图书馆进一步增强文化功能、服务文化强国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2.5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浙江省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自古以来便是文化中心之地。据统计,东汉以来,载入史册的浙江籍文学家超过千人,在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成为了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中心。据统计,2007年起,浙江省开始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至2017年,95家普查单位中共藏有中国传统装帧书籍337 405部2 506 633册,共有871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609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sup>[9]</sup>。浙江省通过全面推进古籍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分级保护体系、实施中小型古籍库房达标制度化、铺设全省古籍修复网络等,初步构建出基础夯实、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网络<sup>[10]</sup>。下一步,应当尽快形成统一的古籍信息数据库,为古籍的开发利用提供便利。

如何让浙江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接地气、近生活,如何让古籍资源更形象化、亲切化,以新的推广形式让古籍资源更好地融入公共文化服务,这是图书馆开

展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重点。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让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主动地融入到老百姓的精神和生活中。可以通过开展成语大会、诗词大会等创新性的、大众性的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到每一个国民的脑海里。

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图书馆行业要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沿着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沿着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沿着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sup>[11]</sup>。

## 3 坚持四个走向,做“重要窗口”的展示者

2019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8位老专家回信,充分肯定了他们为坚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所付出的努力。这是总书记首次就图书馆事业专门作出重要论述,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图书馆发展、全国图书馆事业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sup>[1]</sup>。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省的图书馆工作必须要结合浙江实际,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高水平建设图书馆事业,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开启崭新征程。

### 3.1 走向法治化,推进依法治图新风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先后颁布,2017年11月,浙江省发布《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在《保障法》的基础上针对浙江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细化,为保障国家立法的落地生根、因地制宜实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1年,浙江省开展《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的修订调研,以加快推进立法进程,构筑公共图书馆的制度体系,完善文化法律制度的内容,弥补文化立法的“短板”,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法治发展。

从现状来看,浙江省图书馆法治建设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进一步加快地方性立法,完善执法机制,进一步发挥政府为主体的导向作用,对图书馆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依法给出解决方案。抓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图书馆法治体系。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图书馆法治工作也需要不

断创新变革,以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 3.2 走向协作化,建设开放共享新图景

建设“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图书馆需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图书馆想要发挥自身在文化、教育、信息、文明传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需与社会力量合作。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旅资源,而且是深化、丰富文旅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因此,图书馆应秉承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在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等开展多方位协作,争取实现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哪里,图书馆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sup>[12]</sup>。

优化全省馆际布局。通过总分馆体系、区域联盟、协作网络等各种形式,加强图书馆与不同组织机构的互通有无,对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协同有效配置,提高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促进文化资源共享。馆藏资源建设是图书馆一切服务的基础。面对数字时代日益增长的信息量,图书馆只有通过寻求与其他机构的协同合作,共同开展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深入挖掘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想和理念,借助图书馆自身包括建筑、产品、文化资源等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将图书馆的文化资源与当地的旅游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模式,达到互相促进发展的效果。

### 3.3 走向数字化,创立信息服务新生态

在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资源数据化、服务延展化、空间高级化和功能丰富化,都与数字技术的进步有着紧密的关联。图书馆应该确立数字化业务的核心地位,以数据治理为目标和抓手实现新时期的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建立数字化团队。设置符合本馆发展的数字化

馆员岗位,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建立配套的激励考核机制,培养一批具有数字化专业能力和交往沟通能力

### 3.4 走向国际化,拓展传统文化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注重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在进行优秀国外文化“引进来”的活动之余,积极开展中国文化“走出去”,增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进步。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图书馆的文化交流传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共图书馆要“通过巡回展览、公益性讲座、善本再造、创意产品开发等方式,加强古籍宣传,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14]</sup>。

由参与者变成组织者。图书馆通过举办文化论坛、研修班、馆长论坛等对外教育培训或者会议,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和宣传方法,加强区域多边合作,向全世界讲好图书馆发展的“中国故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到国家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中,协助国家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持续开展文化外交工作,依托图书馆馆藏资源与服务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sup>[15]</sup>。促进海外古籍普查与回归。由于战争、邦交等历史原因,有大量中文古籍散落在世界各地,通过加强与国外图书馆的交流,借助新兴的数字化技术,以数字化或者其他方式令海外所藏古籍得以回归祖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创新的路径。

#### 参考文献:

- [1] 饶权,等.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5):4-14.
- [2]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102.
- [3] 王天丽.从图书馆讲座活动再认识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以新疆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2014(1):63-64.
- [4] 2020中国通信院大数据白皮书:2035年全球数据产生量预计达2142ZB[EB/OL].(2021-01-01)[2021-04-07].<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8H8ECT05371P76.html>.

(下转第67页)

##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张婷婷

(哈尔滨商业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 文章提出将情境感知技术应用到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中,分析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的构建要素,并从情境感知层、数据处理分析层、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用户应用层四个维度搭建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最后从用户隐私保护、服务效果评估两个层面阐述了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注意事项,进而为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奠定基础。

**关键词:** 情境感知技术;智慧图书馆;精准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 G250.76;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and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Smart Library Integrating Situatio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is precision to the dynamic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smart libraries.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the dynamic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are analyzed. The article also builds a dynamic and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context awareness,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dynamic and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and user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also elaborates on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omotion services from two levels: use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ervic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 turn,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in smart libraries

**Key words**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smart library; precision reading promotion

#### 1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不断推广,图书馆迈入了智慧化服务阶段。智慧图书馆是以图书馆馆藏资源为基础,以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为目标,建立用户与图书馆、用户与用户、图书馆不同区域间的关联关系<sup>[1]</sup>。情境是指描述实体特征的信息,该实体是与人 and 应用进行交互的物理或虚拟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应用<sup>[2]</sup>。情境因素对于优化智慧图书馆服务不可或缺。融合情境的应用技术主要是

情境感知技术。情境感知技术是一种实时捕捉图书馆用户实际应用情境,并且能够实时为用户提供适合所处情境的知识推荐服务的的技术。目前情境感知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应用主要体现在图书查找<sup>[3]</sup>、实时参考咨询服务<sup>[4]</sup>、个性化推荐服务<sup>[5]</sup>等领域,在阅读推广领域应用较少。因此本文在分析情境感知技术应用于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可行性的基础上,将情境感知技术应用到了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中,通过实时捕捉用户真实场景,推理分析出用户的真实需求,更为精准地为图书馆用户开展阅读推广服务。这不仅能够提高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

\*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项目“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思政教育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021-127-B)成果之一。



的精准性, 而且还能提升图书馆智慧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为图书馆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

## 2 相关概念概述

### 2.1 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

目前, 图书馆主要基于改善流程机制、加强用户数据分析、挖掘资源使用偏好、提高馆员素质等方面开展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在大数据时代, 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数字智能技术可以精准探查用户需求, 并为其提供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图书推荐服务的升级, 它从根本上提升了用户实时需求的感知能力和阅读推广的精准性<sup>[6-7]</sup>。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实现的前提是准确掌握用户阅读需求, 了解用户阅读的重点和方向, 在服务用户的同时, 优化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配置。

科学有效的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因此, 在开展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时,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研究<sup>[8]</sup>。在众多推广服务模式中, 关联推广服务模式是首选, 这里讲的关联是指对用户兴趣、用户需求、馆藏资源的关联<sup>[9-10]</sup>。其次, 完善的推广服务体系是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的核心。它不仅包括了用户端的信息采集分析体系, 而且还应包括多种推广应用服务的集成体系。最后, 还需要注重用户群体划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是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的分层级、个性化的推荐, 要对用户群体精准分类, 最终实现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

### 2.2 情境和情境感知技术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 “情境”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而言, 情境是任何描述实体所处环境及实体状态变化的信息, 包含地点、实体、时间和行为4种类型<sup>[11]</sup>。目前融合情境的应用分析技术主要是情境感知技术, 情境感知是在情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是指通过设备感知用户当前情境, 进行数据处理并及时调整相关服务, 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个性化服务。情境感知技术是一种处理分析情境的技术方法, 包括情境计算和情境信息<sup>[12]</sup>。通过情境感知技术, 设备既可以感知相关情境信息, 又可以分析、处理情境所产生的信息。情境感知技术的特点是通过设备获取到相

关情境信息, 实时分析和反馈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智慧图书馆的情境感知主要是指利用相关传感器等设备对用户情境进行感知, 对情境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在综合考虑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类型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所需服务。

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融合情境的精准推荐研究。Adomavicius等人提出了情境匹配的协同推荐算法<sup>[13]</sup>; 刘红基于情境信息获取、整合和个性化语义匹配建立了基于情境感知的图书馆个性化信息系统<sup>[14]</sup>; 曾子明等人构建了移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的个性化阅读推荐模型, 该模型通过用户日志记录, 分析用户情境信息, 并且通过相似度计算找到与目标用户相似的用户, 向目标用户进行资源推荐<sup>[15]</sup>。总体而言融合情境的图书馆精准推荐模式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①构建面向用户的情境模型和行为模型; ②数据处理和分析, 进行精准推荐计算; ③面向用户进行精准资源推荐服务。多类融合情境的精准推荐模式研究为国内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实现奠定了有利基础。

## 3 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融合情境技术的可行性分析

图书馆开展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的前提就是要精准掌握用户的阅读需求, 情境感知技术为获取和分析用户个性化需求和行为偏好提供了可能性。目前情境感知技术在电子商务、新闻推荐、智慧图书馆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这可以为情境感知技术在阅读推广服务应用提供参考, 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利用情境感知技术感知各类IP用户, 向不同IP的用户推荐相应的学科馆员或用户所处位置附近的馆员, 为用户提供9-9实时咨询服务<sup>[4]</sup>;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开发了一款基于位置感知的推荐应用Minrva, 综合考虑了相关隐私问题和信息采集规范, 通过感知用户所在位置附近的图书资源, 为用户推荐热门图书并提供图书所在的位置<sup>[16]</sup>; 新闻推荐系统Moners通过情境感知技术深入挖掘用户偏好, 综合考虑新闻的时效性和重要性, 向移动用户推荐新闻<sup>[17]</sup>; COMPASS作为电子旅游领域广泛应用的情境感知推荐系统, 通过感知用户具体的环境和位置, 为用户推荐所处环境相匹配的餐馆、商店等<sup>[18]</sup>。其次, 用户面对不同的情

境会具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兴趣,如在教室倾向于阅读专业类书籍,在图书馆倾向于阅读专业类或休闲类书籍。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可以借助各种感应设备获取和分析用户情境数据,充分考虑用户喜好,为用户动态推荐最适合的阅读资源服务,让用户在不同情境下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阅读资源,从而提高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效能。此外,融入数字智能技术和使用多种类智能设备有助于图书馆形成智慧管理体系和智慧服务机制,能在优化馆藏资源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对用户个性化阅读需求、行为偏好的精准定位、精准分析,通过智慧化的精准推荐为用户精准匹配资源,实现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

#### 4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的构建要素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包括用户情境数据、用户行为交互信息、馆藏资源数据和智能化推荐工具,通过有效的情境数据分析、行为交互信息挖掘、馆藏资源数据匹配和智能化精准推荐,保障系统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功能的实现。

##### 4.1 图书馆用户情境数据

用户情境数据是图书馆实现用户个性化需求精准分析的基础数据源,需要实时感知、实时获取、实时分析。本文在传统图书馆情境基础上,增加了用户动态情境感知,也就是对用户动态情境信息进行识别和获取。图书馆用户动态情境信息获取的方式有很多种,当前较为常用的是利用智能终端采集设备进行采集,例如智能手机、智能手环、蓝牙、NFC功能等<sup>[19-20]</sup>。通过利用用户注册账户和使用设备信息可实现用户位置、阅读记录、天气、心情、喜好等信息的捕捉,然后经过系统化数据处理和分析,得到图书馆用户动态情境信息。用户静态情境信息是指用户长期保持不变的信息,例如用户姓名、性别、所学专业、兴趣爱好等。用户动态情境信息和静态情境信息组成了用户情境数据信息,上述这些数据信息为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的用户情境获取和分析提供了支持。

##### 4.2 图书馆用户行为交互信息

图书馆用户行为交互信息主要包括用户的行为信息和社交网络信息,是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

感知用户行为、获取用户行为偏好的关键数据源。用户行为信息主要包括用户检索、浏览、下载、收藏、网站页面停留时间等,通过对用户的行为信息的深度挖掘和特征提取,可以分析出用户的兴趣爱好,预测用户的行为;用户的社交网络信息主要指的是用户间的交互信息,例如对于同一本图书,多个用户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评论,这反映出这类用户具有某种群体性特征,通过这一特征可以实现此类用户群体的识别。同时,对此类用户相关评论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找出此类用户阅读、收藏的资源信息,实现图书馆馆藏资源与用户行为偏好的深度关联,为图书馆实现群体性用户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奠定基础。

##### 4.3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据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据库中存储着大量资源数据,包括图书、文献、期刊资源,这些资源种类繁多、体量较大,不仅有结构化数据,还包括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智慧图书馆是一个基于云存储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被集中统一管理并存储云数据库中,不仅方便了不同类型数据的系统化存储,而且提高了图书馆数据资源的共享水平。同时,用户通过登录图书馆账户,可以随时随地在云数据库中获取各种知识资源,并且可以实现个人账户知识资源的管理,为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的智能化精准推荐奠定了资源基础。

##### 4.4 智能化推送工具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需要依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移动交互设备等智能化推荐工具向用户精准推荐阅读资源。智慧图书馆连接着系统端和用户端,系统端形成的阅读推广数据最后要在用户端进行呈现,因此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数据应能够适应用户端各类智能终端。例如,智慧图书馆获取物理空间信息后,向用户进行动态精准阅读推荐,该推荐信息格式包括Word、PDF、JPG图片、HTML影像、MP3格式音频等,应能够适应用户智能终端要求,并无失真地向用户显示,进而保障用户在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使用过程中第一时间便捷高效获取阅读资源。

#### 5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构建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是一个能够实时感知用户情境信息,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为用户开展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的智能化系统,包括情境感知层、数据处理分析层、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及用户应用层四个组成部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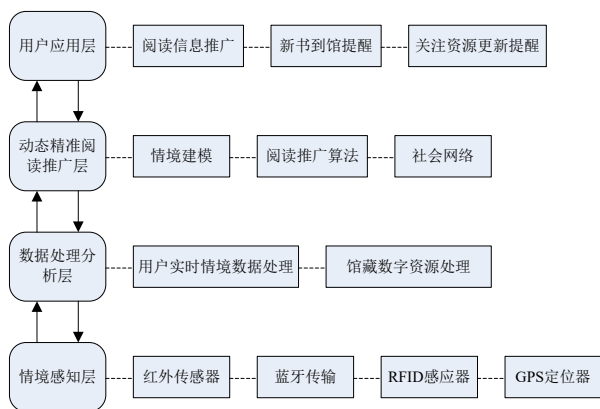


图1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结构

### 5.1 情境感知层

情境感知层是将传感器设备和智慧图书馆各类服务相连接的情境数据感知层,它主要是为数据处理分析层和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情境感知层是由多个传感器组成,常见的有红外线感应器、RFID感应器、GPS定位器等。传感器分布在图书馆的不同位置,它们可以自动识别图书馆用户实时状态,识别图书期刊标识信息,定位用户实时位置等。情境感知层通过获取上述信息,实现对图书馆用户所处情境信息的感知,为智慧图书馆智能分析判断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 5.2 数据处理分析层

数据处理分析层主要作用是结合用户静态情境数据信息,对智慧图书馆情境感知层所获取的用户动态情境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挖掘出用户实时的情绪、关注等数据,进而提取用户的实时需求信息。在情境感知层所获取的数据信息中,有些是与智慧图书馆精准阅读推荐无关的,因此数据处理分析层在开展用户动态情境数据分析时,首先会对相关数据进行辨识,剔除无关信息,然后利用匹配条件知识库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匹配选择,有针对性地选择可用的用户动态情境数据信息,在此过程中,各参数条件阈值设定尤为关键,它是决定数据信息准确与否的关键。

### 5.3 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

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主要作用是利用数据处理分析层的用户情境感知信息,为图书馆用户实时推送阅读信息,达到动态精准阅读推广的目的。该层是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重点和关键。动态精准阅读推广层中包含了智慧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库和图书馆用户兴趣喜好知识库。该层在获得数据处理分析层传输的用户情境感知数据信息后,首先对数据信息进行数据转化,并在图书馆用户兴趣喜好知识库中检索与情境信息相关联的信息;以关联信息为关键词,利用基于规则的推荐算法,找出满足用户情境信息的馆藏阅读资源信息。基于规则的推荐算法是动态阅读推广是否精准的关键,因此此算法应包括专家推理规则库、自适应算法数据库等,在提升阅读推广精准性的同时,提高智慧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平。

### 5.4 用户应用层

用户应用层是智慧图书馆的主界面,涵盖内容较多,主要作用是向用户展示动态精准阅读推广结果。用户应用层是连接智慧图书馆与用户的中间层。通常来讲,用户应用层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阅读信息推广、新书到馆提醒、关注资源更新提醒等。就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而言,用户应用层不仅包括上述功能,而且还能为用户推送个性化服务内容,例如及时为用户推荐其周围的图书资源目录信息、用户在图书馆行走轨迹等。用户通过该应用层可以实时与智慧图书馆进行互动交流,了解相关需求信息内容。

## 6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的注意事项

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在构建完成后为保障系统功能的有效实现,并且能最大程度满足用户的阅读服务需求,还需注重用户隐私信息的全方位保护、服务效果的科学评估。

### 6.1 用户隐私信息的全方位保护

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在为用户提供阅读推广服务过程中会大量采集用户的情境数据、行为交互信息,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会映射到系统中,这些数据在满足系统分析用户行为偏好和个性化阅读需求的同时,也容易出现信息泄露和盗用等问题。因此,智慧图书馆在构建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中需要针对用户的个人信息、情境数据、行为交互信息做好



全面的安全防护,可以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及网络防火墙实现对用户隐私信息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加密和安全管理,针对反映用户多种偏好的行为动态数据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分布式存储机制,依靠分布式数据库实现用户数据的安全存储,依靠区块链技术中的哈希算法实现用户数据使用全流程追踪,从而有效保障用户隐私信息安全,防止用户隐私信息泄露。

## 6.2 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效果的科学评估

智慧图书馆还需要对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的阅读推广服务效果进行科学评估。重视系统功能的实现程度和用户的用户体验,可以从服务标准、服务效能、阅读资源获取效率、用户满意度、系统反映时间、阅读资源流转效率、阅读资源获取便捷度等方面建立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效果指标评价体系,通过设计电子调查问卷、抽样访谈、实地检测、实践体验等方式对系统的阅读推广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重视用户的直接反馈,针对用户服务体验反馈的建议对系统功能模块、算法机制、感知设备、框架体系优化调整,使系统的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功能与用户个性化阅读需求实现最大程度契

合,阅读资源与用户阅读偏好高效匹配,保障用户具有良好的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体验。

## 7 结语

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应用领域的不断推广,智慧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当前情境感知技术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智慧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向。利用情境感知技术,无论用户在何时、何地,均可以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基于情境感知技术构建的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系统具有精准性、便捷性和多样性的功能优势,能使身处不同空间场域和时间维度的用户精准便捷获取阅读资源,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精准性进一步提升。但未来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服务器、传感器等设备安全保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过滤用户动态情境数据时容易出现失真现象等问题。相信随着数字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融合情境的智慧图书馆动态精准阅读推广服务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 参考文献:

- [1] 陈昇.面向科研人员情境感知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式信息服务模式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56-58.
- [2] DEY A K.Providing Architectural Support for Building Context-Aware Applications[D].Atlanta: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0.
- [3]AITTOLA M,RYHANEN T,OJALA T.Smart Library:Location-aware mobile library service[C]//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Mobile Devices and Services (Mobile HCI). [S.l.]:Springer,2003:411-415.
- [4] 周宁丽,张智雄,初景利.用户需求嵌接、流程驱动、情景敏感型9-9网络参考咨询服务: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网络参考咨询服务新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7(10):100-103.
- [5] 王芳,郭丽杰.基于情境模型的手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7):93-96,101.
- [6] 吴小梅.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必要性与对策[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2):13-15.
- [7] 肖珑,刘雅琼,张春红.浅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深阅读服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6):119-125.
- [8] 赵双.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建设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9(12):5-10.
- [9] 张正.高校经典阅读推广机制建设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1):79-84.
- [10] 任运月,李桂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运营策略及运用现状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6):21-30.
- [11] ZIMMERMANN A,LORENZ A,OPPERMANN R.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Context[C]//Modeling and Using Context.Berlin Springer,2007:558-571.
- [12] 杨金庆,程秀峰,周玮珽.基于情境感知的资源推荐研究综述与实践进展[J].现代情报,2020,40(2):153-159,167.

- [13]ADOMAVICIUS G,SANKARANARAYANAN R,SEN S,et al.Incorporat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n recommender systems 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J].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TOIS),2005,23(1):103-145.
- [14]刘红.基于情境感知的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6,38(8):105-108.
- [15]曾子明,陈贝贝.移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的个性化阅读推荐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12):31-36.
- [16]HAHN J.Indoor Positioning Services and Location-Based Recommendations[J].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2017,53(1):9-16.
- [17]LEE H J,PARK S J.Moners:A news recommender for the mobile Web[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7,32(1):143-150.
- [18]Van Setten M,POKRAEV S,KOOLWAAIJ J.Context-Awar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mobile tourist application COMPASS[J].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04,3137(1):515-548.
- [19]郭顺利,李秀霞.基于情境感知的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模型构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8):64-68.
- [20]许天才,冯婷婷,潘雨亭.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数据及边缘数据的管理与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1):76-83.

**作者简介:** 张婷婷, 硕士, 哈尔滨商业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用户服务、阅读推广等。

**收稿日期:** 2022-03-30

**本文责编:** 王晓琳

(上接第50页)

- [20] 张新宝.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J].中国法律评论,2021(5):18-27.
- [21]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淘友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73民终588号民事判决书[EB/OL].[2021-12-30].<https://www.pkulaw.com/>.
- [22] 刘权.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J].法学家,2021(5):1-15,191.
- [23] 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释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4.
- [24]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57.
- [25] 周汉华.平行还是交叉 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J].中外法学,2021(5):1167-1187.
- [26] 杨立新.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责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5):38-54.
- [27] 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J].比较法研究,2021(3):138-151.
- [28] 张新宝.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2):11-16.
- [29] 杨立新.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68.
- [30] 王利明.生活安宁权:一种特殊的隐私权[J].中州学刊,2019(7):46-55.
- [31] 徐明.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J].中国法学,2017(1):130-149.
- [32] 陈晨,李思頔.个人信息的司法救济:以1383份“App越界索权”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J].财经法学,2018(6):102-113.

**作者简介:** 巫慧,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个人信息保护。

**收稿日期:** 2022-03-22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基于 PPP 模式的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构建研究

奚建治

(上海市松江区图书馆 上海 201600)

**摘要:** 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是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一个较好的发展思路, 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文章在简要阐述PPP模式在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中的应用优势的基础上, 提出PPP模式应用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主要有“图书馆+物理空间”和“图书馆+虚拟空间”两种模式, 其建设基本流程为合理规划、协同合作和评估反馈。最后依据长春市图书馆“阅书房”实践案例, 文章提出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应在系统规划布局、明确政府和出资方双方责任、做好风险防范和精准掌握用户需求等方面进行优化。

**关键词:** PPP模式; 图书馆; 新型阅读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ading Space in Libraries Based on PPP Model

**Abstract** The PPP model of new library reading space is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mode, which presents a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PPP mod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ading spaces in librari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PPP model is mainly applied to new reading spaces in libraries in two modes: "library + physical space" and "library + virtual space". The basic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s rational planning, co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Finall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ase of Changchun Library's "reading roo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library's new reading space PPP mode construction system should optimize in terms of, among other aspects, planning layout, clea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good risk prevention and accurate grasp of user needs.

**Key words** PPP mode; library; new reading space

### 1 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促进了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也改变着用户的信息需求, 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明显滞后于用户对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专业化的阅读资源全面获取的需求, 供需失衡问题严重。当前, 政府部门较为重视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合作制)的应用研究和探索实践,

国内多数图书馆主动紧扣时代脉搏,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有效探索创新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模式, 取得一定成效<sup>[1]</sup>。由此可以看出, 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是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一个较好的发展思路。

### 2 应用 PPP 模式的优势分析

PPP模式作为一种以各合作方“共建共赢”为合作基础的现代融资模式, 主要分为融资性质、非融资



性质、股权产权转让和合资合作四种(见图1),将其应用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之中,具有以下四大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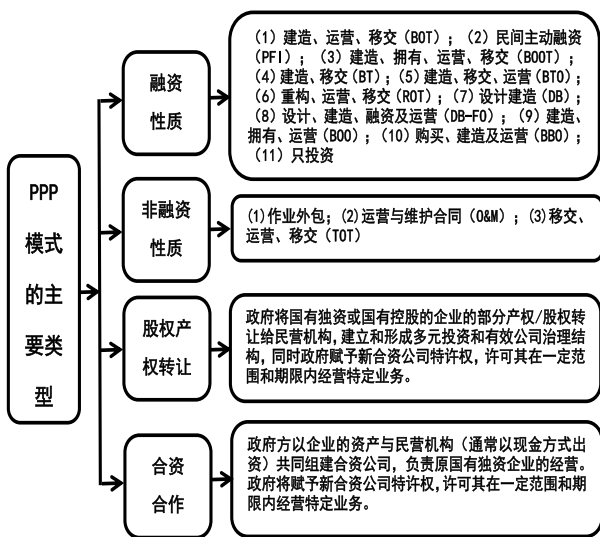


图1 PPP模式的主要类型

## 2.1 政府层面：缓解财政压力，实现多元投资

大部分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而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伴随着社会环境、用户需求等变化,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还需要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由此导致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增加<sup>[2]</sup>。把PPP模式应用于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之中,引入社会力量,通过PPP模式合作项目的形式,让社会机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是直接参与新型阅读空间的建设和运营管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金来源,部分解决了政府对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资金的投入压力,实现多元投资供给服务模式的创新。

## 2.2 社会机构层面：树立品牌形象，增强竞争优势

对于参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的各类社会机构而言,他们既是支持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者,也是公共文化事业项目的盈利者。社会机构参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指导支持下,让自身资本多了一个合理流动的空间,还能够构建一个长远稳定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能够利用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这一服务宣传平台,提升企业的文化底蕴,宣传企业的基本信息、发展历程、企业所处行业领域、主营业务、规模范围等,树立健康向上的正面的品牌形象,

有形或无形中获得一定广告效益<sup>[3]</sup>。

## 2.3 图书馆层面：拓展服务范围，实现市场运作

在政府指导下,图书馆与社会机构的协同合作,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问题,还能够扩大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增加用户的阅读率,在增加服务网点的同时,盘活图书馆各种资源,提升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打破定式体制制约的藩篱。同时,社会机构的加入,让市场竞争机制在图书馆服务中越发凸显,促使图书馆转变滞后观念,创新现代化管理服务模式,实现市场运作,有效提升其管理服务质量<sup>[4]</sup>。图书馆对社会资本的优势利用,能够在新型阅读空间构建过程中有效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下的管理、技术以及监督、评估等方面的优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 2.4 用户层面：享受优质服务，满足阅读需求

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的实施,让用户获得了更为优质、快捷的阅读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后,图书馆资源得到优化整合,服务模式得到调整完善,最终受益的就是享受图书馆服务的用户群体,图书馆将会在市场体系的优化下提供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同时用户为了获得更为高效、便捷、优质的阅读服务,也会依据自己的阅读需求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主动参与到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之中,促使其PPP模式健康有序发展<sup>[5]</sup>。

## 3 主要模式

目前,应用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之中的PPP模式,大多为融资性质和非融资性质两种类型,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模式。

### 3.1 “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

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与各种社会机构合作构建新型阅读空间,成为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的一个创新思路。“物理空间”是他们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因此可采取“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进行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图书馆与商场、超市、咖啡馆、景区等社会机构进行合作,在这些人群密集的物理空间内设置阅读空间,为用户提供各种阅读资源、阅读服务以及教育培训等文化活动,还可以依据图书馆内各区

域空间的特色,引进社会力量为用户提供特色服务,实现图书馆与社会机构的跨界融合。如图书馆中的茶艺馆、景区中的城市书房、酒店里的移动书吧等,通过合作,让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有所扩大,服务模式有所创新,而与其合作的社会机构也有了一些文化色彩,树立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增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筑香书馆”,以企业投入为主(提供场地、设计、装修、设备、资源等)、图书馆投入为辅(提供借阅系统、人员培训等),利用志愿者实现日常运营,24小时无人值守,用户可凭身份证刷卡入馆,享受免费的公益图书服务,同时书馆还提供场地举办书展、讲座等活动。新型阅读空间的成功案例还有长春市图书馆的“阅书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江阴图书馆的“三味书咖”城市阅读联盟、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的“听海图书馆”等,这种“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是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有效补充,具有一定创新意义<sup>[6]</sup>。“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在实践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部分以商场、超市、咖啡馆、景区为背景的新型阅读空间,其公益性目的模糊,容易出现以经营代替服务的现象,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

### 3.2 “图书馆+虚拟空间”模式

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虚拟空间”也是图书馆与各种社会机构合作构建新型阅读空间的重要平台之一,因此可采取“图书馆+虚拟空间”模式进行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图书馆+虚拟空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图书馆的阅读资源嵌入互联网之中,为用户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除了图书馆本身建设的本馆数字化平台外,还可以与社会机构合作,共同整合数字资源,搭建阅读资源与用户的平台,有效提高用户对图书馆阅读服务的认同感与满意度。如美国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曾与6家社会机构合作构建社交型网站,与Microsoft、Google合作实现馆藏资源的数字化管理<sup>[7]</sup>;而在我国,清华大学图书馆尝试把本馆资源融入Amazon、Google Books等,实现对馆内外资源的优化整合,目前很多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都在做这样的服务项目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图书馆还可以与网络电商、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如长沙市图书馆与“京东”开发智采平台,对接京东图书商品,不但盘活了对京东图书商品的利用,还能

够利用其通畅的物流方式把图书尽快送给用户,这种结合网络工具实现互动阅读的方式,有效提升了用户阅读的积极性<sup>[8]</sup>;浙江图书馆与蚂蚁金服合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构建集借阅、服务、消费等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促进智慧图书馆建设,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支付宝钱包设置服务窗口的图书馆。“图书馆+虚拟空间”模式在实践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社会机构参与新型阅读空间建设的参与途径有限,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长效运行机制。以上种种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

## 4 基本流程

### 4.1 合作前:合理规划,科学设计,职权明确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PPP模式的主要参与方包括政府、图书馆、社会机构、用户,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见表1)。在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项目合作之前的模式设计,首先要选择适合该项目的PPP模式,可依据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项目特征,对PPP模式中的建造、运营、移交、重构、租赁、购买等子环节实施重构,实现模式创新。其次是针对政府、图书馆、社会机构三方权利怎样分配的问题,依据三方合作项目的需求进行整体分析,明确合作三方的权利、责任。在合作前要进行合理规划,明确项目盈利点和各方利润分配比,精准计算新型阅读空间的建造、推广和运营等方面的成本预算、资金投入以及效益<sup>[9]</sup>。

表 1 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 PPP 模式主要参与方的具体职责

主要参与方	角色定位	具体职责
政府	PPP 模式的主导者	主要负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政策及资金支持、承担规则制定及监督管理等
图书馆	PPP 模式的具体执行者	主要负责制定建设规划、服务标准、实施方案,协助主管部门考察、选择合作方,制定、签署合作协议,承担业务指导、对外宣传、考核评估等
社会机构	PPP 模式的合作参与者	主要负责图书馆的融资、建设、运营等,承担优化资源配置的职能
用户	PPP 模式的服务需求者	主要承担表达服务需求、发挥民主监督的职能

## 4.2 合作中：协同合作，各取所需，实现共赢

一直以来，政府拨款是图书馆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社会机构参与度极小，因此政府需转变传统观念，从政策、制度等方面鼓励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协同合作，有效使用社会机构的资金优势来充实图书馆的建设资金储备。同时要想增强社会机构的参与度，实现双方合作，就一定要找到双方的利益共赢点，如节约资金、提高资源使用频率、增强社会知名度等。同时还要扩大项目规模，创新项目盈利点，如把图书馆与周边盈利性项目实施捆绑联合经营，利用盈利项目去弥补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收益较少的现状，以提升项目的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将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项目与外延服务项目联合经营，让社会机构在利益驱使下创新项目管理模式，从而有效提升项目收益，进一步强化项目吸引力，强化企业的参与行为，最终实现共赢<sup>[10]</sup>。

## 4.3 合作后：评估反馈，查漏补缺，修改完善

合作后的评估反馈有利于本次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实践实现查漏补缺和修改完善，为推动今后紧密的合作模式奠定扎实基础。在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时，必须要重视以下两大指标：一是盈利性指标，主要是用于考核社会机构的盈利能力，保障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可选择成本费用利润率、营业利润率、资本收益率等指标作为盈利性评估指标；二是公益性指标，主要是用于考核社会机构的公益推广能力，保障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的社会效益，可选择公益性活动数、自愿服务活动数等指标作为公益性评估指标<sup>[11]</sup>。此外，图书馆还可以通过用户反馈来搜集整理用户的意见建议，精准掌握用户阅读需求和阅读行为规律，为新型阅读空间的建设发展提供数据参考和实践案例。

## 5 案例分析：长春市图书馆“阅书房”

“城市书房”属于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图书馆+物理空间”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很多城市进行推广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2018年长春图书馆启动“阅书房”建设工程，目前已与社会机构联合建成8家“阅书房”（见表2），构建了集文化、艺术、科技等于一体的独具长春区域

表2 长春市8家“阅书房”建设基本情况表

序号	“阅书房”名称	合作机构	建设场所	面积/平方米	藏书/册
1	工艺美术馆阅书房	吉林省工艺美术馆	公园景区	1 000	2 700
2	玉鸟阅书房	玉鸟行知空间书店	社区	450	4 500
3	万科翡翠滨江阅书房	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区、校园	200	3 194
4	万科和顺里阅书房	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区、校园	200	2 000
5	吉阅七舍阅书房	吉林省七舍经贸有限公司	商场	200	5 000
6	文旅体验中心阅书房	如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体育场	200	2 000
7	万科向日葵小镇阅书房	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区	2 000	40 000
8	蒙奇·行知空间阅书房	蒙奇行知空间书店	独立场所	400	2 000

特征的新型阅读空间，具有精致、舒适、智能等特点，他们将以共享方式在长春市范围内构建一个覆盖全市的城市书房联盟。

长春市8家“阅书房”的建设，其成功之处在于“政府主导、社会合作、联盟运营、便民共享”，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主导。该项目列入政府“幸福长春行动计划”，政府通过给予政策倾斜和部分经费支持的方式，鼓励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合作建设、打造独具地域特征的新型阅读空间，实现城市阅读资源的互通有无。二是社会合作。长春市图书馆与吉林省工艺美术馆、玉鸟行知空间书店、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七舍经贸有限公司、如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蒙奇行知空间书店等社会力量合作，实现了在教育、文化、科技、艺术、旅游等不同领域阅读资源的优化整合、共建共享。三是联盟运营。在政府主导下，长春图书馆作为“阅书房”建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主要承担“阅书房”的业务管理、资源配置、设备维护、活动组织以及业务培训等工作，社会机构作为“阅书房”建设的参与者和日常管理者，主要负责提供“阅书房”的场地、设施和工作人员，以及承担运营管理、服务项目、活动组织等工作，合作双方协商签订共建协议书，期限5年<sup>[12]</sup>。四是便民共享。“阅书房”与



示范分馆、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服务品牌共同构建了形式多样的城市阅读网络,所有阅读资源能够在上述范围内实现通借通还,用户可使用本人身份证或“支付宝”信用免费办理读者证,使用数字阅读机通过手机扫码就能够把“掌上图书馆”带在身边。同时8家“阅书房”的阅读主题也各有千秋,如“万科向日葵小镇阅书房”的阅读主题是“绘本”,“文旅体验中心阅书房”的阅读主题是“文化阅读 旅游体验”,等等,在满足大部分用户阅读需求的同时,也凸显出自己的特色优势。自2018年以来,8家“阅书房”共服务用户超2万人次,借阅文献超5万册,真正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借鉴长春市“阅书房”建设经验,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建设可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一是系统规划布局。图书馆应争取把新型阅读空间建设项目列入当地政府“民生实项目”之中,成立领导小组并落实专人专职负责,同时规范运营管理流程和绩效考核制度,从资金来源、资源配置、人才配置、场地选择等方面,用财政投入引入社会机构的资本投入,引入社会机构参与项目建设,为项目顺利进行奠定稳定基础。二是明确政府和出资方双方责任。正确划分政府与图书馆、社会机构的职责与权利,政府主要负责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及履行监督考核职能,不对管理决策过多干预,项目的建设运营均由图书馆和社会机构自主进行,避免出现职能重叠、管理冲突、越界干扰等问题。三是做好风险防范。在签订合同时必须明确风险共担机制,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维护等商业风险一般由社会机构承担,政策法律法规和不可抗力风险一般由政府承担,还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解决措施,保障及时化解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或纠纷<sup>[13]</sup>。四是精准掌握用户需求,结合区域特征,合理配置阅读资源,为用户提供

更为精准、专业的阅读服务,如在靠近中小学、住宅小区的新型阅读空间,可以重点配置适合青少年和儿童适合阅读的阅读资源,开展阅读指导讲座、讲故事大赛、作文比赛等活动;如在旅游景点区域的新型阅读空间,可以适当增加旅游、地理,特别是与当地风土人情相关的阅读资源,以适应用户阅读需求,同时图书馆还可以通过与网络电商、数据供应商构建的线上阅读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推介服务、定制服务等,让新型阅读空间成为有温度、有想法、有内涵的公共阅读空间<sup>[14]</sup>。

## 6 结语

文章对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PPP模式在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中的应用优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图书馆+物理空间”和“图书馆+虚拟空间”两种图书馆创新阅读推广模式,研究结果对推动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而言之,PPP模式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不但能够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还能够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公共文化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基于PPP模式的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和外延,拓展了大众对图书馆以往的认知维度,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转变,促进了建设资源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鉴于此,图书馆应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有效探索创新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模式。面对目前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怎样充分利用PPP模式这一现代融资模式为其提供发展思路,值得图书馆业内人士深入思考并加以实践。

## 参考文献:

- [1] 杨松.积极探索和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图书馆)服务专题访谈[J].图书馆杂志,2015,34(11):9-11.
- [2] 尧迟月.基于PPP模式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J].兰台内外,2020(26):55-57.
- [3] 张守卫,杨嶂.江阴市图书馆全民阅读PPP模式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6(19):77-81.
- [4] 王洁.PPP模式下公共图书馆建设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1(6):120-124.
- [5] 廖洪文.PPP模式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应用探析[J].计算机产品与流通,2017(10):175.

- [6] 王丽.基于PPP模式的图书馆创客空间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9,39(9):63-64,73.
- [7] 韩丹.国内外公共图书馆PPP模式应用比较研究[J].图书馆研究,2020,50(6):33-39.
- [8] 史煜娟.PPP模式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应用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7(3):78-83.
- [9] 张萌.公共图书馆领域PPP模式构建研究:以智能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杂志,2018,37(2):65-70.
- [10] 邓银花.公共图书馆PPP项目的回报机制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3):85-92.
- [11] 李祝启.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PPP模式运营状况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5):34-37.
- [12] 王英华.公共图书馆新型阅读空间建设策略研究:以长春市图书馆示范分馆和阅览室建设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12):18-20.
- [13] 李英珍.国外图书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发展及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9):22-28,128.
- [14] 李莹波,奚水,陈虹羽.长春市图书馆城市“阅书房”建设探索与实践[J].科技资讯,2021,19(13):189-192,196.

**作者简介:** 奚建治,上海市松江区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2-14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55页)

- [5] 2020年中国行业大数据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未来五年市场规模或将近2万亿元[EB/OL].(2021-04-06)[2021-04-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262641909628216&wfr=spider&for=pc>.
- [6] 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1-03-03)[2021-04-07].[http://zjzd.stats.gov.cn/zwgk/xxgkml/tjxx/tjgb/202103/t20210303\\_99130.html](http://zjzd.stats.gov.cn/zwgk/xxgkml/tjxx/tjgb/202103/t20210303_99130.html).
- [7]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2020年浙江省旅游业基本情况[EB/OL].(2021-01-27)[2021-04-07].[http://ct.zj.gov.cn/art/2021/1/27/art\\_1643510\\_59001244.html](http://ct.zj.gov.cn/art/2021/1/27/art_1643510_59001244.html).
- [8]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指标(2020年1-4季度)[EB/OL].(2021-02-01)[2021-04-07].[http://zjzd.stats.gov.cn/desj/jdsj/2020\\_jdsj/rmsh/zc/202102/t20210201\\_98928.html](http://zjzd.stats.gov.cn/desj/jdsj/2020_jdsj/rmsh/zc/202102/t20210201_98928.html).
- [9] 浙江日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浙江古籍普查工作十周年成果丰硕[EB/OL].(2017-10-17)[2021-09-1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1475356825169153&wfr=spider&for=pc>.
- [10] 浙江日报.我省首次发布古籍普查报告普查逾33万部,淘得上千珍品[EB/OL].(2017-09-30)[2021-09-13].[http://zjrb.zjol.com.cn/html/2017-09/30/content\\_3086108.htm?div=-1](http://zjrb.zjol.com.cn/html/2017-09/30/content_3086108.htm?div=-1).
- [11] 新华网.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8-04-10)[2022-08-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
- [12] 刘晓辉.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拓展模式探析[J].图书馆学刊,2021,43(2):1-5
- [13] 何秀全,欧阳剑,张鹏.新时期的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J].图书馆杂志,2021,40(11):117-124.
- [14] 柯平,卢晓彤,胡曼曼.图书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地位[J].图书情报知识,2021(1):45-52.
- [15] 刘源泓.试谈图书馆对外交流与合作发展趋势:以国家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7,37(9):82-84.

**作者简介:** 欧阳菲,图书馆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戏曲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22-01-07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的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研究\*

何传超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广东韶关 512126)

**摘要:** 文章在分析国内高校馆员绩效评价情况的基础上,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关考核办法为依据,构建了德、能、勤、绩四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指标体系的层次分析,发现业绩指标的权重最高,而德育指标权重相对较低;利用灰色关联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计算出各位馆员的综合得分和各项得分,将评价结果运用到评优和岗位调整等多个方面。该研究能较客观公正地反映高校图书馆员真实情况,对图书馆员的绩效评价及图书馆其他日常管理工作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层次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 高校图书馆; 图书馆员; 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1.6;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A Study Based on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ibraria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constructs fou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moral, ability, diligence and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relevant assessment methods for the staff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the index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index has the highest weight, while the moral index has a relatively low weight; using gray correlation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and each score of each librarian can be calculate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an be applied to merit evaluation and post adjustment. The study can reflect the real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more objectively and fairly and the research can help guid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ibrarians and other routine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Key words** hierarchical analysis;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ia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1 引言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一个重要的教辅部门,不仅是藏书和阅读的物理空间,作为“第二课堂”同时还承担着提供信息服务、

支援科研、辅助教学的重任。近些年来,高校图书馆功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专家曾经预测,未来高校图书馆将会变成多元的服务空间,其业务重心将从传统的以图书馆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更多地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和情报检索功能<sup>[1]</sup>。这就要求我们的馆员具有更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能力,不断更新知

\* 本文系广东省图书馆学会2019年科研课题“‘一流’高职院校建设中的图书馆的功能及定位研究”(课题编号:GDTK1919);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基于AHP-熵权法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模型研究”(项目编号:2018SKYB011)阶段性成果。



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目前,高校馆员们普遍存在学历不高、专业不对口、创新能力不强等现象,使得高校图书馆长期在一个呆板僵化的体制下低效运行,很难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多元化服务。馆员作为高校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书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高校图书馆馆员评价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馆员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让馆员找到差距和努力的方向,还可以将评价结果运用到馆员的岗位调整、职称评定以及薪酬绩效的分配等方面,有利于图书馆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国内图书馆员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集中在360°法、BSC、模糊评价法、积分制法、层次分析法(Ant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等方法上,这些方法都能很好对图书馆员进行绩效评估,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360°法定性考核较大,定量考核偏小,且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成本较高;BSC在实施时对指标的建立和指标权重的分配比较困难;模糊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在指标权重的确定时主观随意性较大。以上这些方法均要求有大量数据,且样本应服从典型的概率分布,计算量大,分析结果不够准确。而高校图书馆有采访、管理、编目、流通及信息服务等多个部门,分工各有不同,很难用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能弥补数理统计方法的不足,不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也不需要样本必须服从某种规律,且计算量小,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因此,笔者尝试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图书馆员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灰色关联分析是在层次分析法得出的权重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互相补充,共同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2 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1976年,学者比尔和鲁最初提出绩效管理,意为“通过改善员工运作和提供团队和个人的能力,以实现企业目标,增强发展的潜力”<sup>[2]</sup>,而科学有效的图书馆员绩效评价体系,能够体现公平性原则,可以发掘馆员潜在的能力,促进图书馆员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推动图书馆各项目标的顺利完成以及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内学者曾提出过多项针对高校图书馆员的评价措施,无论是360°法,还是模糊评价法,均为定性

考核形式,而高校图书馆员的工作特点决定评价因素不能用简单的定量指标来衡量。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指标,是一个多层次、多指标的复杂工程<sup>[3]</sup>。笔者选择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图书馆员进行绩效评价。从影响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相关因素出发,首先构建相应的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专家的问卷打分赋值,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层指标的对应权重,再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高校图书馆员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馆员的相应评价结果。具体绩效评价流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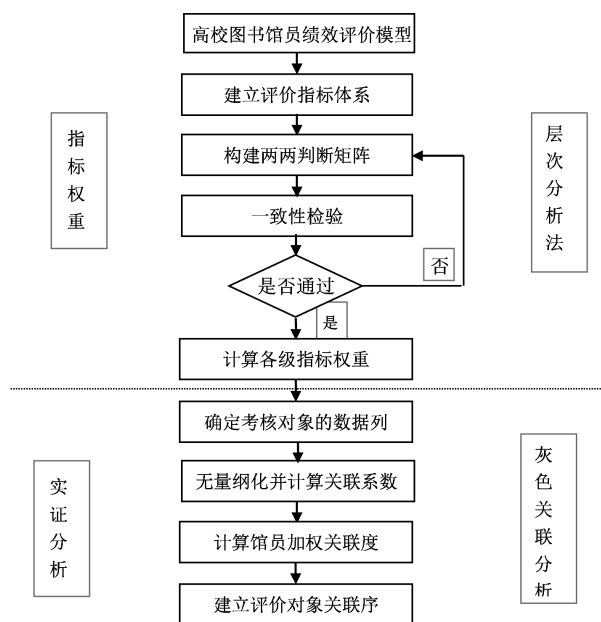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流程

## 3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在绩效评价中,指标合理与否是影响评价结果好坏的关键,构建科学合理的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促进图书馆员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图书馆员形成良性竞争,为图书馆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还能改善图书馆管理模式和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高校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的下设机构,在绩效考核时,首先必须遵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考核的内容均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sup>[4-5]</sup>,其中廉政考核指标具有一票否决权,在绩效评价时暂不作考虑。笔者参考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员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和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特征的理解,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X	准则层 Y	指标层 Z	指标解释
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X)	德(Y <sub>1</sub> )	政治素质 Z <sub>1</sub>	遵纪守法,注重政治学习,对图书馆事业有正确认识
		敬业精神 Z <sub>2</sub>	爱岗敬业,主动开展业务工作,善于发现问题
		团队精神 Z <sub>3</sub>	能经常帮助同事解决业务问题,分享工作经验
		工作态度 Z <sub>4</sub>	主动改善工作,积极参加业务学习
	能(Y <sub>2</sub> )	学习能力 Z <sub>5</sub>	主动学习、善于总结,有强烈的创新愿望
		业务能力 Z <sub>6</sub>	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设备,独立完成岗位工作
		沟通能力 Z <sub>7</sub>	能悉心倾听,善于沟通,准确表达自己观点
		创新能力 Z <sub>8</sub>	指主动学习,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
	勤(Y <sub>3</sub> )	工作纪律 Z <sub>9</sub>	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
		工作责任 Z <sub>10</sub>	责任明确,勇于承担工作失误
		出勤率 Z <sub>11</sub>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出全勤
	绩(Y <sub>4</sub> )	科研成果 Z <sub>12</sub>	指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学术获奖、专利等
		工作满意度 Z <sub>13</sub>	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包括读者、部门领导和同事
		工作效果 Z <sub>14</sub>	指业务工作所产生的成果
		履职情况 Z <sub>15</sub>	指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X);准则层(Y)包括德(Y<sub>1</sub>)、能(Y<sub>2</sub>)、勤(Y<sub>3</sub>)、绩(Y<sub>4</sub>)四个部分;指标层(Z)是对四个准则层的解释和细化。本文根据高校图书馆员的工作特点,将指标层分解成15个指标,分别用Z<sub>1</sub>—Z<sub>15</sub>表示。具体指标解释如表1所示。

#### 4 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计算

20世纪70年代,美国运筹学家T.T.Satty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是计算指标权重的经典方法,它是一种系统化、层次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根据同一层次中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再运用数学方法计算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一致性检验通过后再计算各层次指标的综合权重<sup>[6]</sup>。

在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次指标权重时,首先,图书馆根据考核要求组建考核小组,由具有丰富图书馆管理经验的高级职称人员和各部门主任组成专家组7人,专家组根据Santyl-9比较标度(见表2)对各层级指标两两比较判断。工作组汇总后再把每位专家的赋值结果分发给各位,比较意见的不同之处,按德尔菲法,专家们不断修正自己判断,最终形成一组统一的两两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其中,X-Y为目标层判断矩阵,Y<sub>1</sub>-Z、Y<sub>2</sub>-Z、Y<sub>3</sub>-Z、Y<sub>4</sub>-Z分别为德、能、勤、绩四个准则层判断矩阵。

表2 Santyl-9 相对重要性比较标度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较关系	同等重要	略重要	重要	很重要	极重要	上述相关关系的中间值
重要性程度量化值(a <sub>i</sub> /a <sub>j</sub> )	1	3	5	7	9	2、4、6、8

$$X-Y = \begin{bmatrix} 1 & 1/2 & 1/2 & 1/3 \\ 2 & 1 & 1 & 1/2 \\ 2 & 1 & 1 & 2/3 \\ 3 & 2 & 3/2 & 1 \end{bmatrix} \quad Y_1-Z = \begin{bmatrix} 1 & 1/3 & 1/2 & 1/3 \\ 3 & 1 & 3/2 & 1 \\ 2 & 2/3 & 1 & 3/2 \\ 3 & 1 & 3/2 & 1 \end{bmatrix}$$

$$Y_2-Z = \begin{bmatrix} 1 & 1/3 & 1/3 & 1/2 \\ 3 & 1 & 2/3 & 3/2 \\ 3 & 3/2 & 1 & 3/2 \\ 3 & 2/3 & 2/3 & 1 \end{bmatrix} \quad Y_3-Z = \begin{bmatrix} 1 & 2/3 & 2 \\ 3/2 & 1 & 2/3 \\ 1/2 & 3/2 & 1 \end{bmatrix}$$

$$Y_4-Z = \begin{bmatrix} 1 & 1/2 & 1/3 & 1/2 \\ 2 & 1 & 1 & 1/2 \\ 3 & 1 & 1 & 3/2 \\ 2 & 2 & 2/3 & 1 \end{bmatrix}$$

通过计算各层次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层级的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准则层的德、能、勤、绩四个一级指标中,业绩指标的权重高达0.398 7,说明专家组一致认为在绩效评价中业绩指标占据着最重要位置,这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中重点考核工作业绩的要求是一致的;思想品质指标权重最小,仅为0.123 7。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校图书馆员必须具备“德配位,才配职”,良好的思想品德是高校图书馆员的基本素质,也是对高校图书馆员的基本要求。在思想品德指标中,政治素质权重最低,随后的是团队精神,权重最大的为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这与图书馆的工作特点相关。作为教辅部门,“读者

表3 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omega_{ai}$	一致性检验	二级指标	权重 $\omega_{bi}$	一致性检验	综合权重 $\omega_{ci}$
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体系 $\times$	Y <sub>1</sub> (德)	0.123 7	$\lambda=4.010 4$ CI=0.003 5 CR=0.003 6 通过	政治素质 Z <sub>1</sub>	0.111 1	$\lambda=4.000 0$ CI=0.000 0 CR=0.000 0 通过	1.37
				敬业精神 Z <sub>2</sub>	0.333 3		4.12
				团队精神 Z <sub>3</sub>	0.222 2		2.75
				工作态度 Z <sub>4</sub>	0.333 3		4.12
	Y <sub>2</sub> (能)	0.230 2		学习能力 Z <sub>5</sub>	0.110 7	$\lambda=4.020 6$ CI=0.006 9 CR=0.007 2 通过	2.55
				业务能力 Z <sub>6</sub>	0.300 2		6.91
				沟通能力 Z <sub>7</sub>	0.367 6		8.46
				创新能力 Z <sub>8</sub>	0.221 5		5.10
	Y <sub>3</sub> (勤)	0.247 4		工作纪律 Z <sub>9</sub>	0.365 8	$\lambda=3.256 7$ CI=0.128 3 CR=0.000 0 通过	9.05
				工作责任 Z <sub>10</sub>	0.332 3		8.22
				出勤率 Z <sub>11</sub>	0.301 9		7.47
	Y <sub>4</sub> (绩)	0.398 7		科研成果 Z <sub>12</sub>	0.125 8	$\lambda=4.117 1$ CI=0.039 0 CR=0.040 7 通过	5.01
				工作满意度 Z <sub>13</sub>	0.234 1		9.23
				工作效果 Z <sub>14</sub>	0.341 0		13.59
				履职情况 Z <sub>15</sub>	0.299 2		11.93

第一、服务至上”是宗旨，所以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至关重要。同样，在能力指标中，沟通能力和业务能力最为重要，图书馆很多都是标准化、程序化工作，业务创新主要由图书馆决策层来实施的，对一般馆员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没有太多要求。在勤指标中，工作纪律、工作责任和出勤率权重基本一致，差距不大。在业绩成果指标中，工作效果、履职情况和工作满意度等权重较大，而对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学术获奖、专利等科研成果要求不是很高，这与图书馆作为教辅部门的定位是一致的。

## 5 灰色关联分析实证分析

### 5.1 灰色关联分析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提出的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之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的态势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反之，关联度较小。图书馆员绩效评价体系是由若干个指标组成的，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其中科研成果、工作效果、出勤率等为已知信息，而工作态度、政治素质、敬业精神则为未知信息，符合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条件。灰色关联分析对数据要求相对较低，工作量较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偏差。

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被评价对象，并按对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赋值，以列表的形式确定数据列。第二，由于各指标序列之间不存在运算关系，须对原始数据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第三，计算关联系数。计算公式为：

$$\gamma_{0i} = \frac{\Delta(\min) + \rho \Delta(\max)}{\Delta_i(k) + \rho \Delta(\max)}$$
，其中  $\rho$  为分辨系数， $\rho \in (0,1)$ ，本文取  $\rho=0.8$ ，最大极差  $\Delta(\max) = \max \max \Delta_i(k)$ ，最小极差  $\Delta(\min) = \min \min \Delta_i(k)$ 。第四，求各层次加权系数及加权关联度。利用公式  $\gamma_i = \sum_{k=1}^n \gamma_{0i}(k) * \omega_i(k)$ ，式

中  $\gamma_i$  为第  $k$  个理想对象的加权关联度， $\omega_i(k)$  为第  $k$  个指标的权重。第五，建立评价对象关联序，按加权关联度数值的大小组成关联序列，从而确定评价对象的主次优劣。加权关联度越大，其绩效评价结果越好<sup>[7]</sup>。

### 5.2 实证分析

以SS学院图书馆为例，该馆共有馆员9人，为隐去馆员的个人信息，分别用  $S_1、S_2、S_3 \cdots S_9$  表示。按学校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对照考核指标分别对每位馆员打分赋值，其中部门领导赋分权重为60%，同事互评分占比为30%，个人自评分占比10%。计算后四舍五入保留整数，结果如表4所示，该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好。

以指标的最大值作为理想值，分别对9名馆员的评价分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各项指标的绝



表4 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赋值

馆员	Z <sub>1</sub>	Z <sub>2</sub>	Z <sub>3</sub>	Z <sub>4</sub>	Z <sub>5</sub>	Z <sub>6</sub>	Z <sub>7</sub>	Z <sub>8</sub>	Z <sub>9</sub>	Z <sub>10</sub>	Z <sub>11</sub>	Z <sub>12</sub>	Z <sub>13</sub>	Z <sub>14</sub>	Z <sub>15</sub>
S <sub>1</sub>	80	91	83	90	78	82	76	80	95	86	100	65	90	89	88
S <sub>2</sub>	76	85	77	88	70	76	80	82	90	88	100	72	96	76	85
S <sub>3</sub>	93	83	93	89	79	93	87	89	98	90	95	68	92	91	90
S <sub>4</sub>	72	90	72	88	83	82	80	90	90	92	100	80	90	78	93
S <sub>5</sub>	81	78	80	95	87	86	76	75	93	87	90	76	88	86	96
S <sub>6</sub>	85	92	85	91	75	85	80	80	91	85	100	68	95	89	87
S <sub>7</sub>	82	83	70	90	76	73	90	68	90	89	90	78	89	77	90
S <sub>8</sub>	95	88	83	82	88	90	85	75	89	95	95	76	92	90	94
S <sub>9</sub>	71	81	86	88	90	70	73	66	95	90	100	69	90	82	86

表5 图书馆员绩效评价指标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系数	Z <sub>1</sub>	Z <sub>2</sub>	Z <sub>3</sub>	Z <sub>4</sub>	Z <sub>5</sub>	Z <sub>6</sub>	Z <sub>7</sub>	Z <sub>8</sub>	Z <sub>9</sub>	Z <sub>10</sub>	Z <sub>11</sub>	Z <sub>12</sub>	Z <sub>13</sub>	Z <sub>14</sub>	Z <sub>15</sub>
Y <sub>1</sub>	0.194	0.926	0.674	0.701	0.600	0.653	0.550	0.692	0.707	0.499	1.000	0.474	0.544	0.871	0.554
Y <sub>2</sub>	0.503	0.643	0.564	0.626	0.473	0.549	0.631	0.738	0.475	0.562	1.000	0.629	1.000	0.474	0.475
Y <sub>3</sub>	0.906	0.583	1.000	0.661	0.620	1.000	0.851	0.957	1.000	0.642	0.643	0.530	0.642	1.000	0.623
Y <sub>4</sub>	0.455	0.863	0.496	0.626	0.720	0.653	0.631	1.000	0.475	0.750	1.000	1.000	0.544	0.510	0.768
Y <sub>5</sub>	0.579	0.473	0.614	1.000	0.857	0.747	0.550	0.600	0.591	0.529	0.474	0.772	0.473	0.730	1.000
Y <sub>6</sub>	0.658	1.000	0.721	0.745	0.545	0.721	0.631	0.692	0.508	0.473	1.000	0.530	0.878	0.871	0.525
Y <sub>7</sub>	0.597	0.583	0.473	0.701	0.562	0.508	1.000	0.506	0.475	0.599	0.474	0.871	0.506	0.491	0.623
Y <sub>8</sub>	1.000	0.759	0.674	0.474	0.900	0.873	0.774	0.600	0.446	1.000	0.643	0.772	0.642	0.931	0.832
Y <sub>9</sub>	0.445	0.534	0.747	0.626	1.000	0.473	0.501	0.484	0.707	0.642	1.000	0.552	0.544	0.600	0.498

对差序列值 $\Delta$ ，再利用公式 $\gamma_{0i}(k) = \frac{\Delta(\min) + \rho \Delta(\max)}{\Delta_i(k) + \rho \Delta(\max)}$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结果如表5所示。

最后我们利用公式 $\gamma_i = \sum_{k=1}^n \gamma_{oi}(k) * \omega_i(k)$ 求出每位馆员的加权关联系数： $Y_i = (Y_1, Y_2, Y_3, Y_4, Y_5, Y_6, Y_7, Y_8, Y_9) = (66.87, 62.43, 67.84, 68.96, 66.93, 70.13, 59.31, 75.67, 61.01)$

按照关联度大小排序后得到关联序：

$$Y_8 > Y_6 > Y_4 > Y_3 > Y_5 > Y_1 > Y_2 > Y_9 > Y_7$$

从关联度的数值上来看，9位馆员均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关联度均超过50%，其中S8馆员绩效评价最好，最接近最优指标，意味着该馆员的综合评价最好，而S7馆员的综合评价得分最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们将馆员每项指标的得分情况与二级指标权重 $\omega_{oi}$ 的乘积之和，得到9位馆员的德、能、勤、绩分项的得分结果（见表6）。

以每位馆员的德、能、勤、绩得分为依据，在今后的图书馆竞聘上岗和内部岗位调整时，通过对各项指标得分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每位馆员聘用到合适的岗位，尽量做到扬长避短、人尽其用。例如：S<sub>9</sub>和S<sub>4</sub>

表6 馆员德能勤绩指标得分

馆员	Y <sub>1</sub> (德)	Y <sub>2</sub> (能)	Y <sub>3</sub> (勤)	Y <sub>4</sub> (绩)
S <sub>1</sub>	87.66	78.91	93.52	85.92
S <sub>2</sub>	83.21	78.14	92.35	82.88
S <sub>3</sub>	88.32	88.36	94.44	88.05
S <sub>4</sub>	83.33	83.15	93.68	85.56
S <sub>5</sub>	84.44	80.00	90.10	88.21
S <sub>6</sub>	89.32	80.95	91.72	87.17
S <sub>7</sub>	82.33	78.47	89.67	83.83
S <sub>8</sub>	85.66	84.62	92.81	89.91
S <sub>9</sub>	83.33	72.43	94.85	83.44

馆员的勤项得分较高，而能和绩项得分均相对较低，在岗位调整时，可以安排去对创新要求不高的流通部门作流通馆员；S<sub>8</sub>和S<sub>3</sub>馆员的绩和能指标的得分都很高，可以调整去对创新能力要求较高的信息服务、学科服务等相关岗位；S<sub>6</sub>和S<sub>1</sub>的德和勤得分相对较高，可以从事办公室和读者服务相关工作；S<sub>5</sub>和S<sub>4</sub>馆员可以从事采访等岗位工作。通过对馆员的岗位调整，不仅能使馆员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提高工作积极

性,还有利于图书馆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 6 结语

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员的绩效评价分析,我们发现:  
(1)在利用层次分析时,在德、能、勤、绩四个指标中,业绩指标所占权重最高,这与考核办法制度中要求重点考核业绩是吻合的。紧随其后是勤指标和能指标。高校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部门,大多为程序化工作,对创新性要求不高的工作特征,符合“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论,所以勤和能指标权重不高也较为合理。四个指标中德指标权重最低,看似不太合理,但过硬政治素质、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对高校图书馆员的基本要求。(2)在实证分析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我们得出各位馆员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判

断出哪些馆员优秀,哪些馆员有待提高。通过计算德能勤绩各项指标得分,能找出每位馆员每项指标的差距,还可以作为调整岗位的依据,做到人适其岗。

关于高校图书馆员的绩效评价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校图书馆内部有文献采访、图书编目、流通阅览、学科服务、行政管理等诸多岗位,每个岗位均有不同的工作特点,对馆员的能力要求均有较大差异。用同一指标考核不够细划,如果分岗位考核可能更加合理、准确。

(2)在构建两两判断矩阵时,采用德尔菲法最后形成统一意见,没有反映专家的最初意见,如果采用其他加权系数法可能会更好。(3)在实证分析时,采用部门领导60%、同事互评30%、个人自评10%的赋分只是参考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大多高校的通行做法,没有理论依据,存在一定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1] 李鹤松,熊伟.当代公共图书馆流动空间再造与用户服务升级[J].图书馆论坛,2017,37(12):12-19.
- [2] BEER M,DAWSON J E,RUH R,et al.a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research,design,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1[J]. Personnel Psychology,1978,31(3):505-535.
- [3] 何传超.基于AHP-熵权法的高校图书馆员绩效评价研究[J].图书馆研究,2020(9):27-31.
-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试行)[EB/OL].[2017-11-10].[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107/t20110727\\_146848.htm](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107/t20110727_146848.ht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EB/OL].[2011-05-06].[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shzb/fwyd/SYkaoshizhaopin/zyhgjgsydwgkzp/xgzc/201711/t20171110\\_281424.htm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shzb/fwyd/SYkaoshizhaopin/zyhgjgsydwgkzp/xgzc/201711/t20171110_281424.html).
- [6] 顾东蕾.学科馆员竞争力的灰色关联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6(1):105-107.
- [7] 王明东,赵国生.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9.

**作者简介:** 何传超,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收稿日期:** 2022-01-13

**本文责编:** 李芳

## 基于 Unity3D 的自引查找工具设计与实现

顾笑迎 吴 璿 李 硕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62)

**摘 要:** 文章分析了论文查收查引的现状和需求,利用Unity3D开发了自引查找工具,并介绍了工具的开发环境、设计思路、源代码以及操作流程。通过随机抽取样本报告做对比验证,结果表明,开发的自引查找工具能极大地提高自引他引区分工作的准确性、便捷性和高效性。笔者希望能为自引他引区分这个查收查引工作中的瓶颈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查收查引; Unity3D; 自引; 他引

**中图分类号:** G254.97 **文献标识码:** A

### A Self-Citation Tool Based on Unity3D

**Abstract**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need for index and citation checking servic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eveloped a self-citation retrieval tool using Unity3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esign idea and open source code of the tool. Comparisons done on a randomly selected report show using a self-citation retrieval tool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feas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dex and citation checking services. The author hopes to provide a new solution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in index and citation checking services.

**Key words** index and citation checking service; Unity3D; self-citation; citation

“查收查引”是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属于图书馆传统核心业务之一——参考咨询的工作范畴,是参考咨询事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其服务水平的高低被认为是衡量现代图书馆整体业务质量的重要标准。目前,高校的人才引进、职称评定、各类人才工程、科研项目申报等,都需要图书馆对其原始学术论文提供收录引用等查询证明,以此作为学校相关决策的数据支撑<sup>[1]</sup>。

#### 1 研究现状

随着越来越多管理机构对查收查引检索结果的认可,查收查引业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图书馆科技查新中心接收的查收查引业务咨询量从2013年的2 716单增长到2019年的4 749单;浙江大学图书馆2016—2018年接受的查收查引业务委托达23 826人

次<sup>[2]</sup>。由于作者提供的原始信息不准确、引用者标注的引用格式不规范、数据库误标误引、作者重名等原因,查收查引工作往往需要耗费检索人员大量的时间,且导致该项工作的自动化较难以实现<sup>[3]</sup>。一般认为自引易受作者或期刊编辑的主观情感影响,较他引的含金量低<sup>[4]</sup>。因此,在做查收查引工作中,委托者通常会要求区分自引和他引。由于外文数据库姓名录方式较为典型的规则是姓全拼,名仅保留首字母,这导致了大量不同中国作者的拼写是一致的,如Wang W可以是王伟、汪巍、王唯等,而系统是无法自动识别和判定的<sup>[5]</sup>。且一篇被引文献往往有很多作者,尤其是理工科的论文,有时作者能达到上百个甚至更多,要将这些数量繁多的原作者从施引文献中区分出来需要检索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自引他引的区分成为了查收查引工作中的瓶颈问题。

为了解决查收查引工作中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研究人员们做出了许多努力。通过文献调研发现,我国查收查引工作的研究探索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开发整体系统,二是针对某个工作步骤,如区分自引他引、自动生成报告等,或利用已有软件或编写程序开发软件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

袁浩等人<sup>[2]</sup>对我国查收查引系统进行了调研,发现有十余家图书馆自行开发了查收查引系统,但大部分仅用于自己的图书馆,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系统、北京邮电大学系统(株洲田心系统)、知先系统、宝和系统这五家查收查引系统通过商业渠道取得了相对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整体系统的开发耗时耗力,并非易事,且系统也仅能实现查收查引过程的半自动化,部分环节依然需要人工干预,再加上购买商业系统还要受到经费预算等的限制,查收查引系统并未得到十分广泛的普及。朱慧等人<sup>[5]</sup>对教育部认证的102家查新站的查收查引服务进行了调研,获取了其中49家的系统使用情况:15家未引进系统,34家引进系统。

没有查收查引系统加持的查新机构,在查收查引工作的开展上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部分充分利用已有的软件,如利用Excel、Endnote、NoteExpress等提高自引和他引的区分效率<sup>[6-8]</sup>,利用Word宏快捷生成检索报告中的表格<sup>[9]</sup>,利用水晶报表软件自动生成检索报告<sup>[10]</sup>,等等。还有一部分通过编写程序开发软件来提高查收查引的工作效率,如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程序,通过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的API接口直接获取数据并区分自引他引<sup>[11-13]</sup>;利用Java编写相应程序,实现自引他引的区分并生成相应统计表或报告<sup>[14-16]</sup>;结合作者姓名、单位和作者识别号编写程序进行自引他引的区分<sup>[17-18]</sup>;通过嵌套自动检索系统的微信小程序实现快速委托与收录检索的功能<sup>[19]</sup>,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或仍无法避免前期或后期的处理工作,或未能解决自引他引的区分这个查收查引工作的瓶颈问题,或尝试解决但依然存在需改进的地方。笔者基于Unity3D开发了一款高效的自引他引区分软件,解决查收查引工作中的瓶颈问题,过程的实现不受浏览器版本、模式,以及数据库更新的影响,也不受WOS付费API接口的限制,可一劳永逸长期使用。

## 2 开发工具介绍

Unity3D是由Unity Technologies研发的可跨平台的开发引擎,可延伸于基于WebGL技术的HTML5网页平台,以及tvOS、Oculus Rift、ARKit等新一代多媒体平台。编辑语言支持C#或JavaScript,对开发者要求低,通过开源代码可方便地生成相关软件工具。除可以用于研发电子游戏之外,Unity3D还广泛用作建筑可视化、实时三维动画等类型互动内容的综合型创作工具。

Unity3D最初于2005年在苹果公司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对外公布并开放使用,当时只是一款面向Mac OS X平台的游戏引擎。时至2018年,该引擎所支持的研发平台已经达到27个<sup>[20]</sup>,这些平台包括Windows、Mac OS、iOS、安卓、索尼PS4、任天堂Switch、微软Xbox One、谷歌Stadia、微软Hololens、谷歌AR Core、苹果AR Kit、商汤SenseAR等。Unity分为免费的个人版,付费的进阶版、专业版以及面向大型用户的企业版。

Unity3D的开发环境为层级式,编辑器可视化,页面预览动态化。可开发微软Microsoft Windows和Mac OS X的可执行文件、在线内容(通过Unity Web Player插件支持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Mozilla、Netscape、Opera和Camino)、Mac OS X的Dashboard工具、Wii程序和iPhone应用程序。

近年来,Unity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产品和服务。2019年Unity中国版编辑器正式推出,其中加入专为中国Unity研发的Unity优化-云端性能检测和优化工具。此外,Unity还为各种规模的游戏开发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通过线上问答、项目分析、现场培训等形式为中国开发者解决各种难题。

## 3 软件设计思路

从实际收到的查收查引委托来看,涉及最多的检索数据源为WOS平台上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等数据库,该平台也是业界公认的权威检索数据源之一。笔者利用Unity3D工具设计一款WOS引文数据的自引查找工具。软件的设计思路是将被引文献的作者列与施引文献的作者列进行对比,筛选出

相同的用括号括起并标记为不同的颜色,也即为自引的记录;同时还要限定比对的范围为某篇被引文献之后,下一篇被引文献之前,PT列标J(期刊)、B(书籍)、S(丛书)、P(专利)的该被引文献的施引文献。算法程序控制流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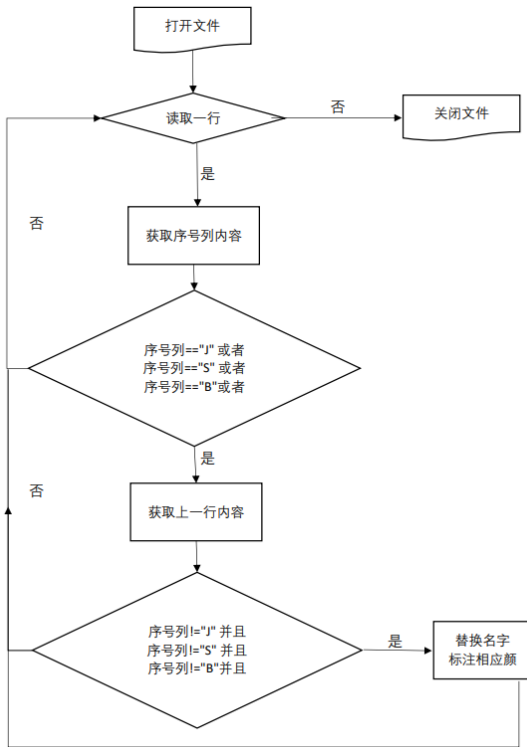


图 1 算法程序控制流图

核心代码如下:

```
public IEnumerator handle(){
    string colorname = "";
    GameObject[] colorlist = GameObject.
FindGameObjectsWithTag ("toggle");
    for (var i = 0; i < colorlist.Length; i++) {
        Toggle new1 = colorlist [i].
GetComponent<Toggle> ();
        if (new1.isOn == true) {
            colorname = colorlist [i].
name;
        }
    }
    xuhao_column = getNumByString
(xuhao.text);
    name_column = getNumByString
(xname.text);
```

```
filePath = file.text;
FileInfo newFile = new FileInfo
(filePath);
using (ExcelPackage package = new
ExcelPackage(newFile))
{
    //showtips.text = filePath+ sheet.text;
    ExcelWorksheet worksheet = package.
Workbook.Worksheets[sheet.text];
    for (int i = 1; i <= 8000; i++) {
        var temp1 = worksheet.
Cells[i, xuhao_column].Value;
        string strtemp1 = Convert.
ToString (temp1);
        if (strtemp1.CompareTo("J")
== 0 || strtemp1.CompareTo("S")==0 || strtemp1.
CompareTo("B")==0 || strtemp1.CompareTo("P")==0) {
            var temp2
= worksheet.Cells[i - 1, xuhao_column].Value;
            string strtemp2 = Convert.ToString
(temp2);
            //设置第一次碰到J值时候,确定的
名字列的行号
            if (strtemp2.CompareTo("J") !=
0 && strtemp2.CompareTo("S")!=0 && strtemp2.
CompareTo("B")!=0 && strtemp2.CompareTo("P")!=0) {
                lastnameno = i - 1;
            }
            z u i z h o n g =
biaoshiName(Convert.ToString(worksheet.Cells[i,name_
column].Value), Convert.ToString(worksheet.
Cells[lastnameno,name_column].Value));
            showtips.text = "处理第" +
Convert.ToString(i+1) + "行数据";
            yield return new
WaitForEndOfFrame();
            if (zuizhong[1].CompareTo("1")
== 0) {
                //有名字替换成功
                worksheet.Cells[i,name_
```

```

column].Value = zuizhong[0];
if (colorname.CompareTo
("Red") == 0) {
    worksheet.Cells[i, name_
column].Style.Font.Color.SetColor(System.Drawing.Color.
Red);
}
else if(colorname.CompareTo
("Green") == 0){
    worksheet.Cells[i, name_
column].Style.Font.Color.SetColor(System.Drawing.Color.
Green);
}
else if(colorname.CompareTo
("Blue") == 0){
    worksheet.Cells[i, name_
column].Style.Font.Color.SetColor(System.Drawing.Color.
Blue);
}
}
}
}
else{
    lastnameno = 0;
}
}
package.Save();
}
showtips.text = "处理完成";
}
}

```

#### 4 软件运行前的准备工作

从WOS平台导出被引文献记录, 导出格式选择制表符分隔文件, 导出内容选择完整记录, 将所得txt文件复制粘贴到Excel文件中。在A列标上序号。检索各被引文献的相应施引文献, 以同样的方式导出, 通过插入, 放在该被引文献的下方, 如图2所示。A列为被引文献的序号和施引文献的文献标识, B列为作者名字缩写, F列为作者名字全拼。

#### 5 软件操作

软件运行界面如图3所示, 输入文件路径、sheet页名称、序号列A、名字列B(或F), 选择标注的颜色,

图2 文件准备示例



图3 自引查找工具界面

点击开始即可。

实际操作中, 由于B列是作者姓名的缩写, 会出现大量假阳性的对比结果, 而F列作者全拼列则又会由于全拼的表达方式不同(如何积丰可能被表达为he jifeng, he ji-feng, he, jifeng等)而漏掉一些真阳性的对比结果。因此可以将B列和F列分别进行比对, 如F列显示为自引, 则确定该记录为自引。如仅有B列显示自引, 但F列不显示, 则将这部分记录通过作者姓名全拼、单位等进行复核。实践显示, 绝大部分的自引都能通过软件自行判断, 仅有少量文献需要进行人工复核, 且由于B列已经将有可能是自引的作者用括号进行了标识, 因此即使是人工复核, 也不会花很多时间。

用软件判断过后的页面显示如图4所示, B列、F列自引的记录根据选择标识了不同颜色, 并对具体的自引作者进行了括号标记。

#### 6 结果对比

对10篇被引文献共87篇施引文献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和人工Excel筛选查找两种方式进行自引他引的区分, 结果如表1所示。两种方式F列均查找到30条真



注：为清晰显示，将不同颜色的部分进行了加粗显示。

图 4 自引查找工具运行后 Excel 界面

阳性记录，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在B列共查找到35条记录，使用人工方式在B列共查找到38条记录。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在标记自引记录时共耗时5秒，而人工方式则耗时960秒，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在自引标记上提高了191倍的效率。

表 1 工具与人工区分自引和他引对比验证结果表

查找方式	B 列 / 条	F 列 / 条	耗时 / 秒	假阳性 / 条	耗时 / 秒	总耗时 / 秒
自引查找工具	35	30	5	5	40	45
人工	38	30	960	8	210	1 170

可以发现，B列使用人工方式比使用自引查找工具的方式多3条记录。经比较发现是由于诸如Zhu, H、Wang, X在筛选查找的方式下会标记出诸如Zhu, HB、Wang, XB等错误记录。可见通过自引查找工具可降低B列假阳性出现的概率，减少后续人工复核的工作量。

在对B列进行自引标记时，使用自引查找工具不仅减少了假阳性的出现，而且由于把自引作者用括号

进行了标记，能极大地提高人工复核的效率。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后对5条假阳性记录进行人工复核共耗时40秒，人工方式对8条假阳性进行人工复核共耗时210秒。如文献作者较多，将耗费更多的时间。因此使用软件在假阳性复核上能提高至少4—5倍的工作效率。

在总耗时上，使用自引查找工具对10篇被引文献共87篇施引文献进行自引标记总耗时45秒，而使用人工Excel筛选查找方式总耗时1 170秒。使用自引查找工具相较人工方式可提高至少25倍工作效率。

## 7 小结与讨论

查收查引工作由于客观原因，完全实现自动化较为困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大量重复工作，基于Unity3D开发的自引查找工具能在自引和他引的区分这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能提高至少25倍工作效率，是一项可在其他图书馆复制采用的微技术革新。

今后还可考虑通过作者姓名结合单位以及作者识别号的比对来进行自引的自动查找，减少需要人工复核的记录，进一步提高自动化程度并提高准确率。但由于单位的表达存在差异、一个作者可能涉及多个单位、作者识别号的使用还不够广泛等原因，这项工作的开展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另外，还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工具的适用性，如将中文的CSCD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等纳入适用范围，全面提高图书馆查收查引的工作效率。

## 参考文献：

- [1] 苏秋侠.智慧图书馆背景下查收查引服务探析: 基于“985工程”高校图书馆网站的调查[J].图书馆学研究,2019(24):61-68.
- [2] 朱玉奴,孙丽娟,王慧.高校图书馆查收查引服务发展现状的量化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0(S1):206-208.
- [3] 马芳珍,李峰,季梵,等.对CALIS查收查引系统的测试和应用效果评价[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2):97-102.
- [4] 朱大明.他引或自引: 关键是学术诚信[J].科技导报,2008(16):99.
- [5] 朱慧,刘宏斌,韩雪丹.“双一流”建设高校评价需求视角下查收查引服务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2):67-72.
- [6] 张雪娟,樊亚芳.NoteExpress在论文查收查引工作中的应用[J].情报探索,2017(6):45-49.
- [7] 樊亚芳.利用文献管理软件提高论文查收查引工作效率的实践与应用[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37(2):63-66.
- [8] 蒋君,张玢,梅梅,等.论文查收查引工具设计与应用[J].医学信息学杂志,2018,39(6):61-66.
- [9] 赵源.巧用Word宏提高查收查引工作效率[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1):138-139.

(下转第82页)

· 探索与创新 ·

## 公共图书馆“小微权力”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严剑平 何东凝

(宁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66)

**摘要:**公共图书馆“小微权力”治理机制借助“微权力”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完善权力清单、坚持教育倡廉、厘清权力边界、推广廉政文化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的内部管理和治理体系,形成可检查、可监督、可追溯的权力运行体系。文章介绍了宁波图书馆开展“小微权力”治理的实践做法,为基层微权力在公共图书馆界的监管和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小微权力;治理机制;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mall and Micro Power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micro power",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mall and micro power" of public libraries further improves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system of libraries by improving the power list, adhering to education and advocating integrity, clarifying the power boundary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so as to form an inspection, supervision and traceable power ope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small and micro power" governance in Ningbo Library,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micro power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power; governance mechanism; public library

### 1 引言

公共图书馆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开展全民阅读推广的职责<sup>[1]</sup>。公共图书馆也是上级财政全额拨款的文化服务单位,必须把有限的经费真正使用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环节,在资源建设、服务质量、业务拓展上下功夫,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小微权力”是处于国家行政体系“神经末梢”的基层一线管理者行使的直接影响服务对象利益的小范围微型公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权力源于人民赋予,自当为民谋福祉,为民排忧解难。“小微权力”虽小,但是点多、面广,而且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与民生幸福息息相关,如果放松了对“小微权力”的监管和把控,从小的方面讲会影响单位的形象和干部的前途,从大的方面讲会滋生腐败,影响人民利益,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危害性不容小觑。

近年来,宁波图书馆一直思考如何更好地用钱、用权、用人,把“微权力”关进“笼子里”,打好治理“组合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微权力”治理中做好表率。在实践中,宁波图书馆根据实际情况,理清、理顺、明晰各项“小微权力”清单,形成规章制度。同时,对内强化“微权力”的监督与管理,对外加强廉政文化的宣传推广,形成“微权力”治理内外结合的约束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做好“微权力”治

理践行者和监督者的同时,做好宣传者和倡导者,在全社会引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努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和谐。

## 2 理清“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

“小微权力”是基于公共组织授权形成的一种组织性权力,包括决策权、组织权、指挥权、人事权、财政权、奖惩权等<sup>[2]</sup>。公共图书馆虽然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但在工作实践中也会产生相应的“小微权力”,为更好地运行和维护好这些“小微权力”,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定期梳理“小微权力”清单内容,开展动态调整和优化,确保清单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使之更贴近实际,更有操作性和针对性,推动公共图书馆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sup>[3]</sup>。宁波图书馆根据目前图书馆运营和业务开展情况,拟订了“小微权力”清单(见表1),共分为日常管理类权力清单、便民服务类权力清单、重大决策类权力清单三大块和25项具体内容,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真正做到规范运行、有序运营。

表1 宁波图书馆“小微权力”清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日常管理 类权力 清单	职务、职称晋升	便民服务 类权力 清单	分馆建设	
	评先评优		流动图书馆建设	
	各类人才项目推荐 选拔		汽车图书馆服务	
	党员发展		自助图书馆建设	
	人员挂职研修等选派	阅读推广服务 下基层	重大决策 类权力 清单	图书馆章程、 发展规划
	办公用房、设备等 分配	图书馆财务预 决算		
	资产处理	馆企合作		
	物业外包等项目 考核管理	开展重大活动		
	三公经费	重大项目申报		
	日常维护维修	公款存放		
	政府采购	人员招聘		
	小型物品采购			
专家邀请				

## 3 坚持教育倡廉,打好思想建设“组合拳”

教育学习是开展廉政教育和落实“微权力”治理

的重要抓手。宁波图书馆结合主题教育,利用多种载体多方位开展廉政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打好“微权力”治理的思想教育“组合拳”。

### 3.1 结合主题教育

宁波图书馆结合“两学一做”、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利用“三会一课”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自学、小组学、集体学等方式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重要著作,认真贯彻各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 3.2 开展廉政实践活动

宁波图书馆先后组织党员赴奉化大堰党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到宁波看守所开展实地警示教育;组织党员观看《初心晨起·宣言》音乐剧。在此基础上开展“党员上讲台展风采”活动,通过身边党员讲身边事,引导教育大家珍惜工作、干好工作,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廉政意识,使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 3.3 发挥图书馆资源优势

利用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优势,邀请法律、历史、国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传递廉政建设、家风家训正能量。2018年以来,宁波图书馆先后邀请宁波市委党校专家围绕“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专题报告;邀请作者、诗人、文学评论家牛殿庆主讲“习近平讲话用典与市民修身”;邀请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渠长根教授主讲“弘扬红船精神,奋力走在新时代前列”;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人于赓哲主讲“颜氏家训与颜真卿”;邀请《百家讲坛》主讲人、河北大学文学院韩田鹿教授主讲儒家学说等。在宁波图书馆馆刊《天一文荟》上,开设“廉政文化”专栏,每年22期,发给职工学习。利用“天一展览”,举办线上线下廉政文化教育展览;利用图书馆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平台推送130期微党课以及有关党建、廉政教育的电子书和视频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最新要求。

## 4 厘清权力边界,明确权力运行轨道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制度是约束权力的“紧箍咒”。只有从单位实际出发,根据上级的相关指示要



求,精准量身设计相关政策规章,才能从制度层面从严从紧从实补齐“微权力”治理的漏洞,引导领导干部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近年来,宁波图书馆从完善单位内控制度、开展重点廉政谈话、建立述职测评机制、落实日常督查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厘清权力边界,明确权力运行轨道。

#### 4.1 完善内控制度

宁波图书馆委托专业的会计事务所,贯彻落实财政相关规定,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进一步完善单位内控制度,保证经费使用、采购、报销、物品领用、资产管理等事务的规范操作和有章可循。制订《公务出差管理办法》《业务用车管理办法》《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规定,严格落实公务接待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遵守“八项规定”和有关廉政规定。建立采购小组审核和领导班子讨论决定制度,坚持大额经费一律经过采购小组审核并提交馆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物品采购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市政府公开招标、电子竞价或三方比价等方式,做到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在车辆加油、维修等方面,坚持定点服务和定向支出。严格落实公务卡刷卡制度,让经费支出和报销更规范和可控。把各类制度、办事程序编成《宁波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

#### 4.2 开展重点廉政谈话

宁波图书馆每年定期开展重点人员的廉政谈话,从党的大政方针和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入手,以集中谈、个别谈等方式开展,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要求,在思想上筑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微权力”运用的“堤坝”。干部任职使用前,把廉政谈话作为重要内容,使他们轻松上岗、清廉任岗。每年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各党员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看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更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 4.3 建立述职测评机制

宁波图书馆把述职述廉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来抓。结合年终考核,要求每名中层以上干部上台述职,把廉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让全体职工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

#### 4.4 落实日常督查制度

宁波图书馆制定廉政风险防控点,对人事、财务、采购、项目等人员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微权力”运用的监督。根据《关于落实市纪委“三交底”清单

整改的通知》,对照“三张清单”存在问题和风险,结合实际工作职能,进行廉政风险自查,落实各项廉政举措,确保廉政不发生问题。同时,针对“三交底”廉政风险点,落实相关防控措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把廉政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 5 坚持系统集成,推广廉政文化

公共图书馆是文化服务机构,也承担着社会教育的职能。近年来,宁波图书馆在对内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微权力”治理的同时,对外利用本身资源优势做好廉政文献资源集中推介、红色文化空间再造展示、廉政文化活动品牌的打造提升、廉政文化的宣传推广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5.1 推广廉政文献资源

宁波图书馆每年根据图书出版情况,向社会各界推出党建和廉政文献最新书目,采购相关图书,开辟借阅空间,用于读者专门借阅查询。在宁波市政府、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地设立图书流动点,根据读者需求定期配送相关廉政图书。

#### 5.2 搭建红色文化空间

在宁波图书馆新馆设立乔石书房,收藏乔石同志及其夫人郁文女士的藏书22 000余册以及大量手稿、信札、照片、书画等珍贵资料。目前乔石书房已成为一个集文物收藏、文献阅览、陈列展示、红色教育、学术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藏文献室。2021年,宁波图书馆全新推出“走进乔石书房”系列活动,目前活动已举办15期活动,累计参加人数400人次,有力助推了全社会党史学习热潮。

#### 5.3 打造廉政文化品牌

讲座作为文化传播、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在教育民众、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天一讲堂”作为宁波图书馆的文化品牌,在打造廉政文化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社会教育作用<sup>[4]</sup>。近年来,宁波图书馆利用“天一讲堂”品牌推出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文化建设大讲堂,邀请廉政文化和法治宣传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廉政系列讲座,使廉政文化和“微权力”治理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时,为将廉政文化理念更好地传播给广大民众,宁波图书馆还创办了道德讲堂,面向宁波市民开展法律讲座、家庭教育讲座、幸福婚姻的教育讲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座等,力求从道德建设层面营造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让人们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新思想。此外还与宁波市委组织部合作,将“天一讲堂”讲座视频上传至宁波党员干部学习网,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自2010年8月起,学习人次近30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 6 结语

“小微权力”的规范运行是基层治理规范化、法

治化和高效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sup>[5]</sup>。宁波图书馆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举措,确保了“小微权力”按照“一切工作有程序、一切程序有控制、一切控制有规范、一切规范有依据”的目标运行,形成了可检查、可监督、可追溯的权力运行体系。公共图书馆“小微权力”实现阳光下运作,使干部的权力接受上级和群众监督,能够得到群众信任,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为推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1-12-16].<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711/86402870d45a4b2388e6b5a86a187bb8.shtml>.
- [2] 钱再见.基层治理中“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深层逻辑[J].国家治理,2020(6):33-37.
- [3] 蔡璟.以“小微权力”监督撬动基层“大治理”[J].唯实,2021(8):82-83.
- [4] 洪敏.“天一讲堂”促推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4(2):49-51.
- [5] 余敏江.基层微权力监管存在的问题与治理之道[J].人民论坛,2021(4):46-48.

**作者简介:** 严剑平,宁波图书馆副馆长,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何东凝,宁波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1-12-17

**本文责编:** 郑秀花

(上接第78页)

- [10] 阚洪海,赵杰.基于水晶报表的查收查引报告自动生成的设计与实现[J].现代情报,2017,37(4):129-133.
- [11] 虞晨琳.基于Python语言的WOS引文检索软件设计与实现[J].新世纪图书馆,2020(11):53-56.
- [12] 邵燕霞,李晓娟.基于Python的论文查收查引可视化软件设计与实现[J].江苏科技信息,2019,36(14):11-16.
- [13] 高营.基于WOS API的论文自动查收查引程序设计与实现[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4):82-85.
- [14] 关智远.查收查引文献数据的自动分析及其报告内容的自动实现[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12):38-43.
- [15] 马海收,刘媛媛,郑菲,等.基于ISI Web of Knowledge引证检索服务统计软件设计与实现[J].情报杂志,2012,31(2):148-152.
- [16] 孔云,资芸,杨婷,等.论文收录证明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9):56-61.
- [17] 吴帼帼.高校图书馆查收查引中他引区分策略研究与实现[J].新世纪图书馆,2022(2):23-29.
- [18] 周文云,马云辉,李菲菲,等.基于片词模糊匹配的智能化查收查引系统研究[J].情报探索,2020(10):36-41.
- [19] 陈斯斯,郭继军,杨颖.嵌套自动检索系统的微信小程序查收查引服务[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28(11):65-69.
- [20] 关于Unity(详细版)[EB/OL].[2022-03-28].<https://developer.unity.cn/projects/5f02da69edbc2a001f442a7b>.

**作者简介:** 顾笑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查新、文献检索、信息素养教学;吴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查新、文献检索、信息素养教学;李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查新、文献检索、信息素养教学。

**收稿日期:** 2022-05-12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文献学研究 ·

## 徐行可旧藏《四家宫词》版本价值及批校考述

柳 燕 王唐梦影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徐行可先生捐赠的《四家宫词》，为明代万历年间李良柱刻本，是国内孤本。以“四家”为名的宫词总集大都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宫词，李良柱刻本独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杨太子宫词，选录独特。李良柱刻本将嘉靖三十一年黄鲁曾编、郭云鹏刻《编选四家宫词》作为重要的参考版本，展现了明刻宫词总集的刊刻细节。徐行可在此本上有197处的批校，其批校所据底本为毛晋《三家宫词》和《二家宫词》。徐氏批校体现了其不擅改古籍的严谨学风、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以及广博的学识积累，为后学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源和精神财富。

**关键词:** 徐行可；《四家宫词》；李良柱刻本；版本价值；学术思想；治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G256.22; G256.4      **文献标识码:** A

### The Research of Value and Postil of *Si Jia Gong Ci (Four Palace Lyrics)* Collected by Xu Xingke

**Abstract** In the Hubei Provincial Library, there is a copy of "*Si Jia Gong Ci (Four Palace Lyrics)*" donated by Mr. Xu Xingke, which was engraved by Li Liangzhu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s the only copy in China. Most of the general collections of palace lyrics under the name of "four families" include Wang Jian, Lady Hua Rui, Wang Gui, and Emperor Song Huizong's palace lyrics, but Li Liangzhu's engraving is unique in that it includes only Wang Jian, Lady Hua Rui, Wang Gui, and Empress Yang's palace lyrics. The one engraved by Li Liangzhu referred to *Jing Xuan Si Jia Gong Ci (Selected Four Palace Lyrics)* edited by Huang Luzeng and engraved by Guo Yunpeng in the 31<sup>st</sup> year of Jiaping, showing the detail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ing-carved palace words collection. Xu Xingke has more than 190 postils, based on Mao Jin's *San Jia Gong Ci (Three Palace Lyrics)* and *Er Jia Gong Ci (Two Palace Lyrics)*. Xu's work reflects his rigorous learning style of not being good at altering ancient texts, his realistic thinking, and his extensiv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leaving valuable documentary resources and spiritual wealth for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Xu Xingke; *Si Jia Gong Ci*, Li Liangzhu's edition; version value; academic thinking; research spirit

#### 1 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四家宫词》的版本价值

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四家宫词》(不分卷),索书号“集三/1387”,明万历七年(1579年)李良柱刻本,此藏本为徐行可先生捐赠。徐行可(1890—1959年),名恕,号彊諺,湖北武昌人,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徐行可先生捐赠的明刻本《四家宫词》不

仅选录独特,而且版本珍贵。此刻本得以流传,与徐行可先生慧眼识珠、精心妥善的保存密不可分。此刻本为完帙,“匡高17.6厘米,宽12.9厘米。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sup>[1]</sup>。书中共有八种铃印(见图1)。陈文烛《〈四家宫词〉序》天头有“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善本”铃印、序文标题下有“徐恕读过”印,文后有“五岳山房”“阳春白雪人家”两方铃印。李良柱《刻〈四家宫词〉引》标题下有“徐恕读过”铃印,文后有“癸亭之人”“万玉楼”“甲戌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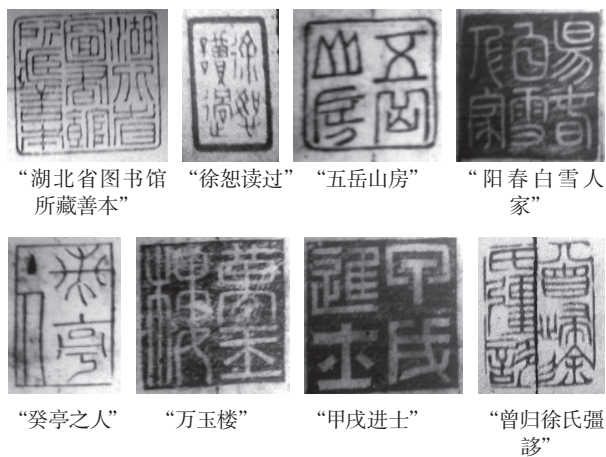


图1 《四家宫词》中八种印章

三方钤印。书末有“曾归徐氏彊諺”钤印。

### 1.1 选录独特：在四家宫词类总集中独收王建、王珪、花蕊夫人、杨太后四家之宫词

《四家宫词》是一部宫词总集，收录王建宫词、王珪宫词、花蕊夫人宫词、杨太后宫词四种。王育红《五种宫词总集版本源流考》详细考述了诸家宫词的存见以及亡佚情况<sup>[2]</sup>。经统计，现存以“四家”命名的宫词总集有以下五种（见表1）。

五种“四家宫词”中，宋刻残本收录宋徽宗、张公庠、周彦质、王仲修四家宫词，其他三种刻本都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四家宫词，只有《四家宫词》李良柱刻本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杨太后四家宫词。可见，李良柱刻本在选辑上具有独特之处。徐行可收藏的恰是选集独特的李良柱刻本，体现出他收藏古籍的独到眼光。

李良柱在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宫词后补充杨太后宫词。陈文烛《四家宫词序》云：“余每爱花蕊夫人宫词，与唐人王建相为上下，宋学士王珪曾爱而图传。吾友李伯任比部见与余合得二王宫词，益以宋太后者汇刻为四家，命余引其端。”<sup>[3]</sup>序陈文烛喜爱花蕊夫人宫词，李良柱与其合得王建、王珪宫词，在获得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之后，李良柱补充了杨太后宫词（按：据李良柱《四家宫词引》，杨太后宫词在当时散佚严重，仅存30首），校订汇编成集。同时，他还认为王建、花蕊夫人、王珪、杨太后宫词呈现了四种不同的风格特点，《刻四家宫词引》言：“仲初之蕴藉春容实为之祖；青城费氏效之，慷慨悲愤，尤为奇逸；禹玉继作多庙廊雍容之气；宁宗杨后之作，亦优游闲澹，惜散失者过半，仅存三十首。余家兴调卑弱无足取耳。”<sup>[3]</sup>刻四家宫词引：<sup>3</sup>王建宫词有含蓄雅致之美，花蕊夫人宫词有慷慨悲愤之音，王珪宫词有庙堂富贵之风，杨太后宫词有悠闲适然之气，余家所作宫词格调卑弱，不如以上四家。因此，李良柱仅选录以上四家宫词，编成收录独特的《四家宫词》。

### 1.2 版本珍贵：国内孤本，在明刻宫词中具有重要地位

湖北省图书馆藏《四家宫词》不仅选辑独特，其版本也很珍贵。首先，此万历刻本《四家宫词》为国内孤本。其次，它在明刻宫词总集中具有重要地位。

从成书年代上看，《四家宫词》成书较早，仅晚于《编选四家宫词》（嘉靖间郭云鹏刻本）。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四家宫词》与各明刻宫词总集的关系，现

表1 五种“四家宫词”总集存见及收录宫词情况对比

作者	五种“四家宫词”总集存见及收录宫词概况				
	《四家宫词》六卷，宋刻残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编选四家宫词》四卷，明黄鲁曾编，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郭云鹏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四家宫词》不分卷，明万历七年（1579年）李良柱刻本，藏于湖北省图书馆	《四家宫词》二卷，明杨慎评，朱万选校订，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刊本，即词坛合璧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四家宫词》四卷，明林志尹辑，清陈鹿岩选定，种德堂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王建		一卷（100首）	100首	100首（录于上卷）	一卷（100首）
花蕊夫人		一卷（98首）	98首	100首（录于上卷）	一卷（100首）
王珪		一卷（67首）	67首	100首（录于上卷）	一卷（100首）
宋徽宗	三卷	一卷（166首）		300首（录于下卷）	一卷（100首）
杨太后			30首		
张公庠	一卷				
周彦质	一卷				
王仲修	一卷				

对所见明刻宫词总集、名称、版本进行综合分析,并将《四家宫词》所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宫词篇目次序与所见明刻宫词总集进行对比,探析其成书过程。

版本一:《编选四家宫词》<sup>[4]</sup>,明黄鲁曾编,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郭云鹏刻本。

版本二:《四家宫词》,明万历七年(1579年)李良柱刻本。

版本三:《三体宫词》<sup>[5]</sup>,明吴革辑,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晋陵吴氏云栖馆刻本。收录三家宫词各100首。

版本四:《三家宫词》<sup>[6]</sup>,明天启五年(1625年)毛晋绿君亭刻本,后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编入《诗词杂俎》。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诗词杂俎》影印《三

家宫词》,编入《丛书集成初编》。收录三家宫词各100首。

限于文章篇幅,表2将全部宫词次序的对比情况进行了删减,仅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以上四种明刻宫词总集中,唯《编选四家宫词》与《四家宫词》两书所收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在篇目数量、篇目次序上完全一致。比如王建“合暗报来”宫词在《编选四家宫词》《四家宫词》中均为第43首,而在《三体宫词》《三家宫词》中分别为第48首、第47首;再如花蕊夫人“小小宫娥”宫词在《编选四家宫词》《四家宫词》均为第43首,而此词未被《三体宫词》收录,在《三家宫词》中为第46首;又如王珪“一线沉波”宫词在《编选四家宫词》《四家宫词》中均为

表2 《四家宫词》所收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宫词与其他三种明刻宫词总集篇目次序对比举例

王建宫词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花蕊夫人宫词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王珪宫词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蓬莱正殿	1	1	2	1	五云楼阁	1	1	1	1	花里宫莺	1	1	1	1
殿前传点	2	2	7	2	会真广殿	2	2	2	2	洛阳新进	2	2	2	2
龙烟日煖	3	3	8	3	龙池九曲	3	3	3	3	燕去燕来	3	3	5	3
白玉窗前	4	4	9	4	东内斜穿	4	4	4	4	侍辇归来	4	4	6	4
内人对御	5	5	10	5	殿名新立	5	5	5	5	帘旌风卷	5	5	8	5
千牛仗下	6	6	11	6	安排诸院	6	6	97	6	燕子初来	6	6	10	6
延英引对	7	7	12	7	夹城门与	7	7	6	7	盆山高叠	7	7	11	7
合暗报来	43	43	48	47	小小宫娥	43	43	-	45	一线沉波	43	43	-	22
御厨不食	44	44	49	43	锦城上起	44	44	-	46	蕙炷香销	44	44	-	57
丛丛洗手	45	45	50	44	大臣承宠	45	45	-	47	东宫降诞	45	45	-	58
御池水色	46	46	51	45	舞头皆着	46	46	-	48	金铤画角	46	46	-	59
移来女乐	47	47	100	46	春早寻花	47	47	-	49	鼓角三更	47	47	-	60
未承恩泽	48	48	60	56	半夜摇船	48	48	-	50	銮舆昨夜	48	48	-	61
东风泼火	49	49	61	57	春日龙池	49	49	-	51	禁御春来	49	49	-	62
风帘水阁	50	50	4	58	寝殿门前	50	50	-	52	露井银床	50	50	-	31
圣人生日	51	51	62	59	慢梳鬟髻	51	51	-	53	盘龙渐织	51	51	-	32
避暑昭阳	52	52	63	60	别色官司	52	52	-	54	十三垂髻	52	52	-	33
内宴初秋	53	53	64	61	日高房里	53	53	-	55	内库从头	53	53	-	34
玉蝉金雀	54	54	65	62	樗蒲冷淡	54	54	-	56	黄金掌上	54	54	-	35
树叶初成	55	55	-	63	慢揲罗袖	55	55	-	57	禁庭漏促	55	55	-	36
新晴草色	56	56	52	48	宣徽院约	56	56	-	58	焚香重熨	56	56	-	37
西楼新换	57	57	53	49	丹霞亭浸	57	57	-	59	素英飘洒	57	57	-	38
舞送香毬	58	58	54	50	杨柳阴中	58	58	-	60	尽日闲窗	58	58	-	23
家常爱着	59	59	55	51	海棠花发	59	59	-	61	丽日祥烟	59	59	-	24
别教教歌	60	60	56	52	晚来随驾	60	60	-	62	新供御马	60	60	-	25
行中第一	61	61	57	54	牡丹移向	61	61	-	63	人家装着	61	61	-	26
私缝黄帔	62	62	58	53	晓日官人	62	62	-	64	帘摇翡翠	62	62	-	27
月冷江清	63	63	59	55	朱雀门开	63	63	-	65	崇文院里	63	63	-	63

续表 2

王建宫词 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花蕊夫人 宫词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王珪宫词 前四字	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小殿新妆	64	64	-	64	明朝腊日	64	64	-	66	萱草成窠	64	64	96	74
内人相续	65	65	-	65	鞍鞞盘龙	65	65	-	67	翡翠盘龙	65	65	97	-
巡吹慢遍	66	66	-	66	窗树高低	66	66	-	68	迢递金壶	66	66	98	88
黄金合里	67	67	-	67	翠辇每从	67	67	-	69	殿下排场	67	67	99	98
宿妆残粉	81	81	-	81	酒库新修	81	81	88	83					
众中偏得	82	82	-	82	白藤花限	82	82	89	84					
教遍宫娥	83	83	-	83	西毬场里	83	83	90	85					
蛾眉小妇	84	84	-	84	新翻酒令	84	84	-	86					
水中芹叶	85	85	-	85	昭仪侍宴	85	85	91	87					
玉箫改调	86	86	-	86	后宫阿监	86	86	92	88					
窗窗户户	87	87	-	87	管弦声急	87	87	93	89					
银烛秋光	88	88	-	-	密色红泥	88	88	94	90					
雨入珠帘	89	89	90	89	画船花舫	89	89	95	91					
金吾除夜	90	90	91	90	三清台近	90	90	96	92					
树头树底	91	91	92	91	高亭百尺	91	91	-	93					
金殿当头	92	92	1	92	小院珠帘	92	92	-	94					
日晚长秋	93	93	93	-	内人承宠	93	93	-	97					
日映西林	94	94	94	-	翡翠帘前	94	94	-	98					
泪尽罗巾	95	95	95	-	金章紫绶	95	95	-	99					
新鹰初放	96	96	6	-	金碧阑干	96	96	-	100					
黄金捍拨	97	97	96	-	安排竹栅	97	97	98	29					
鸳鸯瓦上	98	98	97	-	年初十五	98	98	99	30					
宝仗平明	99	99	98	-										
闲吹玉殿	100	100	99	-										

注：“-”表示该宫词在此版本中未被收录。

第43首，而此词亦未被《三体宫词》收录，在《三家宫词》中为第22首。又《四家宫词》花蕊夫人宫词按语云：“曾见彤管遗编，内有费氏花蕊夫人宫词一百首，与王岐公同者二十六首，与王司马同者二十三首。此本原九十八首，同者只三十一首耳，又有与此本诸家俱不同者十二首，岂好事者任意兴而增之耶？并录十二首于后……”<sup>[3]32</sup>由此可见，李良柱编刻宫词时见过花蕊宫词一百首本，但因其中夹杂入王珪词二十六首、王建词二十三首，因此弃而不用。最终以另一种九十八首本的次序为准，校订编刻为《四家宫词》中九十八首花蕊夫人宫词。从上表比对可知，他参考的九十八首本可能是《编选四家宫词》，因为李良柱刻本收录的篇目和具体排序与《编选四家宫词》完全一致。而且《编选四家宫词》刻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相距李良柱刻本仅28年，时间并不长，李良柱极有可能见到此本。

在参考《编选四家宫词》的同时，李良柱还参考了诸多文献，《刻四家宫词引》言：“各求旧本，删其重复，正其讹缺，汇而刻之”<sup>[3]3</sup>，由此可见，他在掌握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文献整理工作。《四家宫词》较《编选四家宫词》多出一篇王建宫词按语、一篇花蕊夫人宫词序文、一篇花蕊夫人宫词按语，丰富了宫词的著者信息和版本信息，《四家宫词》的版本价值更高，所收诸家宫词的全面性、准确性也更完善。

李良柱刻《四家宫词》在明代宫词编纂体系占有重要位置，使明代宫词类总集编纂体系更加清晰、完整。近450年后，《四家宫词》（明万历李良柱刻本）已成国内孤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幸赖徐行可先生悉心收藏，并无偿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四家宫词》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才能让世人得见真容。徐行可先生对此本做了大量批校，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



## 2 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之功

《四家宫词》共收宫词314首,包括王建宫词100首、李良柱另补7首,王珪宫词67首,花蕊夫人宫词98首、李良柱另补12首,杨太后宫词30首。而徐行可在《四家宫词》李良柱刻本上共有197处批校,相当于平均每两首宫词中就包含1条批注,可见其批校频次和数量非常高。具体而言,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序文3处、王建宫词110处、王建宫词按语10处、王珪宫词26处、花蕊夫人宫词序文1处、花蕊夫人宫词31处、杨太后宫词16处。徐氏批校大部分是针对宫词用字而言,而且主要集中在王建宫词上。将徐氏批校与其他文献的宫词著录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徐氏批校参考的版本,并了解《四家宫词》与各版本所录宫词的差异。

### 2.1 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所据版本分析

综合分析徐先生所做197处批校内容,可以推知其批校时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版本比勘工作。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批校文字入手,通过和其他几个重要版本进行比较来还原其批校过程:

王建宫词。版本一:《王建诗集》<sup>[7]</sup>,影印南宋陈解元宅刻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王建诗集》卷十收录王建宫词一百首。陈解元宅刻本《王建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王建别集。版本二:《编选四家宫词》,嘉靖间郭云鹏刻本。版本三:毛晋所刻《三家宫词》,《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毛晋《诗词杂俎》影印(以下简称“毛《三家》初编本”)。版本四:毛晋所刻《三家宫词》<sup>[8]</sup>,《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毛《三家》四库本”)。版本四与版本三的字句不完全一致。

王珪宫词。版本一:《编选四家宫词》,嘉靖间郭云鹏刻本。版本二:毛《三家》初编本。版本三:毛《三家》四库本。版本四:王珪别集《华阳集》<sup>[9]</sup>,《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本)。

花蕊夫人宫词。版本一:《编选四家宫词》,嘉靖间郭云鹏刻本。版本二:毛《三家》初编本。版本三:毛《三家》四库本。版本四:陈祥裔所撰《蜀都碎事》<sup>[10]</sup>,清康熙漱雪斋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录有花蕊夫人宫词一百首。《蜀都碎事》是著录蜀地历代名人诗文的总集。

杨太后宫词。版本一:郎瑛所撰《七修类稿》<sup>[11]</sup>,卷三十二收录杨太后宫词三十首,为现存最早的收录杨太后宫词的文献之一。版本二:毛晋所刻《二家宫词》<sup>[12]</sup>,《丛书集成初编》本(以下简称“毛《二家》初编本”)。《二家宫词》,天启七年(1627年)毛氏绿君亭刻本,收录宋徽宗宫词、杨太后宫词两种。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毛晋收录进《诗词杂俎》。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诗词杂俎》影印《二家宫词》,编入《丛书集成初编》。版本三:毛晋所刻《二家宫词》<sup>[8]</sup>,《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毛《二家》四库本”)。版本三与版本二的字句不完全一致。版本四:厉鹗所撰《宋诗纪事》<sup>[13]</sup>,收录杨太后宫词十九首。

从宫词的不同著录情况可以推断徐行可先生在批校时采用的对校本,如表3所示。

王建宫词“龙烟日煖紫瞳瞳”<sup>[31]</sup>句,徐校本于“瞳瞳”旁批“重重”。“瞳瞳”,《王建诗集》作“瞳瞳”,《编选四家宫词》、毛《三家》四库本作“瞳瞳”,唯毛《三家》初编本作“重重”。徐氏批校与毛《三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一致。

王珪宫词“乐府新调十二鐘”<sup>[31]</sup>句,徐校本于“鐘”旁批“鍾”。“鐘”,各本皆作“鐘”,唯毛《三

表3 徐校本与其他版本所录宫词字句对比举例

徐校(王建宫词)	原文	《王建诗集》	《编选四家宫词》	毛《三家》初编本	毛《三家》四库本
“煖”旁批“暖”“瞳瞳”旁批“重重”	龙烟日煖紫瞳瞳	龙烟日煖紫瞳瞳	龙烟日煖紫瞳瞳	龙烟日暖紫重重	龙烟日煖紫瞳瞳
徐校(王珪宫词)	原文	《编选》	毛《三家》初编本	毛《三家》四库本	《华阳集》初编本
“鐘”旁批“鍾”	乐府新调十二鐘	乐府新调十二鐘	乐府新调十二鍾	乐府新调十二鐘	乐府新调十二鐘
“髻”旁批“髻”	十三垂髻碧螺松	十三垂髻碧螺松	十三垂髻碧螺松	十三垂髻碧螺松	十三垂髻碧螺松
徐校(花蕊夫人宫词)	原文	《编选》	毛《三家》初编本	毛《三家》四库本	《蜀都碎事》
“宴”旁批“晏”	侍宴无非列近臣	侍坐无非列近臣	侍宴无非列近臣	侍宴无非列近臣	侍宴无非列近臣
徐校(杨太后宫词)	原文	《七修类稿》	毛《二家》初编本	毛《二家》四库本	《宋诗纪事》
“收”旁批“蚕”	岁岁蚕收麦熟时	岁岁蚕登麦熟时	岁岁蚕蚕麦熟时	岁岁亲蚕麦熟时	

家》初编本作“鐘”。“十三垂髻碧螺松”，徐校本于“髻”旁批“髻”。“髻”，各本皆作“髻”，唯毛《三家》初编本作“髻”。徐氏批校与毛《三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一致。

花蕊夫人宫词“侍宴无非列近臣”<sup>[3]22</sup>句，徐校本于“宴”旁批“晏”。“宴”，《编选四家宫词》作“坐”，毛《三家》四库本、《蜀都碎事》作“宴”，而毛《三家》初编本独作“晏”。徐氏批校与毛《三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一致。

杨太后宫词“岁岁蚕收麦熟时”<sup>[3]37</sup>句，徐校本于“收”旁批“蚕”。“岁岁蚕收麦熟时”句异收情况较多，毛《二家》初编本作“岁岁蚕蚕麦熟时”，毛《二家》四库本作“岁岁亲蚕麦熟时”，《七修类稿》作“岁岁蚕登麦熟时”。徐氏批校与毛《二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一致。

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仅举以上数例。从以上宫词著录情况对比可以看出，在王建、王珪、花蕊夫人宫词的批校上，《四家宫词》徐氏批校与毛《三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完全一致。在杨太后宫词的批校上，《四家宫词》徐氏批校与毛《二家》初编本的著录情况完全一致。因此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依据的校本应该出自毛《二家》初编本。

《三家宫词》毛晋序文云：“自唐迄宋，始辑三家，仍旧本也。”<sup>[6]4</sup>可知《三家宫词》反映了旧本《三家宫词》的原始面貌。

《二家宫词》杨太后宫词毛晋跋文言：“考今本止三十首，余二十首从未之见……今姑仍原本，未便删去。”<sup>[12]15</sup>虽然毛晋未曾见过余下的二十首宫词，但是出于文献保存的目的，毛晋并未删去二十首宫词，可见毛晋《二家宫词》最大程度保留了杨太后宫词的相关文献。1936年，《三家宫词》《二家宫词》被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成为“较为通行而易得”<sup>[2]</sup>的宫词总集。总之，毛晋《三家宫词》《二家宫词》（初编本）不仅保留了原始文献，可作校勘之用，而且还通行易得。徐行可先生在批校《四家宫词》时，选择参照旧本，且最大程度上保留文献原貌的毛晋《三家宫词》《二家宫词》（初编本）作为对校本，说明了《四家宫词》徐氏批校的严谨。

## 2.2 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类别概述

### 2.2.1 批校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异文

在书籍刊刻过程中，难免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异

文。有些异文是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有些异文是因为异体、俗体与正体之别而产生的字形差异。举例分析如下：

因字形相近所致的讹误。比如王建宫词“竞渡船头插綵旗”<sup>[3]4</sup>句，徐校本于“插”旁批“掉”。“插”，《王建诗集》作“棹”，《编选四家宫词》作“插”，毛《三家》初编本、毛《三家》四库本作“掉”。“插”为“插”的异体字，“插”与“掉”“棹”字形相近。从词性上看，“插”“掉”皆为动词，“棹”为名词。下句为“两边溅水湿罗衣”，与“湿”相对宜用动词，“棹”字误。从语义上看，“竞渡船头插綵旗”“竞渡船头掉綵旗”句意都可说通。“竞渡船头插綵旗”表现的是彩旗固定在船头；“掉”有摆动、摇动、震动义<sup>[14]卷三：1896</sup>，“竞渡船头掉綵旗”表现的是彩旗悬置在船头。两种方法在龙舟竞渡中都可见到，彩旗区别队列、迎风招展，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渲染氛围的作用。《王建诗集校注》改为“竞渡船头掉綵旗”，其下校注言“掉，据《纪事》《绝句》、明钞本、《全诗》改。胡本作插。掉，摇动”<sup>[15]552</sup>。毛晋《三家宫词》与《王建诗集校注》的著录情况一致。

又如杨太后宫词“天中圣节礼非常”<sup>[3]35</sup>句，徐校本于“中”旁批“申”。“中”，各本皆作“申”。“天申节”是宋高宗诞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言：“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讳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韦太后。大观元年五月二十日夜，生于宫中。以其日为天申节。”<sup>[16]19</sup>《宋史·礼志》于“圣节”下记载“孝宗隆兴元年，太上皇帝天申节，皇帝及宰臣、文武百僚诣德寿宫上寿”<sup>[17]</sup>。因此《四家宫词》所录“天中圣节礼非常”应为“天申圣节礼非常”。徐校正确。

因异体、俗体而产生的字形差异。比如王建宫词“金画黄龙五色幡”<sup>[3]2</sup>句。“幡”又作“幡”，“幡”是“幡”的异体字，“幡”为正字，徐校本于“幡”旁批“幡”。又如杨太后“百辟同趋德寿宫”<sup>[3]34</sup>句，“趋”又作“趨”，“趨”既是“趨”的异体字，又是“趨”的俗体字，徐校本于“趨”旁批“趨”，区别正体与异体的字形差异。

### 2.2.2 批校其他异文

除批校因字形相近产生的异文之外，徐校本还批校了其他类型的异文，比如因音近产生的异文、因不明史实产生的异文等。

(1) 因音近而产生的异文。比如王建宫词“太平万岁自当中”<sup>[3]3</sup>句,徐校本于“自”旁批“字”。“自”,各本皆作“字”。整首宫词为“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自当中”。这首宫词描写的是舞蹈场景。唐代有以字形编排的舞蹈,称为“字舞”。《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sup>[18]</sup>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字舞”条言“‘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自当中。’王建宫辞也。按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万岁字’之句。”<sup>[19]</sup>据《广韵》记载,“自”为疾二切,去声,至韵,从母;“字”为疾置切,去声,志韵,从母。“至韵”“志韵”皆为入声韵。“自”“字”两字声母相同、主要元音发音相近,为旁转关系,两者因为音近而产生讹误,“太平万岁自当中”句,当为“太平万岁字当中”。徐校标明了因音近所致的讹误。

(2) 因不明史实而产生的异文。比如王建宫词“山雪初消渐水浑”<sup>[3]7</sup>句。“渐”,《王建诗集》《编选四家宫词》作“渐”,其他两本皆作“澹”(同“澹”)。徐校本于“渐”旁批“澹”。《王建诗集校注》将此句录为“山雪初消澹水浑”,其下校记言:“澹水,原作渐水,据《绝句》、胡本改。《纪事》《全诗》作渐出。”<sup>[15]571</sup>整首宫词为“新晴草色绿温暾,山雪初消渐水浑。今日踏青归较晚,传声留着望春门”<sup>[3]7</sup>。描写了初春时节,帝王、贵族官僚踏青出游的景象。望春门为望春宫宫门,望春宫是唐代行宫,唐人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记载:“望春宫。在县东十里,临澹水西岸,在大明宫之东,东有广运潭。”<sup>[20]</sup>(见图2)澹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西北流至西安市,东入灞水<sup>[21]</sup>。望春宫东临澹水,唐时是踏青胜地。崔日用《奉和胜制春日幸望春宫迎春应制》言:“东郊风物正熏馨,素澹凫鹭戏绿汀。凤阁斜通长乐观,龙旗直逼望春亭。”<sup>[22]</sup>可见帝王、贵族官僚在望春宫附近赏春踏青的盛景。“山雪初消渐水浑”应为“山雪初消澹水浑”,李良柱刻本有误。

又如杨太子宫词“泛索坤宁日一羊”<sup>[3]36</sup>句。“日一”,毛《二家》初编本、毛《二家》四库本作“一日”。徐校本于“日一”旁批“一日”。此句涉及宋朝



图2 望春宫(即唐行宫)、澹水方位图<sup>[20]5</sup>

皇后的饮食制度。宋朝皇后的膳食有每日一羊的分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于“成恭夏皇后太皇谢太后”下记载:“后性恭俭,既受册,内膳日进一羊,力丐免。”<sup>[16]30</sup>整首宫词为“泛索坤宁日一羊,自从正位控辞章。好生躬俭超千古,风化宫嫔只淡妆”。谢皇后崇尚节俭,于饮食、装扮上节省用度,表现了国母风范。《四家宫词》原文正确,此句当为“泛索坤宁日一羊”,毛晋《二家宫词》误。

### 2.2.3 补全墨迹模糊

由于刊刻失误以及成书年代距今久远等情况,《四家宫词》有字句缺漏、墨迹脱落的情况。比如王建宫词“金吾除夜进雉名,画袴■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sup>[3]10</sup>,墨块处字迹不清,诸本皆作“朱”,徐校本旁批“朱”字。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大雉之礼。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振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sup>[23]</sup>因此参加雉礼的艺人应该身着赤衣,即朱衣。徐校补全了墨块字迹。

### 2.2.4 补充序跋作者信息

花蕊夫人宫词前有宋本原序。序文云:“熙宁五年,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馆者,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得二敝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出于花蕊夫人手,而词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自唐至今,读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失



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谨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而口诵数篇于丞相王安石。明日与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花蕊者，伪蜀孟昶侍人，事在国史。”<sup>[32]</sup>《编选四家宫词》《三体宫词》与毛晋《三家宫词》同样录有此篇序文，三书所载序文皆多出“王安国题”四字。徐校本在序文末尾批校“王安国题”四字，补充了《四家宫词》花蕊夫人宫词序文作者。

### 2.2.5 批校杂入宫词

《四家宫词》编刻的王建宫词一百首中夹杂他作。王建宫词按语言：“王建宫词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遗其八，近世所传百首皆备。盖好事者妄以他人诗补之，殊为乱真也。中有‘新鹰初放’‘黄金捍拨’，此张籍《宫词》二首也。‘泪尽罗巾’，此白乐天《后宫词》也。‘閒吹玉殿’（閒同‘闲’），此杜牧之《出宫人》诗也。‘银烛秋光’，此牧之《七夕》诗也。‘宝仗平明’，此王昌龄《长信秋词》也。‘日晚长秋’‘日映西陵’，此梦得、魏公二首也。”<sup>[31]</sup>后记中涉及的“新鹰初放”“黄金捍拨”“泪尽罗巾”“閒吹玉殿”“银烛秋光”“宝仗平明”“日晚长秋”“日映西陵”八首宫词，徐校本在其下批校“删”字，表示为他人所作。

《四家宫词》徐校本197处的批校大部分是对宫词本身的批校，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分析。徐行可批校宫词异文、补足字句缺漏，对王建宫词杂入他人所作的宫词进行了批校。这些批校体现了徐行可批校的细致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 3 从徐行可批校《四家宫词》看其文献学思想

徐行可对《四家宫词》的细致批校反映了其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深厚的文献学功底。

首先，在版本收藏上，徐行可先生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从前文分析可知，李良柱刻《四家宫词》在选辑编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并没有按常规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四家宫词，而是收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杨太后四家宫词，在诸多四家宫词类总集中可谓别具一格。《四家宫词》所录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能够和其他版本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校对异文、鉴别真伪；其选录的杨太后词则能补众多宫词类总集未录之缺，更大程度上保存原始文献，为后人研究杨太后宫词及探析整个宫词学术体

系提供重要文献依据。而这一刻本能够以完帙的形态流传至今，与徐行可先生独到的学术眼光密不可分。

其次，在批校上，《四家宫词》中的徐氏批校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第一，在形式上，《四家宫词》徐氏批校呈现出“批校而不删改”的特点。图3为《四家宫词》徐氏批校的部分展示。徐先生在地脚或字句间批校异文而不删改原文字句。表现了徐行可不轻下结论、不妄改古书的谨慎态度以及良好的学术修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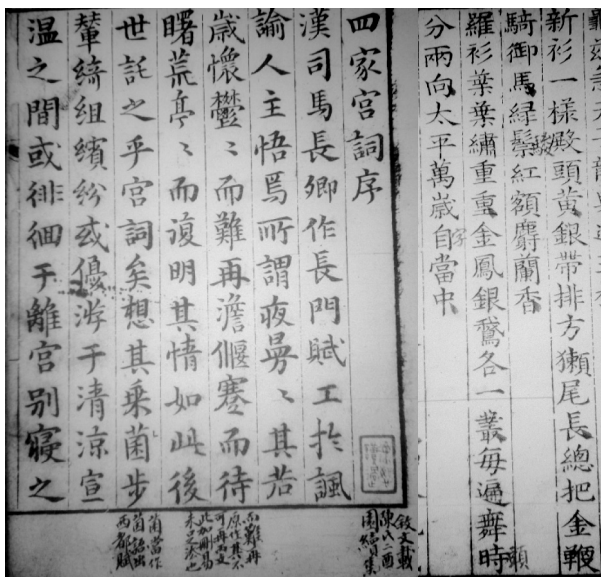


图3 《四家宫词》序徐氏批校及所录宫词徐氏批校

第二，在内容上，《四家宫词》徐氏批校体现了徐行可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广博的学识。比如书首陈文烛所作序文引用《长门赋》云：“夜曼曼其若岁，怀郁郁而难再。澹偃蹇而待曙，荒亭亭而复明。”<sup>[3]</sup>徐行可在地脚批校：“序文载陈氏《二酉园续集》。‘而难再’原作‘其不可再更’，此加删易未足法也。”徐行可首先指出此序文载入陈文烛《二酉园续集》，说明他在《二酉园续集》中看到过此序文。经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收录有陈文烛的《二酉园续集》，其中所录《四家宫词序》云：“夜曼曼其若岁，怀郁郁而难再。澹偃蹇而待曙，荒亭亭而复明”<sup>[24]</sup>。与李良柱刻本中《四家宫词》序文完全相同。《长门赋》原文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sup>[25]</sup>。陈文烛将“其不可再更”改为“而难再”。徐行可认为陈文烛这种“加删易”的做法“未足法”，不可以当作规范，体现了徐行可尊重原著、不随意改易古籍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又如陈文烛所作序文中“想其‘乘菌步輦’‘绮组

缤纷’”之言。徐行可在地脚批校：“‘茵’当作‘茵’，语出《西都赋》。”这是依据《西都赋》原文做出的批校。《西都赋》有“乘茵步辇，惟所息宴”<sup>[26]</sup><sup>13</sup>“红罗颺纒，绮组缤纷”<sup>[26]</sup><sup>14</sup>之言。“茵”指垫席。李善注：“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郑玄《礼记注》曰：‘茵，蓐也，於申切。’”《汉语大字典》引《广雅》郭璞注、王筠《说文句读》解释“蓐”为“草席、草垫”<sup>[14]</sup><sup>卷五：3262</sup>。《广雅·释器》：“蓐

谓之兹。”郭璞注：“兹者，蓐席也。”《说文句读》：“案此皆人之蓐也，蓐则蚕之蓐也。俗作褥字，盖即蓐之分别文。”“茵”，《汉语大字典》解释：“蓐，菌子。伞菌一类的植物。无毒的可供食用。”<sup>[14]</sup><sup>卷五：3234</sup>《说文》：“茵，地蓐也。从艸，困声。”“茵”为植物，“茵”指垫席。“茵”“茵”因字形相近而误，虽一笔之差，但词义却有天壤之别。徐行可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错误，并加以批注。

### 参考文献：

- [1] 湖北省图书馆.徐行可旧藏善本书图录[M].武汉:崇文书局,2019:292.
- [2] 王育红.五种宫词总集版本源流考[J].文艺评论,2012(4):66-71.
- [3] 四家宫词[M].刻本.李良柱,1579(明万历七年).湖北省图书馆藏.
- [4] 黄鲁曾.编选四家宫词[M].刻本.郭云鹏,1552(明嘉靖三十一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5] 吴革.三体宫词[M].刻本.晋陵:吴氏云栖馆,1594(明万历二十二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6] 毛晋.三家宫词[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1759-176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7] 王建.王建诗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8] 毛晋.三家宫词 二家宫词[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41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9] 王珪.华阳集[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10] 陈祥裔.蜀都碎事[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5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1] 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12] 毛晋.二家宫词[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178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3] 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 [15] 王建.王建诗集校注[M].尹占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1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朱易安.全宋笔记:第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 [1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78.
- [18] 刘煦,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0.
- [19] 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40.
- [20] 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371.
- [21]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93.
- [22] 王全,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559.
-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2.
- [24] 陈文烛.二酉园续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15.
- [25] 魏耕原.历代小赋观止[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3.
- [26]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柳燕，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献整理与研究；王唐梦影，湖北大学文学院2022级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献整理与研究。

**收稿日期：**2022-01-07

**本文责编：**李芳

· 文献学研究 ·

## 《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人物考辨

严光<sup>1,2</sup>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2.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 江西景德镇 333000)

**摘要:** 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的男性人物中,序、跋、题词、小引等文字的作者与珠泉居士关系最为密切。通过考证可知,题词者沮溪潘秋水为乌程潘浚,津门赵梦倩为天津赵琳,茗溪潘柳堂为乌程潘榕,同里丁柳溪为归安丁翔鸿,武林王鲁石为杭州王元琨。珠泉居士与丁柳溪同里,属湖州归安人,名吴珠泉,原名非吴霖世,真实姓名字号和身世生平待考。

**关键词:** 《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珠泉居士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 Textual Research on *Xu Banqiao Zaji* and *Xuehong Xiaoji*

**Abstract** Among the male characters of Zhuquan Jushi's *Xu Banqiao Zaji* and *Xuehong Xiaoji*, the authors of the preface, postscript, inscriptions, and small quotations ar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Zhuquan Jushi. After researching,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Pan Qiushui of Juxi is Pan Jun of Wucheng, Zhao Mengqian of Jinmen is Zhao Lin of Tianjin, Pan Liutang of Tiaoxi is Pan Rong of Wucheng, Ding Liuxi of Tongli is Ding Xianghong of Gui'an and Wang Lushi of Wulin is Wang Yuankun of Hangzhou. Zhuquan Jushi and Ding Liuxi were from the same county, which was Gui'an of Huzhou. He was known as Wu Zhuquan, not Wu LinShi. The real name and life and death are to be examined.

**Key words** *Xu Banqiao Zaji*; *Xuehong Xiaoji*; Zhuquan Jushi

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现存最早刻本为清乾隆壬子(1792年)西酉山房刊巾箱本<sup>[1]</sup>,由《续板桥杂记》三卷附《雪鸿小记》一卷组成,天头分别有丁柳溪和宫霜桥眉批。作为余怀《板桥杂记》的续书和清代狭邪笔记之一种,十余年来,以其妓女书写题材、香艳狭邪性质和城市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所见,从文献学角度对其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有李慧群<sup>[2]</sup>和宋世瑞<sup>[3]</sup>二人,前者对书中与作者关联不多的人物进行了考证;后者考索出若干关键人物,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前提。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证与作者关系密切的题词者沮溪潘秋水等人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平,确定珠泉居士的姓氏、籍贯,进而考实,珠泉居士原名非吴霖世。有关珠泉居士的原名和生平,有待进一步挖掘考证。

#### 1 序跋题词者考补

《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为与作者有直接关系者,即序、跋、题词、小引等文字的作者及与作者共同出入于青楼妓馆的友朋和作者的幕主,这是主体。其二为捎带提及,但与作者没有直接交往者,从文本来看,这类人物虽然与作者没有交涉,但其中不乏闻人,如随园主人袁枚、湖州东林陈兰谷、湖州徐溥等。第三类为行文中提及的狎客,这一类人物多匿名隐晦,既无关紧要,也几乎无法考索。

上述三类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类人物,他们是考索的主要对象,也是我们进而把握作者及其



作品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对于第一类人物,学界已考证出海陵默堂主人等8人。为避免重复,本文集中考证与作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物,同时补充现有的研究成果。

### 1.1 沮溪潘秋水、津门赵梦倩

潘秋水为《续板桥杂记》题词2首,无题目;《雪鸿小记》题词2首,亦无题。赵梦倩题诗2首。诗歌内容都没有揭示任何生平信息。

上海图书馆藏《吴兴纯孝里潘氏世谱》十卷首一卷,据版心、卷首又名《汇沮潘氏世谱》《潘氏重修世谱》等,存卷首、卷一、卷二和卷五至卷九。该谱为清湖州府乌程县(今湖州市吴兴区)汇沮潘氏世谱,汇沮之名见于历代乌程志书。据卷首潘氏十四世孙潘槐《沮溪潘氏世谱重修序》,知汇沮别名沮溪。汇沮又名沮溪,似由来已久。明末,时任赣州知府的沮溪潘昭度“帅师勤王”,激发著名小说出版家凌濛初“慨然有出楫澄清之志”<sup>[4]</sup>。昭度,原名曾紘,生平见《(崇祯)乌程县志》卷六《科甲》、《(乾隆)乌程县志》卷六《人物》、《(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二《人物传政绩二》等,又见于《吴兴纯孝里潘氏世谱》卷七《小传一》第十二世<sup>[5]卷七小传一叶:45b-46a</sup>,可证潘昭度为明湖州府乌程县汇沮人,汇沮名沮溪。此外,顾应祥为汇洲府君潘铤所作的像赞中,说潘铤“沮溪世泽”<sup>[5]卷二像赞叶:25b</sup>,也为汇沮又名沮溪的明证。汇沮,后改名外溪<sup>[6]</sup>,今属湖州市吴兴区环渚街道常溪村。

《汇沮潘氏世谱》卷九《小传三》中载录潘浚小传如下:

浚(经邃,秋水)。娶(新安)程氏(霍州司马怀轩公女)。子三,本、楫、机。葬汇沮东村浅漾。太学生。生乾隆庚午(1750)八月十一日未时,卒嘉庆丁丑(1817)八月初十日<sup>[5]卷九小传三叶:33b</sup>。

此处记载的潘浚号秋水者,里籍、名号与题词者沮溪潘秋水相同,可以推断为同一人。且秋水为太学生,而没有更高的功名,当属实录。

潘浚似乎常年寄迹扬州。1793年冬至1794年春,潘浚先后手写了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子蒋骥和孙蒋和一门三代书画文字论著九种,合刻为《蒋氏游艺秘录》。潘浚作于癸丑(1793年)冬日的后《记》,交代了校录《蒋氏游艺秘录》的缘起:

癸丑(1793)夏,赵梦倩明府以公入都,得交醉峰于书画舫……余侨居江南,醉峰客冀北,神交已旧。梦倩复道,予主其幕,为嗜古之士,兼攻六书。乃不远数千

里以什袭者嘱梦倩致校讎而手录焉……癸丑(1793)冬日吴兴潘浚经邃甫记<sup>[7]496</sup>。

此处所云,与书前天津赵梦倩作于乾隆甲寅(1794年)春日的《蒋氏游艺秘录序》可互证,且更为详细。又可知,潘浚为赵梦倩的幕僚。

《蒋氏游艺秘录》第八种为蒋和著《学书杂论》,后有蒋和壬寅(1782年)秋日的识语,末题“甲寅(1794)花朝茗上髯潘浚录于广陵东淘之绿天山馆”<sup>[7]492</sup>。广陵为扬州旧称,东淘为东台县安丰场别名<sup>[8]401</sup>,安丰盐场为明清著名的淮南中十场之一。潘浚既是赵琳的幕僚,而其衙署又位于安丰场,则《(嘉庆)东台县志》卷四《职官表》记载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任安丰场大使的赵琳<sup>[8]362</sup>,与《蒋氏游艺秘录序》的作者赵琳当为同一人。赵梦倩,《(嘉庆)东台县志》卷二十《职官》有传,据传记知其原名赵琳,字冰匏,直隶天津县(今天津)人,监生,嘉庆二年(1797年)卒于任<sup>[8]520</sup>。赵梦倩似善书法,故震钧《国朝书人辑略》著录,唯云赵琳字梦倩<sup>[9]</sup>,与《(嘉庆)东台县志》不同。赵琳与潘秋水既为幕主与幕僚关系,与《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的题词者津门赵梦倩里籍、姓名相同,赵梦倩的题词又位于《题后》的首位,暗示其身份较高,因此,可以推断,题词者赵梦倩与《蒋氏游艺秘录序》的作者赵琳为同一人。

赵琳去世后,潘浚继续寓居扬州。1812年春,年逾六旬的潘浚,从扬州回到乌程,适值潘炯完成《潘氏重修世谱》的前四卷,请潘浚校对谱文,以示对于潘浚的尊重。潘浚在作于1814年正月的《重修家谱跋(十六世景塘公修)》中说:

壬申(1812)小春,余自广陵还,弟以诰敕、像赞、行状、传志嘱予校对。惜乎鸠工不济,就简删繁,然考核大略,亦犁然备矣。此后更有以敦睦为怀者,复加采择,增订全书,则祖功宗德,旧籍借以不湮,是不克无望于将来云。嘉庆甲戌(1814)新正十六世孙浚百拜跋后并书<sup>[5]卷首潘浚跋</sup>。

跋文后有印章二,一阴文“臣浚之印”,一阳文“经邃”。至此,关于潘秋水,我们可知其原名潘浚,字经邃,号秋水,别号秋水道人<sup>[7]456,465,478</sup>、茗上髯,太学生,曾为赵梦倩幕僚,能诗文,善书法,诗作存4首,文2篇。

### 1.2 茗溪潘柳堂

潘柳堂为《续板桥杂记》题诗2首,《雪鸿小记》

题诗2首，诗歌都从珠泉居士的写作本身出发予以论说，没有涉及自己的身世。《国朝湖州诗录补编》收录潘镛诗10首，其中第7首为《题吴珠泉〈雪鸿小记〉》，文字全同于潘柳堂《雪鸿小记》题辞第1首，因此可以断定，此潘镛即为潘柳堂。《国朝湖州诗录补编》潘镛条下，小字注有其身世著作：“字雄飞，号柳堂，乌程人。国学生，著有《寄闲草堂诗集》。”<sup>[10]</sup>

《两浙輶轩续录》亦收录有潘镛诗歌1首，小字注作：“字雄飞，号柳堂，乌程人。国学生，著《寄闲草堂诗集》。”<sup>[11]</sup>，诗歌见于《国朝湖州诗录补编》，应是辑录自后者。从清代两种地方诗歌总集同时收录潘镛诗歌来看，说明时人认可潘镛诗歌作品的价值。然而这部《寄闲草堂诗集》已佚，今存潘镛诗歌作品共13首。

### 1.3 同里丁柳溪

丁柳溪为《续板桥杂记》题诗3首，其中第二首有注；为《雪鸿小记》题《一丛花》词1首。在清代中叶的湖州，至少有二人同名丁柳溪。一为丁翔鸿，其人见于《国朝湖州诗录》，姓名下小字注作：“字抚翼，号柳溪，归安人，诸生，有《南陔堂诗集》。”<sup>[12]</sup>并收有诗作7题10首。一为《南浔志》中的归安籍人丁殿金，字康侯，号柳溪，以年老好学而钦赐副贡、举人<sup>[13]</sup>。

两相比较，丁柳溪为丁殿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丁殿金之所以被收入《南浔志》人物传，主要是因为他老而好学，并得到朝廷的封赠，以鼓励向学，而非以文学著录<sup>①</sup>。更关键的是他原是乌程人，只是隶籍归安，如果丁柳溪为丁殿金，在题署时应不会写“同里”。因此，丁柳溪原名丁翔鸿或更符合实际，然要加强这一论断，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丁翔鸿《南陔堂诗集》今不存，综合《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和《国朝湖州诗录》，丁柳溪今存诗歌13首，词1首。

### 1.4 海陵霜桥苞（宫霜桥）

宋世瑞揭出《雪鸿小记》的题辞者“海陵霜桥苞”和题诗评点者宫霜桥，为泰州宫国苞，这一论断基本是可信的。在此，略作论证。

宫霜桥为《雪鸿小记》题辞1篇，末署“庚戌（1790）夏五海陵霜桥苞”；题诗2首，署名“海陵宫霜桥”；又作头天眉批，署名“宫霜桥”。海陵为泰州旧称，可以确定霜桥苞和宫霜桥籍贯相同，是同一人，此其一。其二，霜桥苞题辞末尾有印章二，一作阳文“苞印”，一作阴文“霜桥”，检黄易《携琴访友图》，第三位题跋者为霜桥苞，与此处措辞相同，落款后钤

有“苞印”“霜桥”两枚印章，虽然字体微有差异，但内容相同，当为同一人<sup>[14]</sup>。

宫氏为泰州世家，宫霜桥祖上多有功名者，但霜桥却一生沦落，以监生身份而终，“可怜身歿尚书生”<sup>[15]第四辑第68册：570</sup>，其生平见《淮海英灵续集》庚集卷一、《（民国）续纂泰州志》卷二十五《人物文苑》等<sup>②</sup>。宫霜桥能诗善画，所著《北游草》一卷、《半红楼唼稿》一卷，选辑《霄崢集》八卷、《四家词选》四卷，皆存。诗为袁枚所赏，与金兆燕、凌廷堪、郑燮、黄易等名士交游。

在宫霜桥的《半红楼唼稿》中，有《送廖茶畦北上》《再送茶畦》诗2首，说明霜桥与廖茶畦有交游。从二人都为《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题词来看，两处廖茶畦当为同一人，然而廖茶畦生平待考。

### 1.5 武林王鲁石

王鲁石的4首题诗位于《题后》部分，《题后》从字面来看，意为题于书后，即《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都已成书后的题词，因此，可以判定诗作大致作于1788年后。

1792年，宫霜桥在家乡泰州主持芸香诗社，诗社同人中有名王元琨者，“字鲁石，浙江钱塘人，诸生”<sup>[15]第四辑第68册：453</sup>。可以推断，王元琨即为《雪鸿小记》题诗者武林王鲁石。嘉庆己巳（1809年），诗社同人叶兆兰和邹熊选刻同人诗集《芸香诗钞》，王元琨被放置在卷一《停云集》首位，人物介绍后有小字注：

鲁石，浙中宿学，古朴无时习。久客江淮间，白首归里，行李萧然，篋中惟诗稿百卷而已<sup>[15]第四辑第68册：453</sup>。

后录王鲁石诗一首，题为《癸丑春仲将归武林留别吴陵同学诸子》。此处癸丑，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此时王鲁石已是白首老者。王鲁石由江淮返里，为诗社中一件大事，同人都有题赠，并绘制了《春江送别图》<sup>[15]第四辑第68册：554</sup>。王鲁石返回杭州后，似乎和芸香诗社同人失断联络，故邹熊在怀念王鲁石的《怀友诗》中说“十载西湖音问绝，诗坛酒壘近如何？”<sup>[15]第四辑第68册：574</sup>然而，至道光乙酉丁亥（1825—1827年）间，已经返回杭州30多年的王鲁石又列名芸香诗社新一代同人名单中<sup>[15]第四辑第68册：626</sup>，可能此时仍在世。然为王鲁石所珍视的百卷诗稿恐已不存，王鲁石诗歌今存《题后》4首。

### 1.6 颍川明府陈潢

学界已考出珠泉居士的幕主颖川明府为山阴监生陈璜,但关于陈璜生平所知甚少,在此补充若干资料,并初步梳理珠泉居士和陈璜的交往情形。

据《(嘉庆)山阴县志》卷十《选举二》、《(光绪)溧水县志》卷五《官师志》,陈璜曾任溧水知县,但都无任职年月。乾隆癸丑(1793年)《大清摺绅全书》云:“陈璜,浙江山阴人(监生,四十九年五月题)。”<sup>[16]</sup>第二本叶:27b可见,早在1784年,陈璜已是溧水知县,去职时间虽然缺载,但可考。据《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九)、《刑案汇览》卷十八等记载,陈璜曾因一件民事盗窃案,被乾隆帝视为“贪酷劣员”,以致不同意江苏督抚的革职建议,而施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处罚;案件发生月日不明,但乾隆对江苏督抚书麟等人奏折的批复时间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十五日<sup>[17]</sup>。由此可知,陈璜于1793年夏被革职充军,卸任溧水知县。此一时间是可信的,因为从《(光绪)溧水县志》秩官表来看,陈璜在乾隆后期署任,下一任黎濬任职后,即进入嘉庆年间<sup>[18]</sup>。

然而,在1784至1793年之间,陈璜又曾任甘泉知县,任期一年,起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到第二年(1788年)十一月由缪廷芬接任<sup>[19]</sup>。正是这一年,他延揽珠泉居士为幕僚,使珠泉在公余得以优游花丛,根据经历见闻写下录载扬州妓女小传的《雪鸿小记》<sup>[20]</sup>珠泉居士小引叶:6a。然而,据陈维濬1791年《总跋》:“茗南珠泉先生,怀才未试,寄迹江扬……今夏,旧雨兰坡来至吴陵,得假半面缘,从先生游”<sup>[20]</sup>陈维濬总跋叶:5b,可知珠泉居士并未一直追随陈璜,而以客居江扬为主。

## 2 珠泉居士考辨

关于珠泉居士的姓氏,从文中称吴梅村为“家梅村”的称谓来看,完全可以确定作者姓吴。“吴珠泉”之名见于题词者乌程潘柳堂笔下,已见前述。题词者官霜桥有《题吴珠泉〈渔色读骚图〉》<sup>[21]</sup>,伏虎道场行者(费南辉)《野语》有“吾乡吴珠泉著《续板桥杂记》”的记载<sup>[22]</sup>,另外,《续板桥杂记》乾隆壬子(1792年)刻本也有“吴珠泉”印章。可见,珠泉居士原名吴珠泉,与丁柳溪同里,为湖州归安人。

宋世瑞通过考证题词者之一同里沈平子原名沈权衡,属归安菱湖人,故而判断吴珠泉亦为菱湖人,

并考以《(光绪)菱湖镇志》,作出吴珠泉为归安菱湖吴霖世的推论<sup>[3]</sup>。此一论断,疑问有二。首先,《(光绪)菱湖镇志》确有沈权衡号平子的记载,但此沈平子是否为《续板桥杂记》的题词者沈平子,缺乏有力的证据。其次,《(光绪)菱湖镇志》关于吴霖世的记载十分简略,似乎并不能贸然将吴霖世和吴珠泉划上等号。细究之,此吴霖世并非吴珠泉。

《(光绪)菱湖镇志》在记载吴霖世时,注明其信息来源为“吴氏刻谱”<sup>[23]</sup>。显然,“吴氏刻谱”非谱牒的规范称呼,但由此出发,笔者查找到吴衍麟纂修的同治四年(1865年)抄本《菱湖吴氏族谱》,关于吴霖世的记载如下:

霖世,榜名人龙,字闾文,号药房。娶同里李又六女……邑廩生,优行,咨部三次。乾隆壬午岁(1762)以《诗经》贡成均,中乾隆庚寅(1770)本省乡试五十八名举人,拣选知县。乾隆辛丑(1781)年选授严州府学,覃恩加一级,庚戌(1790)覃恩加二级。生康熙辛丑(1721)年十月廿三日<sup>[24]</sup>。

此处关于吴霖世科考功名的记载,同于《(光绪)菱湖镇志》卷二十二《士族》<sup>[23]</sup>,而以谱文为详。选授严州(今浙江建德)府学训导事,《(光绪)菱湖镇志》和《(光绪)归安县志》都没有记载时间,而乾隆癸丑(1793年)《大清摺绅全书》记载吴霖世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选为严州府学训导<sup>[16]</sup>第二本叶:87b,与族谱有所出入。不管吴霖世于1781年还是1783年选为严州府学训导,都与吴珠泉1781至1784年“就聘崇川”的自述冲突<sup>[20]</sup>珠泉居士缘起叶:1a-1b,且字号也不同,可以断定,吴珠泉原名并非吴霖世。

吴珠泉虽为湖州归安人,但未见记载,其《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也不见于府县和乡镇志书。遍检现存数种湖州归安吴氏谱录,也未见名为吴珠泉者。因此,关于吴珠泉的真实姓名字号和身世生平,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考证。

## 3 结语

吴珠泉在刊刻《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前,遍请友朋撰写序、跋,或题诗、题词。这些序跋、诗词的作者,大多籍籍无名,然而又都留下了蛛丝马迹,使得能对其进行考索。通过考证,初步断定沮溪潘秋水、津门赵梦倩、苕溪潘柳堂、同里丁柳溪、武林王鲁石5



人的真实姓名,提供了一些生平事迹;同时,补充了海陵宫霜桥、颍川明府陈璜2人的生平资料。最主要的是,以珠泉居士在书中的活动轨迹为内证,结合吴霖世的生平履历,作出了吴珠泉原名非吴霖世的结论。

#### 注释: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三《人物二》中即无丁殿金传记,而仅在卷十七《选举》“举人”下面载录,可以说明。见〔清〕王曰桢纂《(咸丰)南浔镇志》,《中国地方志丛书》乡镇志专辑22(下),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77页。
- ② 宫霜桥的霜桥为字还是号,在不同著作中记载不同,初步考察,笔者倾向于认为霜桥为宫国苞号,且主要以号行。因未见《泰州宫氏族谱》,此一判断还有待证实。

#### 参考文献:

- [1]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卷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3.
- [2] 李慧群.清代中期七部南京狭邪笔记初考[J].明清小说研究,2008(1):260-269.
- [3] 宋世瑞.《续板桥杂记》作者“珠泉居士”考[J].蒲松龄研究,2021(2):154-160.
- [4] 中华书局编辑部.学林漫录:五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97.
- [5] 潘炯,潘云.吴兴纯孝里潘氏世谱[M].刻本.1871(清同治十年).
- [6] 湖州市地名办公室.浙江省湖州市地名志[M].〔印刷地不详〕:湖州印刷厂,1983:118.
- [7] 蒋和,等.蒋氏游艺秘录[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 周右,蔡复午.(嘉庆)东台县志[M]//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9] 震钧.清朝书人辑略[M].蒋远桥,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199.
- [10] 郑祖琛.国朝湖州诗录补编:卷一[M].刻本.小谷口,1831(清道光十年):27a.
- [11]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第三册[M].夏勇,熊湘,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747.
- [12] 陈焯.国朝湖州诗录:卷三十[M].刻本.小谷口,1831(清道光十年):21a.
- [13] 周庆云.南浔志[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丛书·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上.上海:上海书店,1992:209.
- [14] 黄易.携琴访友图卷:新00010486[A].1771(乾隆三十六年).故宫博物院.
- [15] 邹熊,佚名,邹应庚,等.海陵诗存·泰州诗征·国朝海陵诗汇补遗等[M]//卢佩民.泰州文献:第四辑 泰州文存.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16] 荣锦堂.大清播绅全书: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M].刻本.荣锦堂,1793(清乾隆五十八年).
- [17] 庆桂.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129.
- [18] 傅观光,施春膏.(光绪)溧水县志[M]//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07.
- [19] 陈观国.(嘉庆)甘泉县续志:卷四[M].刻本.1810(清嘉庆十五年):3b.
- [20] 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附雪鸿小记[M].刻本.西西山房,1792(清乾隆五十七年).
- [21] 张符襄.张海房先生依归草·甲申集·梦余集·霄峥集等[M]//卢佩民.泰州文献:第四辑 泰州文库.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439.
- [22] 伏虎道场行者.野语:卷七[M].刻本.廬隱庐,1845(道光二十五年):14b.
- [23] 孙志熊.(光绪)菱湖镇志[M]//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2:860.
- [24] 吴衍麟.菱湖吴氏族谱:第四册 承字行[M].抄本.承德堂,1865(清同治四年):39a.

作者简介:严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与小说。

收稿日期:2021-12-31

本文责编:李芳